

國立台東大學
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杜明城 先生

論《醜人兒》三部曲中烏托邦體制下的
身體概念

研 究 生：湯貴婷 撰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七月

國立台東大學
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論《醜人兒》三部曲中烏托邦體制下的
身體概念

研 究 生：湯貴婷 撰

指導教授：杜明城 先生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七月

國立台東大學

學位論文考試委員審定書

系所別：兒童文學研究所

本班 湯 貴 婷 君

所提之論文論《醜人兒》三部曲中烏托邦體制下
的身體概念

業經本委員會通過合於

☒ 碩士學位論文 條件
☐ 博士學位論文

論文學位考試委員會：

郭建華

(學位考試委員會主席)

張子梅

杜明 杜

(指導教授)

論文學位考試日期：九十八年七月十三日

國立台東大學

附註：1. 本表一式二份經學位考試委員會簽後，送交系所辦公室及註冊組或進修部存查。

2. 本表為日夜學制通用，請依個人學制分送教務處或進修部辦理。

博碩士論文授權書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本人在 國立臺東大學 兒童文學研究 系(所)

組 97 學年度第 二 學期取得 碩 士學位之論文。

論文名稱：論〈醜人兒〉三部曲中烏托邦體制下的身體概念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全文資料，授權予下列單位：

同意	不同意	單位
☒	☐	國家圖書館
☒	☐	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
☐	☒	與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簽訂合作協議之資料庫業者

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微縮、光碟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式重製後散布發行或上載網站，藉由網路傳輸，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 同意 ☒ 不同意 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基於學術傳播之目的，在上述範圍內得再授權第三人進行資料重製。

本論文為本人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專利(未申請者本條款請不予理會)的附件之一，申請文號為：_____，請將全文資料延後半年再公開。

公開時程

立即公開	一年後公開	二年後公開	三年後公開
	☒		

上述授權內容均無須訂立讓與及授權契約書。依本授權之發行權為非專屬性發行權利。依本授權所為之收錄、重製、發行及學術研發利用均為無償。上述同意與不同意之欄位若未勾選，本人同意視同授權。

指導教授姓名：杜明 (親筆簽名)

研究生簽名：湯貴婷 (親筆正楷)

學 號：9500108 (務必填寫)

日 期：中華民國 98 年 7 月 27 日

1. 本授權書 (得自 <http://www.lib.nttu.edu.tw/theses/> 下載) 請以黑筆撰寫並影印裝訂於書名頁之次頁。

2. 依據 91 學年度第一學期一次教務會議決議：研究生畢業論文「至少需授權學校圖書館數位化，並至遲於三年後上載網路供各界使用及校內瀏覽。」

授權書版本: 2008/05/29

博碩士論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

(提供授權人裝訂於紙本論文書名頁之次頁用)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授權人在 國立臺東大學 兒童文學研究所 _____ 組 97 學年度第二學期取得 碩士 學位之論文。

論文題目：論《醜人兒》三部曲中烏托邦體制下的身體概念

指導教授：杜明城

茲同意將授權人擁有著作權之上列論文全文（含摘要），非專屬、無償授權國家圖書館及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微縮、光碟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式將上列論文重製，並得將數位化之上列論文及論文電子檔以上載網路方式，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 讀者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上列論文，應依著作權法相關規定辦理。

授權人：湯貴婷

簽名：_____

湯貴婷

中華民國 98 年 07 月 27 日

論《醜人兒》三部曲中烏托邦體制下的身體概念

作者：湯貴婷

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

摘 要

本論文主要以紐約青少年作家史考特·韋斯特費德(Scott Westerfeld)於2006年出版的科幻小說《醜人兒》(*Uglies*)三部曲為探究對象，全書在「未來的世界裡，所有人到了十六歲都必須進行全身整型手術成為美人」的主題下建構文本世界，透過二元對立架構醞釀文本張力，展現作者如何透過烏托邦文學敘事，對當代主流文化瀰漫的美貌迷思/身體崇拜提出另一種想像。

研究者將文本分置入西方烏托邦/反烏托邦的敘事脈絡中，並佐以相關身體和意識形態論述，檢視烏托邦/反烏托邦概念演譯的曖昧性如何藉由青少年的身體進行操演與實踐。研究結果發現：當代身體意識置入烏托邦文學場域後，身體意象從而擺脫複雜詭譎的資本主義邏輯，轉而納入烏托邦的政治軌道，青少年身體也成為烏托邦社會制度的投資對象，懷揣著優托邦理念，城市掌權者透過各式各樣的國家機制和精心策劃的意識形態話語，打著關冕堂皇的社會正義旗幟，標榜科技打造的美感身體，打算一勞永逸馴化身體，其最終目的是強制性建立標準的身體規範與樣態。由此可見，身體既是優托邦的實現，也是惡托邦產生的場域，同樣的，管理身體、馴服身體既是優托邦的實現，也是惡托邦產生的方式。因此，身體既是烏托邦實踐的對象又是手段，既是目標又是方法。

關鍵詞：身體、凝視、意識形態、烏托邦、反烏托邦、優托邦

Key Words : body gaze ideology utopia dystopia eutopia

The Concept of Body Under Utopia in the Uglies Trilogy

Guei-Ting Tang

Abstract

The thesis deals with American-born novelist Scott Westerfeld's *Uglies* trilogy. The series show how the author proposes another imagination to good-looking myth and the worship of body through the narrative of utopian literature under the contemporary mainstream culture

By placing the text into the thread of thought of utopia and the discourse related to body and ideology, the researcher examines how the ambiguity deduced from the idea of utopia to perform and practice by means of the youth's bodies.

Some findings were obtained from the study. When the contemporary body consciousness was placed in the utopian literature, the body image attempts to get rid of the strange and complicated logic of capitalism and then turns to adopt the political track of utopia. The youth's bodies also become the target of investment under the social system of utopia. With the concept of eutopia, the authorities of the city excessively praise of the aesthetic body shaped by technology. They try to tame body once and for all by using many kinds of national mechanism, ideological discourses, and the lofty flag of social justice. Their final goal is to compulsorily establish the standard norm and posture of body.

Therefore, the youth's bodies are the fulfillment of eutopia and the location of dystopia; similarly, management and tameness of the bodies are the fulfillment of eutopia and the way of producing dystopia. It can be said that body is not only the subject and the method but also the aim and the way of the fulfillment.

Key Words : body gaze ideology utopia dystopia eutopia

目 錄

第壹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
第二節 選讀文本理由/研究文本介紹	6
第三節 研究問題與架構	16
第四節 研究場域	21
第貳章 研究觀點	27
第一節 烏托邦的兩面鏡	27
第二節 阿波羅與戴奧尼索斯的紛擾	40
第三節 身體與烏托邦的關連	49
第參章 美麗的身體	50
第一節 學校教的事/是	52
第二節 我是十六歲	58
第三節 一輩子的驚人美貌	63
第四節 特別的我們？	68
第肆章 觀看身體	71
第一節 我（應該）是美人	73
第二節 眼中的他/她	79
第三節 我已非我	84
第伍章 結語	88
第一節 烏托邦敘事下的身體概念	88
第二節 再論《醜人兒》三部曲	92
第三節 研究省思	94

參考書目

第壹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各民族神話與宗教傳說中，女人既是美麗、愛情、豐饒多產的化身，又是誘惑、墮落、罪惡的象徵，美貌神話是女性神話建構中重要的論述之一（張中秋、王凱鋒 1-4）。西方對美的見解可以追溯至古希臘時期，在提奧格尼斯的詩作中提到：在底比斯的婚宴上，卡德莫斯和哈默妮接受了來自繆思、美之神與宙斯女兒的禮讚「唯有美的才受人愛，不美的，沒有人愛」，而“Kalon”一詞便是希臘文化捕捉美之概念的詞彙—「一切令人愉快，引起悅目或吸引眼睛的人事物，皆為之美」，而悅目的美麗或具現在對象事物的外形，或體現在對象的人格層次和內在靈魂，尤其是人體（Umberto Eco 37-41）。從柏拉圖開始，西方便將女性美昇華為道德或心靈力量的表徵，美女的形象一直是文學家、哲學家或藝術家的靈感來源，若說女人內在的靈魂精魄過於虛無飄渺，宗教的神秘又過於唯心論，不如從文化層面的物質性著手。

藉由文學、藝術、大眾傳媒（雜誌、廣告、電影、電視）、網路空間等，大量產製美麗的身體，美貌神話也無時無刻在日常生活中浸淫在人類潛意識層面中，透過閱讀、瀏覽或是觀看的視覺動作，女性個體經由召喚產生了自我身體的認同基模。西方文學中最早展現出女性美貌的魅惑，具現在荷馬筆下波瀾壯闊的史詩《伊利亞圍城記》（或稱《木馬屠城記》）（*Iliad*）中。拉起特洛伊戰爭序幕的是希臘神話中著名的「帕里斯的評斷」（The Judgement of Paris）事件，起因於奧林匹亞女神的美貌競賽，天后赫拉、智慧女神雅典娜和愛神阿芙柔黛蒂等三位女神，她們無所不用其計討好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最後這位握有決審權的男性將富有美貌象徵的金蘋果判與愛神，交換條件是「要給他全世界最美的女人」（The fairest woman in all the world should be his.）（Edith Hamilton 219），由此可見美麗的女性成為（女）神與凡間男性的契約交換物，這也牽動了特洛伊城與希臘聯軍對海倫的爭奪，十年軍戎折損多少英雄好漢，生靈塗炭的悲慘之景似乎可定奪海倫的罪孽，然正當欲親刃海倫的米尼勞斯，卻因為眼睛的餘光落在其裸袒的胸部上，舉劍的手頹然落下，辯士戈吉亞斯（Gorgias）的《海倫頌》（*Encomium of Helen*），也因海倫具有無法抗拒的美麗而豁免於「紅顏禍水」的撻伐¹，宣告著美麗無罪。

¹荷馬在《依利亞圍城記》中，透過眾人的禮讚描寫著海倫的美麗及其對其美麗所懷有的恐懼：「難怪特洛伊人和亞該人這麼受苦，看她一眼：你就知道她像一個不朽的女神。不過，她雖然美麗，還是讓他們用船把她帶走吧，以免她為我們和我們的子女帶來大禍」大家這麼說。普利安召見海倫。「孩子，」他說，「這件事當然錯不在你，該怪諸神，使我們和亞該人發生這麼可怕的戰爭，是他們……」

然美麗的解讀也因時間、空間、文化維度的差異展現不同的美女典型。以體型觀之，若考察西洋藝術史，堪稱最早的維納斯典型為「維倫多夫的維納斯」

(Venus of Willendorf) 的史前時前雕塑，她擁有巨大下垂的乳房、豐滿的臀部、腫脹的下腹等，以現代審美標準觀之，在在顯示這位維納斯是一個不合格的臃腫裸女，但在遠古的文化脈絡中，豐碩的女性體態卻象徵著多產的生殖力。從中世紀到 19 世紀末期，豐腴的女性仍舊被視為性感的象徵，但這樣的認知卻在二十世紀初產生大幅度的變動，拜流行產業行銷成功所賜，西方在 1920 年代後期開始重視女性身材的纖細曼妙，主流價值觀甚至將其視為現代女性的理想體型，並將其與自由、不受拘束、年輕等價值觀劃上等號，在英國擁有纖細苗條的身材被視為女性改變身份階級的必備條件。由此可知，女性的理想體態是一個具有歷史演變的演進物，不同的體態標準也建構了不同時期女性對自身身體的美感經驗 (Sarah Grogan 18-29)。

美貌不僅是靠著「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蛸，齒如瓠犀」(《詩經·衛風·碩人》) 的天生麗質，有時必須透過身體外在的裝扮、修飾與改造，以達到加分效果，伊西多爾曾言：「正如門面增加建築之美，修辭增加議論之美，人體既可因其人工裝飾(衣服珠寶)，亦可因其天生裝飾(肚臍、牙齦、胸脯)而美」(Umberto Eco 111)。身體就像是提供裝飾的空白表面，為了追求美麗而改變/裝扮身體的歷史由來已久，一項銘刻身體表面的方式究竟是對人體造成損害或僅只是裝飾，是怪異/畸形或正常，並非取決於這個行為本身，而是根據鑲嵌在此行為背後的特定文化的美貌論述，同時也反映出性別、階級等交織在社會權力變動的複雜關係。就身體與人工裝飾的互動部分，以法國路易王朝為例，十八世紀的法國以宮廷服為中心，服裝講究美工極盡奢華，貴族無論男女皆費力打扮自己的外貌，不僅濃妝豔抹、還帶著假髮、腳蹬高跟鞋。直到法國大革命後才消弭了因階級產生的外貌差異，但外貌的差異卻逐漸轉成以性別為主軸重新組構，中產階級興起後，講究成熟與穩重的男性，發展出充分顯示男性力與美，以及易脫易穿等服裝特性，西裝嚴然成為二十世紀男士服飾的主流。相較於法國宮廷，女性在其美體工程的追求卻變本加厲，不論是束腹的馬甲、綴有泡泡袖、蕾絲花邊和羽毛裝飾等衣飾、珠寶飾品、鞋子、帽子、領巾、化妝、香水等有形、無形加諸於的外在裝飾品，或是紋身、身體穿孔等，藉由裝扮自然身體的繁複儀式與過程，女性展演出令男性賞心悅目的文化特質(或性感媚惑、嬌小玲瓏、端莊嫵熟等不同的美麗)，進而凸顯身體的展示性與被觀看性，此時身體的自然性與裝飾性依舊涇渭分明，直到科學技術對於自然身體的干預，人類對身體的文化觀念方產生巨變。

近幾世紀隨著醫療技術的進展，加上消費文化對身體可塑性觀念的推波助瀾，科技已堂而皇之的變成形塑當代美貌神話的主力之一。實則整形手術並非現代產物，最早的整形手術發生在西元前年 600 的印度，一位外科醫師利用病人的

額部重建外鼻，即印度鼻重建術，直至二十世紀中葉之前，整形手術大多以修復、減輕因先天、疾病、戰爭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畸形與傷殘為主。而現代整形手術事業的蓬勃發展可謂是得利於戰爭的爆發，尤其是一次和二次世界戰爭。海明威在其描寫巴黎生活回憶錄的《流動的饗宴》中，曾經這樣描繪那些經過整容的老兵：「他們臉上的皮膚銍亮，就像被壓平了的滑雪道」(?)，然此時的整形手術仍舊以修復戰爭傷殘為主要動機。二十世紀中葉後戰爭結束了，整形醫生轉移焦點，女性取代了受傷的男性士兵成為以美容為名的整型外科手術的新成員，至1960年整型手術包括除皺術、隆胸術才得到廣泛的女性認同，更藉由女性雜誌、媒體廣告、電視節目、情色雜誌（如 *Play Boy*）等宣傳大行其道，變成集體性的文化活動，進入那歐米·吳爾芙（Naomi Wolf）所形容的「手術年代」（Surgical Age），許多美國中產階級的婦女甚至認為：改變自己的容貌比改變傳統的文化容易得多。

一般而言，醫學美容產業的整型手術包括顱顏、身體四肢的整形，其中市場佔有率最高的前五名分別是乳房整形、抽脂、臉部拉皮、眼部整形與鼻部整形，其他整形手術項目還包括臉頰、下顎、唇部、牙齒、陰部、手部……等。根據 Kalorama Information 的統計，全球整形手術之市場規模從 2002 年的 98 億 9,970 萬美元成長到 2004 年的 108 億 1,540 萬美元。其中 2004 年美國地區的營收為 52 億 7,940 萬美元，非美國地區則為 55 億 3,600 萬美元。據美國美容外科醫學學會調查顯示，2007 年美國青少年進行美容的人數超過二十萬人，比 1997 年高出三倍以上。以修整耳朵為年美國青少年最為普遍的整形手術，包括矯正招風耳、左右耳對稱、以及穿耳洞等，主要年齡集中在 4 到 14 歲。其他還包括鼻子整形、增大下巴手術、乳房對稱與縮減手術，縮乳手術主要的對象為男孩，以解決男孩因膨大的乳房而形成的社會心理問題²。

在亞洲部分，美容整形手術在韓國、中國、日本、台灣也是一種潮流。尤以注重外表與門面的韓國社會為甚，不僅女明星的整型風潮令大家有目共睹，就連一般的上班族、大學畢業生、家庭主婦都視整型為非常普遍的美容，整體而言，韓國社會對整型態度保持開放的態度。對接受整形手術的韓國女性而言，面對國內高度競爭的就業環境，擁有美麗的臉孔及身材代表就業競爭資本，也反映了個人能力。近幾年來，中國青少年加入美容整型手術的行列也有逐漸升高的趨勢，專家分析原因不外乎激烈的社會競爭與就業壓力增大，加上韓國文化的衝擊和中國境內「人造美偶像明星」的成功案例形成的擴散效應。然美容手術並非女性的專利，其觸角亦延伸至男性領域，近年來在美國男性進行過藥物整容的人數增加了 25%。在韓國 20% 的男士曾經接受過整容手術。對日本男性而言，接受美容手術就像換衣服一樣容易與平常³。整體而言，在開發中國家或是已開發國家，

² 以上論述內容來自參考網站資料整理，網址內容詳見參考書目部分。

³ 同上。

美容整形手術的現象已是不分年齡、性別的運動。

另外現代整型手術還需置於醫療體制與消費市場的運作機制脈絡下審視，透過手術的介入，身體不僅是醫療干預的病體，更是一項需要加以整修的不完美商品，接受手術的病人同時具備著消費者與被物化/商品化的身份，推銷整型手術奇蹟式的改造力量、同時為醫療消費者滿意的身體，亦以一種帶有視覺景觀與展示科技效果的商品物件被引介進日常生活的脈絡中。如此整型手術向社會招示著：透過醫療科技的力量可以無限的拓展身體的可塑性，身體藉由現代科技的介入，得以重新塑造、設計、改建，不僅透露出對物質身體的輕蔑，整型手術對身體改變的沈醉與自信，也將身體視為「文化雕塑品」(cultural plastic) 的概念，然在整型手術的美麗光環下，卻演生出一連串的弊病，例如在自然身體不斷地隨時間逐漸老化、腐朽的生物事實中，整型手術卻違背自然流動的生理過程，訴求身體的年輕與完美性，進而模糊或遮掩身體生物面相的衰敗事實，甚或轉移科技整容的負面效果及其對人體的傷害。

整型手術機制對身體文化意義的銘刻以女性主義探討由來已久，女性主義對美貌神話的分析主要有兩個觀點：一為視「美貌神話為父權體制的壓迫」，可視為早期女權主義的訴求；二為將「美貌神話視為建構性的文化論述」，以下將分別敘述之：前者以《美貌神話》(The Beauty Myth) 為例，那歐米認為美貌神話與意識實則是西方父權體制恐懼女權運動為女性帶來自由與解放所興起的政治性策略——

由於女權運動已經成功的將大部分所謂的「婦女氣質」的虛構故事打破，因此原本散佈在虛構故事上的社會控制力量，必須重新轉移主題。把限制、禁忌、懲罰強加在解放後的婦女臉上和身體上。(56)

納歐米將美貌神話與機制視為父權思維的再現，主要目的是削弱女性主義運動的改革力量，整型手術是本世紀因應美貌神話得以迅速竄起的醫療事業，更隨著消費市場的操縱，美貌神話的幻覺急速成長並滲透的無以復加，對女性形成一種自我監視，並且併入女性的生與死中，那歐米將箝制於美貌神話的女性形容成了「鐵少女」⁴。從中文字中可以感受到納歐米對美貌神話的批判力道，然從學術的思考邏輯觀之，納歐米以一種撥亂反正的氣勢欲維護女權的受害者姿態，卻忽略了美貌神話的歷史複雜性，或是美貌神話與女體歡愉的複雜矛盾的關連等。從論述中讀者只能明顯的感受兩股水火不容的勢力，甚至消費文化也成為父權體制的下大將，也忽略了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共謀的細緻層面。

⁴ 原始的鐵少女是中世紀德國刑房理的工具，那是一副人形的棺木，外面畫著可愛的微笑少女，五官四肢俱全，不幸的犧牲品被慢慢封進裡面，蓋子落下，夾住被害人，使他動彈不得。這個人若不是活活餓死就是被插入鐵少女體內的尖鐵條刺死。女性陷入的現代幻覺也和「鐵少女」同樣堅固、殘忍和委婉的經過粉飾。

後現代女性主義觀點把重點擺在女體多重意義的顯現，以及美貌與女性特質的文化論述中所潛藏暗渡的權力運作。在此身體被視為用以書寫文化意義的文本，永遠可以在其上刻劃新的意義與符碼。透過科學論述、醫學技術、大眾媒體以及日常生活實踐，也建構出女性特質的千萬風貌，此派的代表人物是蘇珊伯多（Susan Bordo），她把研究焦點擺在：女體的意象如何成為西方文化建構性別/權力關係的場域，從這個理論架構出發，日復一日的美容程序背後，有一隻紀律化與正常化的黑手，專司身體的保養與改變，協助生產「柔順的身體」（docile bodies），不同於納歐米的論述，在此女性特質被視為是一種建構物，而建構的過程及包含了權力，權力不是由上而下的壓制或宰制，而是透過生活各層面建構女性特質的媒介。（Kathy Davis？）

無獨有偶，當學術界對整型現象投注熱切的關切時，美容整型的議題也成為青少年/成人小說創作的題材選擇，尤其是科幻小說領域，即書寫者藉由科幻小說的書寫範式與文字的虛構，反應其對整型手術的評價與觀點，由此回歸對現實社會的關懷。在《小說的藝術》的談話中，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 1929-）曾說過這樣的一段話：「小說不研究現實，而是研究存在。存在並不是已經發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場所。是一切人可以成為的，一切人可以能夠的。小說家發現人們這種或那種可能，繪出『存在的地圖』」（？）此段話可視為科幻小說家的創作宗旨，相較於學術界對現實的批判，創作無疑是對人類存在之境提出另一種審視的角度。面對整型手術事業蓬勃發展的當代文化現象，科幻小說家如何藉由語言符碼再現、詮釋之？或者藉由何種元素重新組構之？他們站在何種書寫位置揭露整型手術與身體的關係？他們如何搖起筆桿或是敲下鍵盤虛構幻想世界，以探勘人類的生存境遇與生命本質？這是研究者想要探究的疑問。

就研究者所知以此議題創作的科幻小說，若以創作年代區分，包括一九七〇年代中期大陸科幻作家宋宜昌首度創作的長篇科幻小說《V 的貶值》⁵，V 是維納斯的英文字頭。文本敘述「一個塑膠公司創造了一種可以改變人類外表的塑膠粉，有了這種塑膠，任何長相的人都可以在頃刻成為美女。美於是大打折扣」（吳岩博克文章），其背後詮釋的邏輯概念為美是相對比較的價值觀；再者為 Ted Chiang 收錄在 *Stories of Your Life and Others* 的短篇科幻小說“Liking What You See: A Documentary”；再者為史考特·威斯特菲德（Scott Westerfeld）於二〇〇六陸續出版的《醜人兒》三部曲，受限於研究文本取得的難易度，並考量是否以台灣青少年讀者為銷售對象的廣泛度，研究者以史考特·威斯特菲德《醜人兒》三部曲為研究文本。

⁵ 馮臻將此部具有外邦色彩的中國科幻小說至於中國現代性的探討脈絡，認為作者寓意在於批判西方現代社會整體精神，並主張解救西方的良藥唯有依賴東方的傳統文化，然這種東方拯救西方的想向關係的建立，卻被馮臻視為一種體現中國的民族情感與精神勝利意識形態，也體現了中國科幻作家對步入現代性的期許和信心。收錄在《現代性與中國科幻文學》，頁 121-193。

第二節 選讀文本理由/研究文本介紹

史考特·威斯特菲德（Scott Westerfeld，1963-）是近幾年來興起的青少年小說新銳作家，其作品皆在澳洲和美國榮獲文學獎項的殊榮。二〇〇〇年發表的科幻小說《進化寵兒》榮獲具有科幻小說指標性獎項的菲利普 K 迪克獎，二〇〇四年出版的《我是時尚獵人》（*So Yesterday*）和《秘密時光》榮獲澳洲維多利亞省長文學獎（AVPA）和奧瑞里司獎（AAA），二〇〇六年出版的《醜人兒》（*Uglies*）更將威斯特菲德的創作成果推展至高峰，不僅榮獲美國圖書館協會的年度最佳青少年小說獎（ALA），更在西方世界掀起一陣狂飆的銷售量，在紐約時代最佳暢銷書的排行榜中，《醜人兒》三部曲更是榜上有名，甚至翻譯至歐亞等九國，其電影版權由二十世紀福斯公司取得，預計二〇〇八開拍。從書籍銷售量成績、文學獎項肯定和受到電影製片商青睞等種種文化現象關照，《醜人兒》三部曲可說是當今熱門的青少年小說之一，不僅是文學獎項所凸顯的文本文學價值，還包括在資本主義的商業行銷活動中取得象徵名聲、財富的市場佔有率，更堂而論之電影開拍所帶來可預見的商機，也難怪史考特·威斯特菲德會被冠上「紐約時報暢銷金獎作家」的頭銜。

進一步從各方書評評語觀之，無可置疑，《醜人兒》三部曲具有積極的教育性與啟發性，在一份針對美國青少年女性設計的得獎作品的閱讀書單中，《醜人兒》也名列其中，不難揣測其被歸類為女性青少年讀本的動機⁶；另外從其文本內容觀之，《醜人兒》三部曲可歸類為具有反烏托邦（dystopia）性質的科幻小說，值得關注的是：當今歐美兒童文學亞文類中，具有科幻性質的文本書寫已成為具有不可忽視的勢力，一如弗德里克·詹姆遜（詹明信）將科幻文學視為當今重要的文化表徵之一「科幻小說在形式上與 19 世紀歷史小說出現一樣重要。與歷史小說一樣，科幻小說標誌著一種新的歷史意識的出現，一種新的再現」（引述自馮臻 121）。



壹、研究文本挑選標準

本論文主要以《醜人兒》三部曲為文本分析對象，不可諱言，研究者選擇這套書的原因主要是奠基在以讀者興趣為主的研究考量。就「讀者興趣」而言，研究者第一次接觸《醜人兒》並非英文原文，是由尖端出版的中文譯本，首先吸引研究者的是具有後現代解構意味的中文版封面設計（見左圖），透過一些美容工具的散狀排列，人類的面目在解構過程中也無形中重組了，暗示著美麗價值觀在文化

⁶ 此篇“*What's a Girl to Read?*”由 Justine Henning 發表在 Book Review 的網站：
<http://www.nytimes.com/2006/03/12/books/review/12henning.html>

實踐過程中的建構性，一如威斯特菲德在其訪談所說的「我們正明確地朝向一個大多數人能夠決定自身外貌的世界，而這將會改變我們對美的看法和美對我們的意義」⁷。另外文本結構的緊湊性和敘述氛圍營造的緊張性，不僅是威斯特菲德擅長的創作風格，同時也是吸引研究者閱讀目光的因素。文本在「未來的世界裡，所有人到了十六歲都必須進行全身整型手術成為美人」的主題下展開序幕，從敘述結構觀之，文本不僅透過二元論述的衝突架構其張力：「城市/封閉/保護/人工改造/被控管/有陰謀的/宰制的/溫室花朵/被隱瞞扭曲的歷史/集體認同的美/單一標準化」與「非城市的郊區野外/開放/天然的/自力更生/對抗者/經過大自然洗禮/對抗官方論述/拒絕被改造/保有自己的面目/多元共生」，更在情節的鋪陳與描述上，透過一連串主角人物應用高科技設備所展開的水平面與垂直面追緝與逃脫行動中，讀者得以在閱讀視覺化的立體思維中享受文字帶來的速度感。

上者是針對為讀者位置的喜好，若就研究的價值面向考量，研究文本可從三個方面談論之：

（一）史考特·威斯特菲德以科幻小說文類作為文本架構，關注當今流行文化對身體極度頌揚與渴望的現象

長久以來，中西學術界對科幻小說的界說處於曖昧與模稜兩可的紛擾中，在此研究者先簡述本文所採取的「科幻小說」立場，再者釐清科幻與現實世界的關連性，進而探討威斯特菲德對流行文化現象投入的人文關懷。「科幻」一詞源自於一九三〇年代⁸，然此文類早在十九末期便以「科幻傳奇/羅曼」名稱（Scientific Romance）獲得廣大讀者的喜愛，就連素有「科幻小說之父」之稱的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 1866-1946）也將自身的作品視為「科幻羅曼」作品。廣義的說法，科幻小說即是探索人類存在的可能境遇，題材涉及未來時空的非現實體驗、未知空間、未知生命形式以及文明潛藏的危機探討等。本研究採取的科幻定義為目前任教於加拿大 McGill 大學的蘇文教授（Darko Suvin）之說法，「科幻的特色是一個由認知邏輯確認的虛構『新奇』（新穎，創新）的敘事宰制或霸權」⁹（單德興譯 27）。這句饒舌的譯文其關鍵字在於「新奇」、「認知」，科幻小說中的新奇不僅是創作手法，更是其中介類型，即「新奇」是科幻小說的媒介形式，新奇促使科幻文本具有「整體化」（totalizing）的現象或關係，作者透過文字符碼虛構出的想像框架，與自身所處的經驗環境或是「零世界」（zero world）產生疏離的距離，主要表徵在人物角色透過時空置換的模式，例如威爾斯的《時間機器》，主角時間旅行者乘坐時間機器，自由地穿梭過去與未來之間，旅行的隱喻凸顯了時

⁷ 原文為：We are definitely heading toward a world in which lots of people will get to decide how they look. That will change what we think of as beautiful, and what beauty means to us.

⁸ Hugo Gernsback 於 1926 年在美國創辦雜誌 Amazing Stories 鼓吹 scientifiction, 1929 年更名為 Science Fiction, 在 1949 年由 Charles D. Horning 正式以此命名為其主編雜誌。

⁹ 原文為：SF is distinguished by the narrative dominance or hegemony of a fictional “novum” (novelty, innovation) validated by cognitive logic.

空置換的跳躍性；或是周遭現實本身的差異，又如《醜人兒》三部曲透過情節的次第描述，可能是天空的晚霞色澤調配的趨近完美、可能是房間由人工智慧型電腦操縱可隨時回應你的命令、甚至與你對話等，讓讀者產生與現實世界漸進式的拉距，此兩者例子導致的「存在現實的實體改變」，形成所謂的「變體」，然新奇所產生的變體便非是不可理解的天方夜譚，也區別於神話或幻想小說中的天馬行空，其必須建構在「認知邏輯的理解範圍」中，當然此認知邏輯並非侷限狹隘的實驗室的科學實驗或是客觀的實證觀察，而是符合作者現實中和/或根據其文化科學典範的可能性，即支配此第二世界的法則或規範來自於對現實世界的模擬，整體而言，科幻小說的主要要素必須建立在新奇與認知的相互作用上。

相對於讀者、作者身處的現實世界，科幻文本運用新奇變體產生的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具有替代現實（alternate reality）的特徵，換言之，這種另類時空的虛構可視為具有「他者」寓言式的鏡像對照功能，現實與虛構呈現出兩種不同歷史時間，彼此並非決然平行而是相互交織的類比與呼應，總體而言，科幻小說是歸屬於我們的故事（de nobis fibula narratur）。就閱讀活動而言，新奇促使了現實疏離化—當科幻文本的敘事空間和/或行動媒介與讀者所屬的、熟悉的文化/社會規範截然不同時，也形成所謂張力式的「回饋擺盪」（feedback oscillation），讀者為了理解由敘事結構描述的新奇，必須以自身所處的現實規範為出發點，擺向服膺認知邏輯的新奇，對新奇的理解所獲知的觀感也將擺回對現實世界的重新關照與審視，這一來一往認知貼和就像是鐘擺的擺盪，最終形成讀者對現實的反省或批判關懷（Darko Suvin 27-48）。

威斯特菲對《醜人兒》三部曲的創作靈感來自於 Ted Chiang 收錄在 *Stories of Your Life and Others* 的短篇科幻小說“Liking What You See: A Documentary”，明示了科幻作家對美貌現象的關注。當下流行文化不管是男性的健壯或是女性的窈窕，顯示身體不再只是既定、自然的肉體，而是變成了儀式化的客體，具有展演的概念，尤其是女體更是無所不在，廣告和消費文本不斷的複製著特定女性身影，塑造出年輕、貌美、苗條的主流意識，如果主流社會要求女人必須美麗/年輕/纖細，受到召喚的女性便內化/認同/渴望文化對理想女性的性別期待，殊不知資本主義背後的商業操弄與控制難逃父權制度的凝視機制，男性才是女體的凝視者與持有者。承上所言，科幻小說是透過變體、放大、扭曲的方法關注現實世界，《醜人兒》三部曲與其說是警世小說，不如說是對當下主流文化瀰漫的美貌迷思/身體崇拜提出另一種想像（what if?）。在文本中，男性對女性身體的性慾投射轉化成大人權威對青少年的殖民，在每個人必須接受整型手術的前題設計下，讓讀者深化思考成為美人所付出的代價：這複雜體系中是誰握有決定整型美貌的理想標準？在這看似多樣實則單一的美貌標準中，什麼樣的身體現象被視為怪異而被拒斥在外？城市當局為什麼剝奪青少年擁有選擇接受手術與否的權力？又相較於此種情景，保有自己本來面目的青少年個體意味著什麼？

（二）在「反烏托邦」傳統的承繼中，扣緊控制/自由的命題，展現青少年叛逆/服從與大人權威宰制的權力協商場域

烏托邦是西方淵遠流長的文學傳統，甚至在十八世紀之後轉為走向社會理論和政治思想領域的實踐層面。研究者依循上文的書寫脈絡，先釐清科幻與烏托邦間的關連，進而梳理烏托邦和反烏托邦的辯證關係。科幻小說與烏托邦傳統的發展脈絡可謂是相互交疊，或有這麼一說：烏托邦小說的原型可追溯至柏拉圖的《理想國》，然遲至十七世紀，烏托邦式的小說才明顯的表現出對於科學/科技力量的樂觀態度與重視，例如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新大西島》（The New Atlantis）中對科學的重視具現在以探討事物本原即其運行奧秘的所羅門宮

（Salomon's House）；康帕內拉（Tommaso Campanella，1568-1639）《太陽城》對古老科學如天文學、星象學的信心或是對未來科技預言式的展望，當科學/技術逐漸作為創作的主題或欣賞的品味時，科幻小說也儼然誕生，學界認為以雪萊·瑪麗（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1797-1851）的《科學怪人：現代普羅米修斯》（*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拉起了西方科幻小說的序幕，同時此部小說也標誌著惡托邦式科幻小說的出現與合流。

反烏托邦或惡托邦可謂是烏托邦（尤其是優托邦）的另一種思考，兩者交疊的運動軌跡也應證了西方「正-反-合」的思維邏輯，若將優托邦視為烏托邦的正題，惡托邦便是從正題的變動中延伸出的反題，看似相對、衝突，實則是呈現一個螺旋式的衝撞與變動，要瞭解此一體兩面的雙重悖論關係必須從烏托邦的源流開始考察。烏托邦（utopia）是英國人文主義者托馬斯·摩爾（Thomas More，1478-1535）以拉丁語書寫的同名小說，烏托邦是根據希臘語創造出來的術語，其詞源意義有兩種說法：其一是“eutopia”（優托邦），意指好的地方與樂土（happy land），具有明顯的價值評斷意味；其二是“outopia”意指沒有地方（nowhere），或是不存在於客觀世界的「烏有之鄉」或想像之地。由此觀之，“outopia”源自於對空間的聯想，在空間座標上，烏托邦將寄情於理想化國度的憧憬與追求投注於他處，一個美好的異邦大多是渺不可及的神秘之處，且烏托邦世界有一個鮮明的特徵，即其所訴求的人性純粹必須建立在時間與空間的封閉系統中方可維持，此部分於後詳述之。王爾德（Oscar Wilde，1854-1900）在其〈在社會主義下的人類靈魂〉（“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論述中有這麼一句話：「世界地圖如果沒有包含一塊烏托邦，它甚至不值一瞥，因為它缺少呈載人性的地方，當人性降臨這個國度時，它就向外展望，看到一個更加美好的國家，向前駛去。進步就是烏托邦的實現」¹⁰。換言之，透過一個空間國度的具現（visible），烏托邦也是一種人類對自身存在處境的研究與揭示的重要思想維度。然西方學者如克利斯罕·庫瑪（Krishan Kumar）認為必須將烏托邦置於現代性的脈絡觀之，唯有

¹⁰ 原文為：A map of the world that does not include Utopia is not worth even glancing at, for it leaves out the one country at which Humanity is always landing. And when Humanity lands there, it looks out, and, seeing a better country, sets sail. Progress is the realisation of Utopias.

在中世紀基督教世界的原罪觀念不再束縛人類的主體意識發展時，當人類不再將眼光熱切地投注來世的天國祈禱、上帝的救贖與憐憫時，人類方可對其自身賦予更多的信任與肯定，深信人類自身具有無限潛力的主體意識張揚在理性、進步與科學的追求上，「現代烏托邦主要建立在理性、科學和進步的觀念上，它本質上是近代社會的產物，可以說，烏托邦是現代性的一個成果」(轉引自謝江平 10)。

但隨著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資本主義的壟斷造成的矛盾與衝突、經濟危機導致的兩次世界大戰、法西斯主義造成的種族屠殺、史達林的集權專制政府、美蘇兩大陣營的核武擴充、冷戰、因地球暖化造成的生態危機等，科學、進步與理性並沒有消除國族、種族之間的緊張與對立，反而驅使慘絕人寰的戰爭與屠殺更加的精確與專業化，生產的激增所帶來的消費卻使得人們被物化，技術進步也使得人類成為機械化的單向度人，這種種揭示了烏托邦思想會因其自身的辯證邏輯走向它的反面，由此觀之，現實外在「語境」的發展演變也從另一個方面推動烏托邦向反烏托邦的方向發展，一如庫瑪所言「烏托邦始於絕對的自由，終於絕對的專制」(轉引自謝江平 12)，而反烏托邦的出現便是揭露潛藏在現代性原則中的強制與壓迫性質，更是對進步、科學和理性觀念光明面向的質疑。庫瑪也認為反烏托邦源自於人們對烏托邦期望幻滅的挫折感與折射「無論是整個世界還是個人生活都沒有出現他們在烏托邦所努力渴求的景象。反面烏托邦是他們對自己愚蠢幻想的惡意諷刺與報復」(轉引自謝江平 11)，反烏托邦可謂是對烏托邦激情消逝後的冷然。

不論是烏(優)托邦小說藉由一個肯定的完美形象，否定現在、既存的當下，以寄託未來；或是烏(惡)托邦小說藉由另一種負面的恐怖形象，預視不久將來的荒謬，以重新審視當下，合而觀之，這種肯定/否定並非決然的，而是否定中包含著對肯定的期盼，肯定的實踐中又蘊含著否定的可能，因此烏托邦/反烏托邦的敘事結構是具有開放性的對話系統，以現在追尋既往，以將來反襯當前，從現在擺盪未來的對話，使得烏托邦/反烏托邦以現在為基礎，直指著對現實社會制度的批判與思索，而未來正以尚未完成的狀態永遠激勵著我們。

進一步探索，《醜人兒》三部曲的小說議題亦承繼了反烏托邦的小說傳統，最著名的反烏托三部曲為俄國作家薩米爾敦的《我們》(或譯《反烏托邦與自由》)、赫胥黎(Aldous Huxley, 1894-1963)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和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的《一九八四》(1984)。在《我們》中，冷冰冰的編號取代了姓名成為每個人的識別證，理性的完美造就了人性的冷酷與疏離，我的個體性被泯滅於我們的集體性與國家利益中。在《美麗新世界》的福特世紀，汽車工業主導世界經濟的運作，人類在人工孵化後被分類管制，以便將來能夠各安其位，然察覺社會缺陷的先知者最後卻因為群體的凝視壓力而羞愧自殺，社會再度淨化，世界終究沒有因為約翰的大聲疾呼被撼動一絲一毫回

歸其正常的軌道。對科技進展的憂心忡忡與警告以歐威爾的《一九八四》達到高潮，集權政府藉由對大眾傳媒的掌控不斷製造假象、歪曲歷史與真實，利用試圖顛倒是非的雙言巧語（double speak or double talk）模糊了人民的判斷，例如「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而話語機制憑藉著電幕與竊聽器的設置，對全民進行全面性宰制與掌控，無孔不入的思想警察不間斷地監視，慎防異己思想或叛逆份子的滲透，整個社會就像是邊沁所說的「全景式的監獄」，而無所不在卻隱身不見的「老大哥正看著你！」此三部作品皆圍繞在社會制度化、科學的理性化、極權主義的監控等主題上，不同於前者凸顯極權政府挾著進步的科技造成人類心靈的扭曲。反觀《醜人兒》三部曲，文本的嚴謹與深刻性建立在將青少年對美貌的期待與成人對青少年慾望的掌控相連結，藉此揭露整型手術（科學技術）對青少年產生的身體損害與精神壓制。換言之，成為美人的背後陰謀即是成人對青少年計畫性的制約，藉此消解青少年的叛逆與反叛，以達到城市的安定。整體而論，《醜人兒》三部曲可化約成控制/自由、權威/反抗、集體/個人，整型手術讓青少年改變自己原有的面貌，選擇與拒絕之間的互動產生了青少年個體、身體、文化價值觀的協商過程，成人/青少年兩者之間所延伸的權力拉扯與協商，質問著烏托邦式世界的存在意義。

（三）藉由女主角塔莉主體位置的猶疑/遊移性，不僅展現青少年主體認同議題的複雜性，亦標示著青少年小說「啟蒙」的象徵意義

在文本的設定中，塔莉居住的城市不論何種性別的青少年都必須接受手術成為美人，但需要釐清的是，研究者以女主角塔莉作為青少年主體認同析論的關注焦點，並非刻意凸顯其性別差異，而是將其視為相較於大人權威的青少年個體代表之一，考量點如下：姑且不論威斯特菲為何選擇女性作為文本的主要敘述者，平心而論，從文學技巧觀之，男性的刻畫遠較為女性遜色許多，不論是堅持反對整型手術的醜人/並非在城市成長的大衛或是接受整型手術的城市青少年帕里斯，對自身的身份認同表現出僵化、單面的固著性，且研究者認為較為可惜的是威斯特菲對薩納的描寫並沒有太多的著墨。一直努力想要保持自我意識的美人薩納因為腦部受損嚴重成為植物人，最後醫生不得不關閉其賴以維生的醫療系統，薩納的折翼暗示著潛藏在整型手術背後的技術性危險，他不顧一切追求自由的叛逃行動與企圖為青少年個體譜寫出反抗科技威權的輓歌，最終的失敗與殞落使得薩納蒙上一襲浪漫色彩，凸顯角色對照的功能性。反觀貫穿三部曲的女主角塔莉，透過身體不同位置的轉換與過程—從醜人、美人到異人的身份轉移，展現了青少年主體位置的流動性、變化性與操演意義，換言之，身體可解讀成在文化場域中不斷被銘刻、建構意義的文本，塔莉身份的變化不僅意味著外觀身體的變化，也包含了塔莉對外人際互動關係的不同，因此身體可視為一個權力的場域，權力在身體的層面上，不斷的被經驗、被轉換著，透過身體的在場也得以形塑主體性，而塔莉外觀的不同面貌也意味著：主體認同並非存在的狀態，而是逐漸且持續演變的過程。

另一個角度，塔莉反烏托邦的冒險經歷亦標誌著青少年小說的「啓蒙」特徵，個體在成長過程中，啓蒙意義同時也代表個體過去心智的死亡與重生。當塔莉瞭解的世界並非如自己想像的完美無缺時，她的天真也因為揭露理解真相而消失，相對的從一個受到保護與無所顧慮的童年狀態進入成人現實社會的尖銳與殘酷，一如塔莉的經歷，青少年將會驚覺的發現，他/她所被教導的、所認知的一切並非完全是對的、真實的，成人世界在權威的遮掩下充滿著墮落、貪婪、不擇手段等缺陷。一如 David Peck 所言：

啓蒙在人的發展中是一種基本的過程，……在成人世界中，覺醒與失望是很普遍的。我們在啓蒙的過程中發現我們的童年幻想多麼有限。經由啓蒙過程，我們確認認清哪些是我們能像成人一樣達成的目標，哪些是我們應該拋棄的價值和行為模式。（David Peck ix；張子樟譯 17）

啓蒙所帶來的覺醒試煉雖然痛苦，然這個苦澀的滋味並非讓青少年對上一代感到羞愧與失望而是寬容，從而伸展出股向闖黑與腐爛扎根的力量，進而投奔燦爛千陽，而世界的舞台永遠為他們保留一席之地。

貳、文本內容介紹

小說建構在一個具有高度科技文明開展但資源相對稀少的世界，在經歷過「鐵鏽時期」具有毀滅性的世紀石油浩劫—石油因細菌感染導致狀態不穩定，遇到氧氣便會爆炸，地球的人口數量急遽衰減，無法組織成國家體系的人群逐漸聚集成少數具有各自獨立政治地位的城市。每一個城市維持在一個生態平衡的環境結構中，天氣、食物等生活必需品是經由科技控管並提供，沒有任何特例和意外發生。塔莉居住的城市具有嚴格的社會身份系統，依照年齡劃分包括小孩（littles/childrens）、醜人（uglies/adolescents）、新美人（new pretties/teenagers and young adults）、中年美人（middle pretties/adults）和老美人（crumblies/retired adults），就連這種結構性的分類思維也凸顯在城市的空間規劃，城市環境大致分成醜人城和美人城，一條環形的河水隔絕了這兩個城鎮，對醜人而言，美人鎮是禁區，除非你/妳到了十六歲接受手術後成為美人後，只要成為美人鎮的一員，你/妳便可以日日夜夜享有無盡地尋歡作樂的權利。城市包括特勤局與保安局等的安全機構，分佈在城鎮的外圍，由被城市挑選出中年美人或新美人擔任要職，就像城市的看守者/守門人負責城市的安全，也慎防不屬於城市的激進叛逆份子滲透或散佈不利城市的謠言，基本上醜人城市是三不管地帶，醜人與父母親（中年美人）的互動呈現較為疏離的狀態，自從個體脫離稚嫩邁入十二歲之後，便是城市中所謂的醜人，這些青少年脫離父母的保護，團體寄居在醜人的學校宿舍。

塔莉的城市規定所有人必須在十六歲時接受全身整行手術，手術結束後你/妳將成為美人，擁有令人難以置信的美麗臉孔。塔莉嚮往並期待接受手術成為美人的那一天，就在一次闖入新美人鎮探視好朋友帕里斯時，她認識了和自己同一天生日的醜人雪宜。然而雪宜卻斷斷續續地與反對城市對青少年實施手術機制的反叛團體「煙城」有所聯繫。拒絕成為美人的雪宜為了保有自己本來的面目，決定邀請塔莉一同成為城市的逃亡者，但塔莉為了遵守與帕里斯的約定斷然拒絕，並答應雪宜保守煙城的秘密，雪宜見塔莉心意已決便獨自離開，卻刻意留下一張神秘的紙條，告知塔莉有關通往煙城所在地的線索。

然塔莉的整型手術卻因為特勤局首腦凱波博士的干涉嘎然停止，無情的凱波博士脅迫塔莉必須依循雪宜留下的謎語，找到煙城的所在地並回報特勤局後，才獲准接受手術。為了成為美人，塔莉不得不選擇作為間諜滲透煙城，隻身來到煙城的塔莉認識了煙城的青少年領袖大衛並與之墜入情網，在與大衛的父母親－瑪蒂與阿茲（兩人過去皆是城市執行整型手術的醫生）談話後，她慢慢地理解整型手術背後的陰謀：在光鮮亮麗的美貌與身體機能的強化下，手術不僅造成大腦的毀損，它讓青少年更加地溫馴、服從權威，成為美人後，你/妳將不再產生負面情緒、不再具備創造力，甚至放棄自己的個體性。儘管塔莉下定決心融入煙城，但她摧毀追蹤器之舉卻引來無法挽回的後果－啟動了追蹤器，煙城被接獲訊息的特勤局殘酷破壞，大部分的煙城青少年被逮捕回城市接受手術，雪宜變成了大腦受傷的美人，阿茲也在此次搜捕行動中喪失生命，煙城人的損失慘重歸罪於塔莉對煙城的背叛。在此同時，瑪蒂研發出得以治癒整型手術對青少年造成大腦損害的藥物，但需要一個自願的美人測試藥物的效度與安全性，雪宜拒絕了，為了彌補自身的罪惡感，塔莉決定回到城市接受手術，並簽下同意書日後自願接受瑪蒂的藥物測試。

成為美人的塔莉穿著煙城時期留下的毛衣參加新美人鎮的第一次派對，希望能夠藉由這件酷炫服裝獲准成為犯罪社成員。宴會上，一名裝扮成特務員身分的青少年勾起了塔莉關於過去煙城、醜人的記憶，但這些記憶因為手術後的損傷變得片段、不連結。眼前特勤員漂浮不定的灰色身影若有似無的催促塔莉探詢，原來偽裝者的真實身份是昔日煙城伙伴克羅伊，而他潛入新美人鎮的目的是代替大衛，傳遞重要訊息給塔莉，克羅伊的出現也為塔莉的美人生活掀起了不安的巨變。

犯罪社社長薩納積極的催促塔莉一同尋找克羅伊留下的秘密，是一封過去醜人塔莉寫給未來美人塔莉的信和兩片藥丸，信中陳述了整型手術的真相和服用藥丸的自願性，就在特務員闖入房間盤問他們之前，拿不定主意的塔莉提出和薩納分享藥丸的想法。吞下藥丸的兩人以保持「酷炫」（bubbly）為主要目標。酷炫是美人對於酷的俚語或行話，不僅是對某件新奇事情的評價與看法，更是指心智擁有敏銳清晰的狀態，有助於脫離整型手術造成的大腦混沌模糊，使美人能夠更

加明確專注的思考。爲了讓犯罪社成員維持酷炫的狀態，塔莉與薩納決定在美人鎮策劃一場史無前例的破壞－空中溜冰場的破冰倒塌事件。酷炫的狀態也讓雪宜喚起了醜人時期的記憶，包括塔莉的背叛、煙城的毀滅、大衛投注塔莉身上的關愛和自由的喪失等，更在得知塔莉將解藥分給薩納時嘩然變顏，雪宜的憤怒使得兩人友情再度面臨危機，退出犯罪社的雪宜自行成立卡特族（Catters），透過自殘的方式保持大腦清晰。

塔莉的清醒意識使得她更加察覺城市對新美人的管制與監控，無時無刻計畫著離開如監獄般的新美人鎮，而薩納也因爲解藥引發的頭痛副作用，干涉日常生活作息。兩人夥同社團成員，利用熱氣球策動另一波逃亡行動，目的是新煙城。然在熱氣球上，帕里斯的離陣脫逃與爭辯延誤了塔莉的降落時間，偏離預定地的塔莉闖入了城市爲了從事實驗而秘密設置的原始部族保護區，塔莉驚人的臉孔和酷炫的刺青被部落人視爲被放逐的天神。爲了離開保護區前往約定地點，部落祭司安德魯陪同她前往「世界的盡頭」－掛滿人形娃娃裝置的森林，企圖穿越森林的塔莉卻受挫於足以癱瘓人類神經系統的「小人」，才理解城市利用高科技保全系統，限制部落人的空間範圍，保持部落人的天真、原始和野蠻，以便對之進行腦部實驗與剝削，最後塔莉搶奪了飛車離開保留區前往鐵鏽廢墟，沒想到竟是久別不見的大衛在那等待她。

瑪蒂向來到新煙城的塔莉解釋薩納的腦部狀況，最主要的原因是兩顆藥丸必須同時服用才能有效的移除大腦損害，薩納吞下的藥丸必須配合塔莉的藥丸才能抑制奈米分子的再生，否則奈米會繼續侵蝕腦部，倘若單獨吞下抑制性的藥丸是不會對手術造成的腦部傷害給予任何治療作用，換言之，塔莉是靠著自己的方式治癒的，但卻被瑪蒂視爲不可能。就在塔莉來到新煙城後，特勤局首腦塔波博士啓動了秘密裝在薩納牙齒內部的追蹤器，追蹤器再一次洩漏新煙城位置，塔莉不理會大衛的建議選擇留下來陪伴薩納，爲了讓左右爲難的大衛成功脫逃，塔莉不得不讓大衛誤解自己是個尚未治癒的空洞美人，認定自己的留下只是受到薩納的生物性吸引。塔莉和受傷的薩納靜靜地等待特勤局的到來，沒想到迎接塔莉的特勤員竟是雪宜，在塔莉陷入昏迷前，雪宜強迫塔莉接受特勤員的改變手術。

變成特務員的塔莉隸屬於雪宜的「卡特族」，雪宜被視爲這些青少年特勤員的領袖，稱爲「老大」（“Boss”），其他的成員包括塔克、何和在新煙城逃脫失敗的佛斯特等人。爲了偵探新煙城反叛者的後續行動，塔莉一行人偽裝成醜人參加醜人的跳舞聚會，特務員的進階手術增加了塔莉覺察的靈敏度與身體感官潛能，她注意到一名女子鬼鬼祟祟地正傳遞一包藥丸給她舞伴，塔莉和其他成員尾隨這名女子進入森林，卻遭到早已埋伏等待的新煙城人攻擊，最後大衛和新煙城伙伴俘虜了無意識的塔克和佛斯特，並將陷入昏迷的雪宜棄置在河水中，及時趕到的塔莉讓雪宜免於溺斃。

稍後塔莉認知醜人傳遞的藥丸是新煙城人給予薩納的治療嘗試，潛入美人鎮的塔莉驚覺薩納已經不像以前那樣酷炫了，整型手術再度將他變成腦袋空洞的美人。爲了讓薩納擁有特勤員的清晰意識，塔莉預謀讓薩納加入特勤員，首先說服雪宜協助她癱瘓城市兵工廠的運作，再者說服薩納和犯罪社成員再度逃離城市投奔新煙城，兩人計畫在尾隨至犯罪社成員之後，在薩納等人一旦抵達新煙城時，便假裝逮捕脫逃的薩納回到城市，讓塔波博士相信薩納具有成爲特勤員的叛逆特質。

脫離城市的薩納等人遇見了安德魯，逃離保留區的安德魯成爲煙城人的盟友，提供位置導航器給逃亡者，然而導航器指引的位置並非新煙城的真實位置，只是煙城的接濟站。煙城派遣直昇機接濟薩納一行人，而跟蹤的塔莉也隨著直昇機來到了新煙城。沒想到新煙城人得到了迪亞哥城市的政治庇護，這個城市擁有不會刻意造成腦部傷害的整型手術，且允許多樣性的面孔出現。來到迪亞哥的塔莉遇見了被治癒的佛斯特，爲了躲避一心想治癒她的佛斯特，塔莉跳下峭壁不慎摔成了重傷，昏迷的塔莉爲迪亞哥當權囚禁，特務員手術改造後的特異身體讓塔莉被迪亞哥當局視爲危險武器，強迫她接受正常手術，然此時控制城市的塔波博士計畫佔領迪亞哥，及時到來的雪宜以塔莉可做爲內應的理由說服當局打消手術念頭。

回到城市的塔莉向凱波博士坦承自己才是襲擊兵工廠的主謀者，早已心知肚明的博士卻利用此事羅織出兵迪亞哥的藉口，讓迪亞哥人民也一併接受城市的整型標準。爲了阻止博士的野心，塔莉及時生計將解藥注射進凱波博士體內。凱波博士的心智恢復正常，但塔莉也因爲特務員身份箝制在手術室中，城市委員會下令將所有的特務員「正常化」，因爲他們都是精神病患者（psychos），就在千鈞一髮之際，凱波博士阻止了手術進行，宣稱「她希望她的創造能留一個在世界上」，最終塔莉因爲特務員的身份存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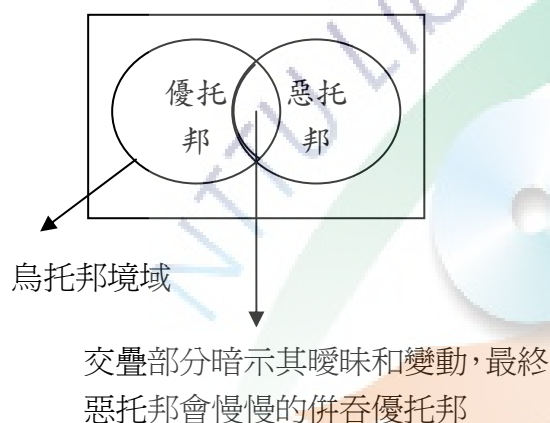
回到鐵鏽廢墟的塔莉遇見了大衛，未來的她將和大衛漫遊在各城市間，只要造成腦部損害的整型手術散播在某一個城市，他們將會出現在那兒，提醒人們鐵鏽時期的人們爲自由所償付的代價，「我們必須對世界小心翼翼，或許，下一次我們再度見面時，世界會變得很醜」！

第三節 研究問題與架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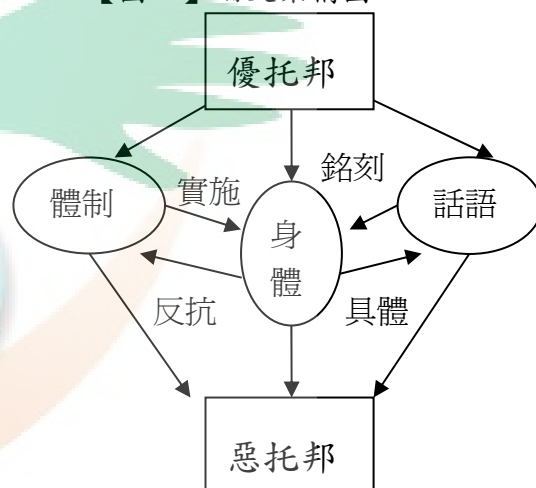
本論文主要的研究問題導向並非透過文本探究作者透過書寫表露的政治立場，也並非透過文本的空隙或缺席，檢視作者表露在文本間未被檢視的意識形態，這些層層抽絲剝繭的探索工作雖然意味深長但也更具挑戰性，並非研究者目前能力所及。因此負責掌舵的研究者決定調整手中的方向盤，依循羅盤指示將改變航道，目的地是「透過文本虛構出的未來世界，並探討這未來世界中顯露出的社會現象」，主要的探究焦點為：在塔莉居住的城市中，以青少年身體為對象所實施的整型手術形塑了何種優托邦理念？此種理念又藉由何種運作機制推展成集體認知？又何以轉變成惡烏托邦等相關問題。

壹、論述架構

【圖一】優托邦與惡托邦在烏托邦境域內的關係圖



【圖二】論文架構圖



本論文架構可概括性地以上二者圖說方式描述之：圖一為表示烏托邦境域中勢均力敵、僵持不下的兩股勢力。圖一採取這樣的圖示方式是為了標示清楚優托邦或惡托邦在烏托邦內部的變動，然需要澄清的是，優托邦與惡托邦既為烏托邦的內在本質，兩者的互動是彼此交纏、相生相存，就像一枚硬幣的正反面，是必須合而觀之，才能琢磨其中的曖昧與複雜度，因此任何將烏托邦境遇簡化並從單一面向觀之皆是不完整的。再者圖二為圖一的擴大，將烏托邦境域放諸於身體向度中，並且從體制與話語對身體的實踐與銘刻中，身體具體化話語的過程中，檢視三者交互作用如何具現優托邦到惡托邦的進程。

本論文環繞二大主題藉此貫穿各章節主旨，以闡釋整型手術如何對青少年產生身體與思維制約。第一個主題為「從優托邦到惡烏托邦」(from utopia to dystopia)，另一者為「身體」(body)，主要的論述架構為整型手術如何透過身體

的外在形貌與內部認知結構反映的觀看行為，具體化優托邦或惡托邦的概念。從烏托邦的框架觀之，個體身體的內部秩序是追求優托邦社會實踐的必要方式，根據研究文本，個體身體的內部秩序由整型手術達成，換言之，科技醫療（整型手術）是一種政治實踐。因此研究者的基本立場是首先將青少年的身體置於社會體制、話語的框架下審視：身體既是社會實踐的產物，那麼身體即存在社會體制與話語間，體制是身體之社會實踐的運作場域，話語則一一記錄了身體在社會規範中如何被理解（身體如何銘刻歷史痕跡），研究文本中闡釋的社會體制包括醫療體系、學校教育體系、社會習俗和政治體系等，這些管理、訓誡身體的機構所形成的規範系統，可視為涉及對社會關係進行理性化和約束性的阿波羅式社會系統的一部份。

在研究者探討的《醜人兒》三部曲文本中，居住在城市每位住民不僅接受一次面積或大或小的整型手術，然相同的是，每位住民在其生理年齡屆滿十六歲時，也就是在青少年階段，首度接受第一次全身性的整型手術，可見得青少年階段的重要性，故本文談論對象以青少年個體為主。成人以青少年身體為基礎，藉由科技醫療的導入、教育機制的薰陶和特勤局的暴力介入，將其打壓成不具反抗性、可任意搓揉，以此生產出符合城市理念的理想身體，因此身體可視為一種再現，因此個別的身體變成醫療的身體、儀式的身體和政治的身體交互交錯。再者，文本中的青少年身體作為醫療干預的客體，在整型手術實踐下，身體成為科學技術探索的對象客體，自然的身體經由醫療體系的脈絡被物化和客體化為可精密計算的客體，轉而形構成醫療話語機制的一部份，且醫療實踐又受到儀式規範的背書，或者更正確的說，形成每一個體必須經歷的成長經驗或成年儀式，利用文化儀式與醫療作用的身體論述終將自然身體導向社會秩序的馴服性，使得個體成為被控制的對象，而其所形構的身體話語包括「美/醜二元論」、「整型公平論」、「科技拯救論」等，又以「美/醜二元論」最為突出。

貳、研究問題

第一階段：研究者將以「未來的世界裡，所有人到了十六歲都必須進行全身整型手術成為一個美人」的命題作為切入點，在此可區分出三個關注點：實施手術的對象、實施手術訴諸的目的與所欲達成的效應。對即將十六歲的青少年（實施手術對象）而言，藉由整型手術成為美人是城市每位青少年必經的成長儀式，具有生命轉折性的性質，年滿十六歲是得以參與儀式的生理、文化許可證。儀式作為象徵體系的符碼，透過青少年集體性的身體實踐行程不斷重複、模仿的行為。于是，對整型手術儀式意義的解讀可作為研究者理解城市內部政治、社會結構核心的一個切入點。

再者，就醫療手術實踐目的與成效而言，科技在此扮演的角色並非客觀的中立者，若考量科技對青少年的身體干預與其欲達成的效應，科技本身有其政治立

場。又此醫療行為實施目的必須鑲嵌在執行整型手術背後所欲達成的烏托邦式真理體驗之脈絡中觀之，爲了達到烏托邦社會的理性和諧，個體身體內部的慾望或人性的缺點將藉由科技導正消除，正也是成爲美人的政治意義，且透過儀式實踐的再製，不斷被形構的真理體驗不僅是儀式的核心價值，更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表述，反過來說，意識形態透過儀式結構的包裝，以青少年爲對象進行不斷地展演，因此研究者在此要探究的問題如下：城市實施整型手術，其必然性是建立在何種「公眾化」的身體論述基礎上？接受整型手術對青少年的成長意義爲何？美貌論述的正當性與正確性，其背後所呈載的價值觀與意識形態，藉由何種操縱機制，使得青少年接受整型、內化成爲美人的意識形態，並視爲理所當然、信以爲真？進而延伸的是在此烏托邦的架構中，透過科技實踐所操弄的身體論述，何以將看似天堂樂園的整型手術從而變質成令人恐懼的「單一性」？

第二階段主要是探究透過青少年主體的視覺活動，如何看待整型儀式所造成的身體外觀改變，且身體的改變所帶來的主體認知如何揭露優托邦的美麗謊言。長久以來，醜人塔莉一直是羨慕美人、以變成美人爲目標，在城市長大的塔莉如何形塑此認知概念？對照塔莉面對特勤局威脅時的例子，當她看到投射在鏡中的醜陋自己，何以會當場情緒崩潰，答應特勤局的條件？延續著此種以美爲優勢的視覺範式，在帶有權力運作的觀看過程中，觀者被賦予觀看的權力，通過觀看的動作確認自身的主體性，同時被觀者淪爲觀者的被看對象，體會了觀者的權力壓力，進而內化觀者的價值觀，也造成自我物化或矮化。以女主角塔莉的身體爲例，經歷了醜人、美人到異人的轉變，城市科技發展與運用建構出人類物種的差異與不平等，相對的，塔莉對他人的視覺觀感也產生非我族類的強烈拒斥情緒，而這種情緒可視爲手術造成的傷害或是城市刻意對大腦進行的改造，因此研究者首要的問題是：整型手術儀式通過塔莉的身體具現（embody）不同階段的身體景觀奇觀，從醜人、美人到異人，不同階段的身體差異透過與他人/自我的互動過程中，研究者將從塔莉不同外貌的情境中，焦點聚焦於視覺活動產生的觀感，歸納文本所反映的身體認知。另外當變成美人的塔莉面對過去以醜人身份所書寫的信件時，其對應的身體與自我概念產生的剝離又具何種意義？與文本最終訴諸的優托邦理想幻滅有何關連？

參、論文架構

研究者將以特納的身體概念和烏托邦的概念詮釋文本，做爲科技中介的整型手術，以青少年的身體做爲論述場域，展演優托邦到惡托邦的概念，並透過「身體形象」這一角度審視成人對青少年的控制或優托邦背後的獨裁，以下爲本文研究架構：

第壹章爲研究論文的發軔，說明研究動機、文本選讀的標準，交代研究問

題、目的與架構，並回顧國內相關博碩士論文作為研究基礎。

第貳章為著墨於研究觀點與態度的確定。研究觀點的架構分別建立在「優托邦與惡托邦」與「身體」的理論探討，兩者的談論將以西方論述產出為核心。就前者而論，需要將烏托邦縐褶的流變脈絡置入首要討論。從摩爾對未知空間境域的探求轉變到十九世紀對世俗時間的發想，從對美福化外之邦的遙念到對冰冷科技及其隨之而來的獨裁政權之恐懼，由此可知烏托邦在西方語彙中甚具模糊與曖昧的性質，並隨著時代換上不同的樣貌，吸引著每個世代的人對幸福快樂的人生探求，在此研究者將烏托邦視為無涉及價值判斷的集合名詞，而優托邦與惡托邦可視為從烏托邦引伸出的從屬概念，並且將烏托邦式為一種文學類型；就後者而言，直到二十世紀末期，身體才成為關切的社會議題，不僅成為學術界關切的對象，在社會理論探討中更佔據主要的核心位置，身體不僅是一項物理事實，亦可將身體視為印刻社會、文化意義的表面觀念，身體本身的存在也是透過社會產製出來的。然面對身體的論述龐雜，研究者將以研究焦點做為理論合適性的標準考量，側重整型手術後身體趨近的外觀完美及其引發對醜的拒斥感受。

第參章主要關注城市美貌神話的建構。美貌神話的意識形態在現實的實踐中如何透過物質條件的依附建構其話語機制？研究者將從學校機制、儀式和整型科技三個向度分析之。此部分研究者將採取路易斯·阿圖塞（Louis Althusser）的觀點，並以其名作〈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Apparatuses”）為論述基調，阿圖塞認為意識形態具有物質存在的基礎「一種意識形態永遠存在於一種機器及其實踐中。這種存在是物質的」（164），因此意識形態是物質性的實踐，藉由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與強制性的國家機器之載體操弄，刻寫在主體之物質實踐的行動上。個體透過身體的物質實踐與行動，具現意識形態的歸指，具體的個體於焉轉化成主體的範疇。以此觀點，研究者不僅著重探討城市當權利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學校載體，操弄生物學與掌握歷史詮釋權，企圖建構整型手術的正當性與合法性，並試圖將整型手術轉化成青少年集體性的儀式活動，而整型手術的合理性也建立在與科技的共謀關係，以達到對青少年進行體制化規訓的制約目的。

第肆章仍以阿圖塞的〈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為論述基調，著重在「意識形態將個體做為支配性主體的召喚」（Ideology Interpellates Individuals as Subjects）概念，即意識形態形塑主體對現實世界之想像關係的認同，著意探討何以醜人塔莉堅信不移地將自身視為美人之主體身份建構的因素，並以塔莉被特勤局的凱波博士箝制時的情景對照說明，當醜人塔莉真實的面對自身鏡中（mirror-image）的醜態時，原本對友情承諾抱持篤實態度的塔莉，何以會痛苦的決定走上背叛友誼之路？此部分探討，研究者將試圖引進拉岡的「鏡像理論」與阿圖塞的主體召喚概念做為呼應。第二節引用沙特在其童年自傳《詞語》中對「注視」

活動的觀察與思考，詮釋身為美人、異人的塔莉對其他人產生的排斥感。第三節實屬困難，處理的是美人塔莉如何面對過去醜人塔莉寫給未來美人塔莉的信件，醜人塔莉存在在詞語中，當下與未來的自我在塔莉信件中不實地穿插在我與你的對應關係中，然面對現在的我，過去的我又不時滑向你，現在的我又是你的整合和分裂，甚或消失。換言之，這封信件的重要性不只是向塔莉揭露城市的陰謀，更象徵著語言是滑動的、不值得信賴的，所指與能指並非同一物，無疑預示著城市箝制觀看知覺機制的即將鬆動。

第伍章為論文結語。從研究初步成果總結研究文本在烏托邦文學傳統下，作者如何透過整型手術形構青少年的身體樣貌，並審思背後屬於青少年小說的價值觀，進一步針對文本研究提出建議，最終對研究者採取的研究方法提出反省。



第四節 研究場域

本節將以「烏托邦/反烏托邦」和「身體」為關鍵詞，以 1998 年至 2009 的時間為限，對國內博碩士論文進行初步檢索，並從相關研究論文中得到論點啟發。整體而言，分別以「烏托邦/反烏托邦」或「身體」做為論文議題的產出量十分驚人，就前者而言，以烏托邦為題的博碩論文書寫，尤其是在人文類科，例英美文學相關系所，另外也包含在社會系所、哲學系所和建築系所，有此可見烏托邦詞語的曖昧與模糊性，不僅可視為一種文學類型，亦可延伸其形而上的哲學思想或是落實在社會政治層面。但就身體部分而言，近十年來，以此為題目撰寫的論文總量非常高，但有趣的是，就人文類科（英美文學、中國文學、台灣文學等相關系所，除卻藝術創造），卻是近幾年來，出現較高比例的身體論文書寫，由此呼應了身體相關研究的後來居上，然面對總數量高達千篇以上的身體相關博碩論，與本論文研究範圍同質性較高的論文可謂是付之闕如，尤其在兒童文學領域，身體議題的探討更待後續研究者開發，不僅是文學文本分析，更可擴充至行動研究探索兒童讀者或成人與兒童讀者的閱讀過程等。然撰寫本節內容對於研究者的意義在於：理解國內其他學科領域中如何看待「烏托邦/反烏托邦」或「身體」的相關研究，更甚者如何以「烏托邦/反烏托邦」或「身體」等視角建立自身獨特的研究框架與方法，對本研究而言或許有其借鏡或啟示意義。

壹、關於烏托邦/反烏托邦

在此研究者將「烏托邦」回歸西方的哲思脈絡與傳統，因此中國式的「烏托邦」—或儒家先賢緬懷的堯舜善讓政治、歷代詩人歌頌的蓬萊仙島、山水畫家或文學家描繪的福天洞地等，皆不在本文討論範圍，理由在於：中國的理想世界觀多半根源於老莊思想並佐有神話性質的樂園意識，其特質大致可歸諸於隱退的企盼、放任無為的心態、超越世俗的羈絆、重返田園的渴望，其中又以「桃花源記」作為此種懷舊理想的縮影，其閉關自守的靜態樂園與西方烏托邦的積極入世、以想像做為門檻以正視現實、對社會諷刺與改革的呼求、著墨於公領域的藍圖描繪，尤其是政治典章制度等前瞻精神有所扞格。再者，研究者篩選的烏托邦相關論文的標準在於「將烏托邦視為文類的概念」，就以一種文學形式來說，烏托邦小說是一種很好的傳達工具，用以表達「理想的生活或社會情境」的概念，或者用諷刺或解剖的手法對當前的社會生活制度或價值觀加以批判。

就以烏托邦文類為研究基礎的論文，若細論之，其談論的面相亦有所偏重，約略呈現出六種類型，整體而言，研究取向落點在第一、二、三要點：

（一）關注烏托邦到惡托邦之間的辯證關係，藉此揭露烏托邦的真相，在此烏托邦境域可視為一味崇拜進步、理性、科技的主體，為了達成其追求的理想與完美，在極端的實踐手法上形成了壓抑他者的存在事實，導致同質性社會、思想箝

制、獨裁政權等現象產生，因此所謂的辯證關係可謂是探究主體與他者兩者相互依存的矛盾關係，進而闡釋他者對主體霸權挑戰、質疑的意義，可以說烏托邦理想的幻滅是指即其靜態狀態的封閉，唯有不斷的改革社會才是烏托邦的真意所在¹¹。

(二) 承繼上者，此類項著重反烏托邦的寓言功能，藉此對現實社會提出人文式的反省與批判，相關主題包括對科技、資本主義盲目崇拜的撻伐，或是面對烏托邦所避免不了的獨裁政治，戮力追求主體自由、人性等價值觀。

(三) 探討性別政治的反烏托邦寓言功能，此部分實屬於第二項的延伸，因其敘述觀點有別於傳統男性觀點的烏托邦社會，且加入的女性主義觀點頗能針砭傳統烏托邦文學的不足。藉由六〇年代末期興起的「女性烏托邦」(feminist utopia) 文類書寫，這些女性作者寄託/發聲其性別意識，探討父權體制下女性的從屬地位，例如社會母職的制度化、女性公領域的經濟獨立地位，或是異性戀機制下女性的被物化、資本主義下白人男性、中產階級者對非主流的種族與階級剝削等現象，有趣的是，何以抵制父權體制的壓制，找回女性失去的主體性與身體主權？在宰制化的陽剛式象徵體系，唯有透過女性以聲音文字的書寫行為，重新挖掘、建構被壓迫者的歷史方可突圍，標示著陰性書寫的力量。另外女性烏托邦作者也凸顯具有後現代創作手法與新穎的敘事策略，同時厚實烏托邦文本的開放性。

(四) 一反著眼於社會科學理論的外部研究，採用文學批評理論的內部研究，回歸傳統烏托邦原典，重新關注摩爾《烏托邦》文本中顯露的不確定元素與動態因素，甚而將其置於歷史脈絡中審視文本的衝突張力¹²。

(五) 從科幻小說中的烏托邦意識和科學視野切入，關注當代科幻文本與經典作品的傳承與變革關係，從中延伸出烏托邦精神於當代科幻小說中的延續¹³。

¹¹ 在兒童文學領域中，歸屬於此類碩士論文書寫有兩篇，分別是的劉美瑤〈烏托邦的幻滅－談《記憶傳授人》的制約與覺醒〉和林淑婉〈論奇幻文學中兒童與烏托邦概念－以《黑暗元素三部曲》為例〉，就前者而言，《記憶傳授人》(The Giver) 一書兼取天堂樂園與科技文明二種思維建構文本場域，論者將此部青少年小說置於烏托邦敘事傳統中，從語言控制、家庭制度等面相，探討烏托邦對社區人民的制約與霸權，而對烏托邦的反抗亦具現在三位記憶傳授人的覺醒方式，並歸納出烏托邦的特徵為永遠渴望不斷逃離。後者可謂是以基督教式的烏托邦想象形構文本世界與結構，研究者重述 (retell) 《聖經》(The Bible)、《失樂園》(Paradise Lost) 建構出一個體系複雜的文本空間之關聯，論述菲利普曼顛覆基督上帝神性一元及追尋天堂的虛幻主義傾向，並藉著代表夏娃形象的萊拉從純真到經驗世故的轉變，討論《聖經》中關於人性墮落的初點，改寫基督教的原罪觀，從而論述現世烏托邦天堂共和國 (Republic of Heaven) 的實現契機。

¹² 相關論文包括：賈本曜〈托瑪斯摩爾之烏托邦：一個充滿內部結構衝突的理想社會〉和林宜玲〈湯瑪斯·摩爾《烏托邦》曖昧性的探討〉兩篇，賈本曜首先歸納兩種檢視《烏托邦》的研究方法，就外部研究理論論之，集中社會主義的觀點與天主教會的觀點，往往落入「以今觀古」、「時代錯置」和「文化差異」等先入為主的現象，且多半評論偏離文本進行過度詮釋，對摩爾有失公允，自一九七〇年代，烏托邦研究轉往文學批評理論，因此賈本曜的研究立場為回歸原典內容，對摩爾提出的各項制度輪廓進行比對與分析，再者從其顯露的烏托邦內部衝突尋求文學傳統與歷史文化脈絡的詮釋。林宜玲質疑烏托邦等於理想國的對應關係，轉從原典中，檢視文本隱藏的破壞性，包括主題模糊、文學敘事技巧、多重敘事框架與不可靠的敘事者等的使用，在在說明了《烏托邦》一書並非如傳統上認定其為靜態完美的理想世界，實則是一個意義曖昧的動態文本。

¹³ 相關碩士論文包括：貝業明〈強納森·史威夫特《格列佛遊記》及馬克·吐溫《古國幻遊記》的烏托邦議題即其在英語教學上的應用〉提到《格列佛遊記》與《古國幻遊記》分別繼承湯瑪

(六) 烏托邦文類批評，尤其是以其具現的烏托邦意識或烏托邦觀加以評價¹⁴。

(七) 以跨文化比較研究，探討中西烏托邦思想的關連性與影響¹⁵。

(八) 將烏托邦文學引入英語教學，藉由探討烏托邦議題及其使用的文學手法，培養學生的公民素養並豐富文化內涵，藉由閱讀小說以提升英語學習¹⁶。

此外，在上述提到的相關文本研究論文中，另有值得關注的現象有二，一為以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 1939-）之作品探討出現頻率偏高；二為對烏托邦文學文類的界定與劃分之探討，然此部分在上述檢視的論文書寫中屬於縱論性質，有待後續研究。大抵而言，一般通論將烏托邦文類視為科幻小說的次文類，以其認知、疏離與新奇的特質對當代提出批判觀點¹⁷，若放大文類的限制觀之，在〈論奇幻文學中兒童與烏托邦概念—以《黑暗元素三部曲》為例〉，林淑婉就其文類特質，大有將科幻小說納入奇幻族裔譜系的論述出現¹⁸。換言之，當代烏托邦文學亦出現與奇幻文類合流的趨勢。另外在〈從少年科幻小說看烏托邦的幻滅〉一文，劉琬琳考量其閱讀對象，也將科幻文學納入通俗文學的羽

斯摩爾《烏托邦》和法蘭西斯培根《新亞特蘭提斯》之烏托邦特點，但對烏托邦立場與科技抱持著不同的態度，另一篇劉琬琳〈從少年科幻小說看烏托邦的幻滅〉，以少年科幻小說文本《蠅子之家》、《宇宙最後一本書》為探討個案，關注當代科幻文本呈現的烏托邦式科學視野與幻想，何以演變成惡托邦思維的寄託，另外也特別指出惡托邦小說的恐懼元素也形構了科幻小說不安的氣氛。

¹⁴ 相關研究包括：碩士論文卓君威〈從威廉·吉布森的《神經迷魅》三部曲看烏托邦的重新定義〉探討傳統烏托邦觀的侷限與問題，強調傳統烏托邦的問題在於：（一）烏托邦呈現靜態缺乏變動，往往忽略時間因素的影響；（二）陷入完美主義的迷思，以激烈的人為限制手段限制演進的自然與變化的彈性；（三）過度簡化全體的差異性，形塑同質、一致性的社會。顏正瑩〈從二元對立突圍而出：三部女性烏托邦研究〉以女性烏托邦文學批判傳統烏托邦傳統背後凸顯的權力結構與文類的不足，然女性烏托邦書寫雖呈現多元的面貌，其展現的女性意識與立場亦有所差異，而這些策略與意識是否達到女性烏托邦文類的理想設定值得商榷，本論文藉由一九七〇年代產生的女性烏托邦文本小說進行比較，研究者認為勒瑰恩的《黑暗的左手》可視為大呼兩性平等共存，以雌雄同體為兩性共存理型之代表，而吉兒哈特的《流浪地》落入強調兩性間天生差異的分離主義，兩者落入二元對立與本質論的紛爭，爾後的皮兒西《時間邊際的女子》遊走在性別內外，致力勾勒出平等與差異的兩性動態社會。博士論文楊乃女〈烏托邦與機器：從烏托邦文學到後人類〉亦是探討烏托邦文類書寫的侷限，認為烏托邦追求的理想、穩定、同質性，可謂是架構在西方人文主義的思維，受限於此思維邏輯，烏托邦成為排他性極高的人類想像社會，然這寫完美的烏托邦形象亦存在著一些裂縫，干擾人文主義意識的架構，由此成為烏托邦寫作的潛力，進而以，轉而探索烏托邦文學的異質性、不確定性與流動性，此也是後人類烏托邦文學的價值所在。

¹⁵ 相關博士論文為黃漢婷〈「道」與德國二十世紀烏托邦文學：以《王倫三躍進》與《對岸之城》為例〉，以受到道家秩序觀點影響的烏托邦作品，探究二十世紀德國烏托邦文學作品與中國道家思想交會後產生的烏托邦概念與類型轉變。

¹⁶ 此部分如貝業明〈強納森·史威夫特《格列佛遊記》及馬克·吐溫《古國幻遊記》的烏托邦議題即其在英語教學上的應用〉所示，以《格列佛遊記》進行英語教學。

¹⁷ 例在黃麗香〈論金史丹利羅賓遜《黃金海岸》及《太平洋邊緣》中之歷史、烏托邦與後現代〉可見一斑。

¹⁸ 截至目前為止，奇幻文類界定甚為模糊，加以科幻小說為向主流文學爭取空間，兼以二十世紀後，科技、資本主義經濟等帶來的未來不確定感，均使得作家重新思考關於人類本質、存在問題，增添作品的奇幻異想成份。

翼下¹⁹，由此更可以說明：烏托邦文類因其混雜文類跨界與分屬所顯示的曖昧性。

貳、關於身體

以「身體」為論文篇名的總數高達一千三百多篇，研究者首先約略描繪身體概念如何被國內學術機制談論與形塑。論文所考察的身體樣本，或為透過文本書寫、視覺符碼、藝術創作實踐活動進而再現的身體意識²⁰，或為日常生活中某一族群、個體之身體活動與身體意向探討，或為針對文學文本討論其富含的身體意象。研究方法可歸納為，針對西方身體論述進行哲學式思維辯證探討；或針對文本內容中的身體符碼，引述相關身體論述作為理論架構進行歸納與演繹；或為以問卷調查為主軸的量化研究，著力於數個因素的相關性分析；或研究者選擇個案例子進行深入訪談，並輔以田野情境脈絡的觀察筆記，藉由語言互動與詮釋，在解構與再建構的過程中，質性的深描出身體再現的動人經驗等，其所圖繪出的身體樣貌包括慾望的身體、消費的身體²¹、健康/保健的身體、儀式化的身體、移動的身體、受傷的身體、暴力的身體、空間/地方的身體、物質的身體、規訓的身體、遊戲的身體、勞動的身體、運動休閒的身體、性別的身體、年齡的身體、種族的身體、醫療的身體、關係的身體、風格化的身體、政治的身體、象徵的身體、異質化的身體（科技介入的人機合體）等，可以梗略得知：在學術論述話語中表現出的身體是具有多向維度的可能性與豐富性，且在研究中顯示的身體層面並非僅是單一層面，而是彼此交錯進行組合，從中召示了「身體」作為個體行動或是建立關係的物質基礎，如何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具體其日常生活的情境，從而構築身體的複雜度，身體可視為各種不同差異的力在其中交織的場域。

因本論文主要是對文本中的身體現象提出理論分析，職是之故，主要探究的相關論文也是以此為基礎，整體而言，相類似的論述書寫主要集中在人文學科，包括英美文學、台灣文學、中國文學等相關系所，尤其是以英美文學系所相關身體論述產出遠較後兩者居高，以下約略描述身體論文的研究向度：

（一）特定歷史脈絡下的身體樣態，如中世紀的宗教身體。或揭露基督教義如何藉由加註於教堂及聖體上的意識形態，達到對身體的管理與規範，或是探討基督宗教靈性對女性教友的身體影響，藉由「肉身基督」的概念揭露身體與靈魂的緊密關係。

（二）藉由身體具現父權象徵體系的宰制與鬆動辯證關係，被侵佔的身體最

¹⁹ 劉琬琳在文中提到「科幻小說是通俗文學的其中一類，它的範疇跨疊著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兒童讀者絕對是科幻小說目標讀者群的一員」（13）。

²⁰ 此部分需釐清兩者的差異，論文談論的身體作品產出多為論文撰寫者本身，即「作者談論作者的身體」，透過創作活動的身體實踐銘刻身體經驗，前者的身體強調其生產性與實踐性，後者為身體具有文本性，屬於被觀察的客體，大量集中在相關藝術、美術、表演等相關系所之碩士論文題目。

²¹ 主要針對身體經過服飾、美髮、整型、刺青等永久性與暫時性的美容、美體行為，且強調需鑲嵌在主體的消費性行為方可達成。

終藉由身體行動展現被壓抑的幽微歷史，並藉由發聲建構自身的真實主體與話語意識，然歸屬在此項目的詮釋角度甚多，包括父權凝視機制、為資本主義賤斥的女體²²、批判性別意識形態/話語知識與異性戀機制、遭受種族、性別雙重邊緣化的女性身體突圍、帝國殖民主義下的政治身體、探究女性的空間意識等面相，亦有針對美貌政治與性政治進行文本比較研究，包括揭示作者看似進步的性別意識背後不可突破的固著刻板印象²³。

(三) 為科技中介的身體，包含探討在科技文化中，新主體的形成、被中介及反抗的可能，或以此種身體的詭異性暗示人文主義到後人文主義的演變，藉此打破以人為中心的幻象，另外也點出科技中介的身體所接受的社會建構也弔詭的挑戰此種建構的可能。

(四) 透過扮裝與變形達到的身體越界，前者是對男女有別的性別越界，後者是人類對生命形式轉化與跨越物種界限的思考²⁴。

(五) 強調身體解放與對肉體的高度讚揚，論者以勞倫斯作品《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為探討點，將此種概念視為挑戰資本主義以生產為基礎的文明論述，進

²² 科技的發展讓理想、流行的身體得以允諾成真，但實際上此種變形身體背後所訴諸的卻是建立在二元對立的結構上的「理想身體」的身體政治觀。當某一種身體樣態為主流社會普遍性的接受，並高舉著它的優勢時，就會形成對其他不合於主流標準的身體樣態產生強度不一的壓迫與排斥。對於後者身體現象的探討為蘇欣臨〈賤斥的曖昧性：論《肉年》中肉食與女性身體的關聯與顛覆〉的論文核心。

²³ 談論身體論文包括博士論文吳文薰〈羅莉塔の後設閱讀—少女的身體、慾望與消費文化〉，透過後設閱讀的方式檢視拉迪米·納博可夫(Vladimir Nabokov)廣受爭議的小說《羅莉塔》(Lolita)，探討文本中再現的亂倫少女形象，並逐步探討羅麗塔引發的流行文化現象。最終論者將羅莉塔置身於德黑蘭回教世界，歸結羅莉塔的身體是為男性存在的身体。碩士論文方面：余晏如〈圖畫書中性別研究—以芭貝·柯爾文本為例〉主要探討芭貝·柯爾的圖畫書文本如何處理性、性慾與身體三者錯綜複雜的性別意識，研究者以蘿拉·莫薇(Laura Mulvey)的凝視觀點檢視角色的身體意象和服裝符碼所傳遞的社會規訓與性別樣態，研究發現：研究文本以性徵及服裝強化個體的性別化身體，進而以生理決定論鞏固異性戀的意識形態，呈現的單性向模式基調反定了個體情慾流動及性別身份多元的可能。

²⁴ 兒童文學研究所以此為類題的相關碩士論文有兩篇：金惠芬〈童話中的人魚—安徒生與王爾德〉透過弗洛伊德性學三論、愛情心理學及榮格集體潛意識—原型等視角，對安徒生〈人魚公主〉與王爾德〈漁夫與人魚〉童話作品的人魚意象進行比較。文中金惠芬將童話中的「人魚」視為相對於人類身體變形(屬於雙腿變形、不完全變形)的生物範疇，進而將人魚的女性形體置入現代的脈絡，透過動物學的解剖和分析。就身體談論部分而言，在安徒生與王爾德童話中出現的人魚，其陰性的身體結構體現、交揉著女性的純真與性慾的衝突，仍舊脫離不了男性性慾客體的形塑，令人弔詭的是，缺乏雙腿與性器官的人魚意味著交合的不可能，變形的身體也象徵著男性慾望藉由雙腿通往陰唇的匱乏，研究者將此形象對應創作者的生平經驗，安徒生因其與女性交往經驗的慘澹試圖在創作上尋求釋懷；王爾德藉此投射他對異性戀機制的批判。另一篇為李潤菱〈卡爾維諾《義大利童話》中變形故事之研究〉，同樣針對童話中的變形現象進行探討。研究範疇以人類身體形象化的「完全變形」或「不完全變形」為主，詳細歸納出義大利童話中變形的結構、類型、變形後的形體種類與變形的始末，並輔以神話原型理論及精神分析理論，探討人類創作變形神話的遠使心理動機，分析變形故事隱涉的文化極其普遍性的象徵意涵。文末李潤菱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觀點：得力於醫療科技的進步，美容手術或是瘦/塑身美容工業可視為現代科技與變形交構的產物，「變臉者為隆鼻、削骨……；變身者如瘦身、隆乳、抽脂……」(李潤菱 133)。整型手術與瘦身等美容工業的差別在於手術對人體侵入性本質，本研究關注的是「整型美容」議題，整型手術標榜著人工的最佳自然狀態，若將其至於變形的脈絡觀之，整型美容為身體的物質與自然特質帶來更多的延展性與可塑性，也暗示著在現今社會下，身體成為個體產生認同與可控制的場域。

而對英國傳統文學、維多利亞時期保守社會的反抗與嘲諷²⁵。

（六）將身體視為競技場的概念，凸顯身體永久性衝突，一者為個體身體的自然知覺與感知，一者為社會規範對身體的銘刻，這也是自我與小我在身體引發的紛亂與不安。

（七）探討個人身體與社會秩序的關連與互惠性，相關論者以伊莉莎白時期史賓塞作品《仙后》中的節制概念，及其延伸的戰爭美德和養生概念，說明個人對自我身體的掌握是英國殖民擴張社會不可或缺的先備條件²⁶。

（八）閱讀境域的身體與符號系統的互動探討。身體與文本關係的探討源自於羅蘭巴特的情慾閱讀理論，甚有評論家指陳巴特的文學理論銘刻了男同性戀者的身體經驗，相關論者以巴特《S/Z》和朱天心《荒人手記》，探討文本中體象、文象與性象的交互影響與關係²⁷。

值得一提的是，人文學科相關的身體論述普遍呈現相同的取徑，例如引用的身體論述不外乎是傅柯、巴赫汀、德勒茲、哈勒維（Donna Haraway）等人，另一個特徵是以二元辯證框架統攝論文架構的比例偏高，此種框架延伸出兩種不同的情境，分別是針對個體身體或是彼此相互排斥的群體身體²⁸，且此二元架構的邏輯思維意識亦是清楚可辯：一者為將身體視為權力銘刻的場域，呈現出傅柯式的「馴順身體」，一者為被邊緣化的身體轉而成為主動抵抗權力的策略與起點，藉由身體慾望、或敘說、書寫建構自身或群體的歷史，此種具現陰性書寫的特質，從而使官方、穩定、理性、線性歷史的身體符碼產生曖昧與斷裂，此種類型的身體可視為巴赫汀式「怪誕可笑的身體」延伸，然需澄清的是，身體的怪誕元素本非只是停留在身體表面，而是更重視其隱藏的顛覆霸權力量，整體而論，此種論述呈現出個人/群體身體的被動與主動趨力、拉扯，這也從旁也暗示了近十年來人文學術主流對身體論述應用的取向與困境，當然產生此種論述框架也需考量選取文本與理論架構等因素，此便不在話下了。

²⁵ 此部分請參照張憶收〈論《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中身體的論述〉。

²⁶ 此部分請參照張銀珮〈個人與國家機制的互惠性：《仙后》中〈節制傳奇〉之研究〉。

²⁷ 此部分請參照張志維〈閱讀符號之身：《S/Z》與《荒人手記》的體象/文象/性象〉。

²⁸ 一者為象徵體系召喚的某一類型的身體，一者是主流價值觀踐斥的他者身體，不可諱言，後者較前者具有更活潑的異質性。

第貳章 研究觀點與態度

第一節 烏托邦的兩面鏡

壹、歷史脈絡中的烏托邦

在英語世界中「烏托邦」一向是個混淆晦澀的詞語，其詞語的模糊性早在十六世紀在英國權臣湯瑪斯·摩爾（Sir. Thomas More）杜撰²⁹時便顯露端倪，烏托邦意指「好地方」或「烏有鄉」，綜合兩者，即是指虛構中或想像中的美好福地，然經後人不斷的詮釋與援引，從而加深「烏托邦」詞語的複雜性。英美世界的批評家 J. Max Patrick 和 G. R. Negley 認為：「英語中似少有較『烏托邦』或『烏托邦的』更加晦澀的詞藻。無論就外延或內延而言，此二詞的使用範圍幾已臻至無法下定義的程度」（108，轉引自張惠娟 79）。烏托邦字彙的模稜兩可也展露在當代字典中，以 *Chambers Twentieth Century Dictionary* 為例，烏托邦專指由湯瑪斯摩爾以拉丁文書寫、具有政治諷刺與寓意的作品《烏托邦》，可擴充為以摩爾《烏托邦》為先驅的文類名稱，或為「任何具有完美理念的想像國度」，除此之外，貶義的烏托邦意指不切實際或無法實現的想法（1433）。

烏托邦與現實社會表現出若即若離的關係，亦可從烏托邦極力在時間與空間中尋找自身實體定位的曖昧性觀之。雖說遲至 1615 年才正式出現「烏托邦」的字彙，然西方學者一致認為烏托邦的前身是黃金時代（Golden Age）或相類似的神話。最早烏托邦式的憧憬可溯源至游牧民族為了尋找豐饒樂園的遷徙型態談起，而《舊約·創世紀》的伊甸園神話堪稱蘊含「烏托邦」與「失樂園」的神話雛形。另外希臘神話中的黃金時代、羅馬人的農神軼史，以及希臘羅馬的史學家筆下的理想國度，包括希羅多德《歷史》以欣羨筆調形容的「伊希歐匹亞」

（Enthiopia）和「海波玻里亞」（Hyperporea），或是史地學者史察伯《論地理》（*Geography*）中儉樸的「希西亞」（Scythia），皆可視為「烏托邦」的象徵。這些學者跨越橫互在眼前的地平線，將眼光關注在憶舊的時間膠片，無視當前社會現實的變動，汲汲在神話與傳說中掬起關於樂園的殘末與氣味，姑且不論是否有魯魚亥豕、加油添醋之說，但其所描繪的完美社會無不為希臘羅馬的政治理論家同聲接受，其中又以柏拉圖《理想國》（*The Republic*）對話錄最為後人熟悉。但他的心態並非是對過去黃金時光的憶舊，而是將希望寄託在以人力改造現實社會的未來。他深信只要人的理性精神發展至一境界，理想國便指日可待的。所謂的理性的精神包括人對宇宙、對諸神、對社會、對彼此，乃至於對自己的態度，而以理性、秩序與美德為架構的社會，需要一套完整的制度規劃，因此柏拉圖發

²⁹ 或有一說摩爾《烏托邦》原題並非希臘文「Eutopia」，而是拉丁文「哪是什麼」（Nusguama），其意仍只「烏有地」，之所以以希臘文為題，為其好友伊拉斯莫斯（Erasmus）在讀畢摩爾手稿後對他的建議。

展出一套嚴謹的階級體系，包括統治階層（擔任管理和行政的事務）、士兵階層（執行保衛國家的任務）和低下階層（包括農民、工匠等依靠勞力生活的人）等三層階級結構，每個階層各有其歸屬的職責與義務責任，國家在個人之上，掌握化育童稚的教育、負責社會經濟活動，必要時要實施鐵腕手段以維護人民的權益。柏拉圖試圖以人類理性/理智作為實現「進步」、「完美」和「秩序」之烏托邦基礎，也是西方後世烏托邦思想的依據。

隨著西方歷史進入基督教化的過程，烏托邦思想也明顯的宗教化，基督教追求理想國度的根基可追溯到希伯來文化，以超自然存在體做為人類命運的決定者，與希臘文明不同之處在於，人類變成了耶和華的依附者，唯有走向神之懷抱才能通往幸福之道。中古世紀的基督徒接收了有關彌賽亞的降臨、宣導愛與和平的新耶路撒冷等宗教式的烏托思想，在歷史演進中編織出一套寄望永生保證的末世論（Eschatology）。此外，隨著西方線型史觀的發展，伊甸園已不可欲求，只能往前朝向未來，對基督教傳統而言，下一個美好的地方是未來的終點，那就是所謂的「世界末日」和「最後的審判」，此種思維又以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 354-430）的《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最具代表性。然而永世的天堂國度是上帝的恩典，可望不可及，更重要的是不會在地表上出現，於是重視現實的烏托邦者提出了在人世間建築快樂天堂的想法。因此摩爾《烏托邦》的出現可謂是「黃金時代神話俗世化的成果，也可以是說人類運用智慧和意志力把神話變成事實的意念」（Robert Elliot 24，轉引自何冠驥 250）。摩爾的烏托邦並未彰顯聖奧古斯丁末世論的時間觀念，而是將烏托邦具現在地表的空間中。這種從上帝到人類，從末世天堂到地圖空間，標示了烏托邦的人性尊嚴與現世論意義，且這個人類實踐的理想國度與現實世界相對立，藉此批判現實階級不平等的剝削，還必須藉助航海技術才能抵達傳聞中的化外之地，推就其因，是由地理大發現的航海勃興所帶來的空間的遐想。繼摩爾之後，烏托邦文學不僅融合了柏拉圖思想，更訴諸科學理性與知性的光芒，十七世紀著名的烏托邦文學作品以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的《新大西洋島》（*The New Atlantis*）和康帕內拉（Tommaso Campanella, 1568-1639）的《太陽城》為代表。康帕內拉筆下出任《太陽城》的行政長官都是近代知識探求者的代表，最高首長更是稱呼為「形上學者」，標榜藉由人的觀察、思考，藉此發現創世者隱藏的法則與規律，具有笛卡爾式的理性思維。

十八世紀盧梭對於黃金時期的哀嘆影響了十九世紀烏托邦文學的發展，回歸自然的哲學形成了追求「高貴的野蠻人」（Noble Savage）的思潮，例埃迪耶納·卡貝（Étienne Cabet, 1788-1856）的《伊卡利亞之旅》（*Voyage en Icarie*, 1840）便是此種思潮育孕的結果（賴素芬 125）。十九世紀中期後，工業進展與科技的突破並沒有直接激起人類對未來的熱情想像，反倒是資本主義的慾望刺激生產與資本集中所帶來的階級衝突越演越烈，影響所及，強調經濟政治理想的烏托邦披

上了工業進展的風貌復甦於文學書寫中，先後代表作有巴特勒（Samuel Butler，1835-1902）的《埃里旺奇遇記》（*Erewhon*，1872），貝勒米（Edward Bellamy，1850-1898）的《回顧》（*Looking Backward*，1888）、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43-1896）的《來自烏有鄉的訊息》（*News from No Where*，1890），作家的焦點關注於工業革命後的社會變革，開始預測極端工業化的人類生活，例被馬泰·卡林內斯庫（Matei Calinescu）稱為「最後一部空間烏托邦」的《埃里旺奇遇記》，其書名乃是“nowhere”一詞的顛倒，以埃里旺人面臨的「機器正向我們進攻」的教訓，反應作者對科技迅速發展的憂慮，甚至機器將起而代替人類主宰世界，其書可視為對未來抱持一味天真樂觀的當頭棒喝。而《回顧》與《來自烏有鄉的訊息》皆是以夢境作為理想與現實的間隔，且時間設定在人類有生之年可以期待的公元兩千年後的世界，也反映出自摩爾以來空間的嚮往以轉變成世俗現實時間的綺想。然《回顧》雖幻想著科技發達的工業理想國，卻也暗示著人類社會無可避免的僵化與人性缺乏。而作為一種具有前瞻性與批判性的烏托邦文學，人性在未來世界可能會被科技吞噬、侵蝕的悲劇持續成為下一個世紀關注的主題。

對於烏托邦負面黑暗與恐懼的描寫在二十世紀初期如雨後春筍般大量出現，烏托邦者對未來展望的悲觀來自二十世紀的社會變動，接二連三擴及全球的悲慘歷史事件，包括兩次世界大戰的慘劇、廣島、長崎原子彈的浩劫、共產主義的蔓延與擴散、太空、核武競賽和冷戰、生態危機、全球暖化等引發世界末日的恐慌，這些科技進步所帶來的大自然反撲與人性的荒蕪，使得烏托邦者將未來的焦慮與恐慌投射在文學表現上。對於負面、消極烏托邦的界定眾說紛紜，例如梅爾（Karl Meyer）的“Futopia”，結合未來（future）與無希望（futile）的意義。芒福特（Lewis Mumford）的“Cacoutopia”一個令人不愉快、不和諧的地方。艾瑞克·佛洛姆（Erich Fromm）稱之為「負面烏托邦」（negative utopia），或簡略地稱之為「反烏托邦」。最為普遍接受的是帕林格頓（V. L. Parrington）仿造摩爾的烏托邦，擷取希臘文的“dys”（bad）和“topos”（place）杜撰了「惡托邦」（dystopia）。在質與量上的產出，在烏托邦文學傳統中逐漸開闢出令人不可忽視的次文類－惡托邦/反烏托邦文學，顯示烏托邦文學從「優托邦到惡托邦」的語調轉變，對未來進步的樂觀與期待的燦爛已被蒙上一層不安與憂心忡忡的烏雲了。反烏托邦的甚囂塵上掩蓋了優托邦的聲響，而這流變也恰如其份的被卡爾·梅爾（Karl Meyer）捕捉，在一九五四年，梅爾發出了這樣的聲明：「作為一種想像社會的烏托邦，它不再是展露極樂世界的可能，而是作為一種透鏡，放大我們時代的野蠻」³⁰（轉引自 Berger 421）。

貳、研究者的立場

³⁰ 原文如下：Utopia is no more , a new kind of imaginative society which , instead of evolving the possibilities of earthly bliss, serves only as a lens through which every barbarity of our age is magnified.

爲了凸顯烏托邦的變動性，在此研究者的立場是將烏托邦視爲一個論述的集合名詞，不僅包括了代表完美、良善、理性極致的「優托邦」(eutopia)，和從中延伸成變奏性質的「惡托邦」，由此研究者將烏托邦視爲文學文類的表徵，且文中使用的「烏托邦」不涉及任何道德判斷，而將優托邦或惡托邦的書寫歸爲其附屬的次文類，以此基底作爲本文研究觀點的闡述。大致而言，以其所身處的當下世界爲據，優托邦主義者透過文本虛構出一個更加美好的想像社會，反之異托邦主義者亦然，兩者的共通點皆是藉由想像國度的再現以此針砭其所居處的現實社會。誠然，摩爾在杜撰「烏托邦」詞語時，其概念在虛構國度外，無外乎寓含對幸福未來社會的設計胸襟，然或許摩爾的烏托邦是他眼中的美福之邦，但在巴森(Jacques Barzun, 1907-)的眼中卻不是這麼一回事，他以半戲謔的語氣訴說著：

這些烏托邦作品(包括摩爾、康帕內拉和培根的十六世紀烏托邦作品)，想來都是在訴說當時所認為的好事。……讀優托邦書，一定要小心分辨何者是優托邦反襯的當時時代真理，何者是特定作者自身的奇思異想。(187-92)

換言之，若說追求理想社會、完美共和國是優托邦的普世價值，但對於以何種制度或官僚體系才能真正體現優托邦的精神確是各家說法。一個人的優托邦也會是他人眼中認可的優托邦嗎？約翰·蓋瑞(John Carey)曾說過：

惡托邦僅是烏托邦的另一個觀點，歐威爾的大老哥和赫胥黎《美麗新世界》的領導者……，在他們眼中(他們所創的世界)都是烏托邦。其他烏托邦者(摩爾、斯威夫特、威爾斯)，你也不能確定是否這些作者將他們筆下的世界視爲烏托邦或是反烏托邦³¹。(Carey 12)

或許這就是烏托邦的弔詭吧！因此對於這些懷有政治社會改革樂情的大文豪而言，當優托邦的理念從其筆尖洋洋溢出時，別忘了惡托邦正棲息在他的肩膀上注視著優托邦的成形，正摒息等待良機擁抱優托邦，優托邦乃惡托邦之伏也，惡托邦乃優托邦之依也，兩者斷然無法一分爲二，是相互相倚的。

參、烏托邦作爲一種文學類型

自從一九六〇年代以來，相關的烏托邦研究受到重視，並獲致成績斐然的發展，面對種種烏托邦的責難與非議，學者們不再只滿足將烏托邦視爲一個空想的說法。晚近針對烏托邦研究大致可區分成三種路徑：第一種爲「狹義派」，將烏

³¹ 原文如下：“For a dystopia is merely a utopia from another point of view. Orwell’s *Big Brother* or the directors of Huxley’s *Brave New World*are utopias in their own eyes. With many utopias (More’s, Swift’s, most of H. G. well’s) you cannot be sure whether their authors regard them as utopia or dystopia.”蓋瑞的烏托邦之意偏重「優托邦」的意思。

托邦視為一種文學文類，並凸顯其文類特質；第二種為「廣義派」，與其將烏托邦侷限於文類形式，此派學者更加重視探討烏托邦的精神與功能層面；第三種為「超越派」，受到後結構思潮的影響，此派學者傾向烏托邦的變動意涵，強調其內在蘊含的不確定性與流動性，以此觀點更加襯托出烏托邦本身的歧義。

將烏托邦視為文學類型的學者，又以庫瑪（Krishan Kumar，1933-）為其翹楚。在其一九九一年《烏托邦》（*Utopianism*）的著作中，他致力於烏托邦畛域的劃分，強調烏托邦有其自身文化的與歷史的界域，「烏托邦或許杳然無蹤，然從歷史和概念地角度觀之，卻也非無所不在」³²（Kumar 3），此外庫瑪企圖將烏托邦從與之相似文類的千絲萬縷糾葛中釐出頭緒來，目的在於探究烏托邦文學的本然，諸如黃金時代（The Golden Age）、田園（Arcadia）、樂園（Paradise）、安樂鄉（The Land of Cockayne）、千禧至福（The Millennium）、理想城市（The Ideal City）等理想社會的原型，和烏托邦享有虛構、想像的特質，但卻無法歸類為烏托邦的主要原因在於「烏托邦是敘述小說（narrative fiction）」（27），庫瑪一方面強調烏托邦與其他理想社會的基本歧異，但也指出理想社會與烏托邦之間的關連性，烏托邦吸取了理想社會關於渴望、和諧、希望等特質，對烏托邦有其不可抹滅的價值，由此觀之，庫瑪的烏托邦觀點展現出某種程度的包容性，一如其所說的「對於各種觀點……無須過於武斷或排斥。觀點的運用只不過是便宜行事而已」（32）。至於其他烏托邦理論或理念雖不至於驅除出境，卻也只是附屬於烏托邦的「附加類別（additional or supplementary category）」（28），即便如此，庫瑪也不吝惜地指出烏托邦理論的價值「即便是馬克思或柏拉圖未曾寫下不言而喻的烏托邦景象，也構成不了將他們從烏托邦領域永遠放逐的適切理由」³³（Kumar 3），雖說透過某種普遍原則，理論有助於解釋理想社會的本質，但理論的抽象性未若文學文本來得更具震撼力，以《烏托邦》為例，摩爾藉由十六世紀當時盛行的「探險家航行」旅遊母題豎立了烏托邦的基本敘述架構，假托一名老水手拉斐爾希適婁岱（Raphael Hythloday，亦有瞎掰之人之意）訴說遠行至奇妙國度的海外見聞，為求優托邦的逼真，透過文字細膩的描述城邦的理性、秩序、嚴謹位階、集體一致和自給自足等社會機制，招然揭示美好社會遠景的可行性，庫瑪對烏托邦文學性的強調，也揭露他對烏托邦世俗性的關注，烏托邦的完美必然是人的城邦「烏托邦描述一種不可能的完美，然在某種理智的意涵下，它並非是人性無法抵達的境界，如果不是現在就是在這裡」³⁴（Kumar 3）。

然庫瑪的理念實有跡可尋，將烏托邦視為一種文類的觀點亦可在舒文（Darko Suvin）的《科幻小說之變形》（*Metamorphoses of Science Fiction*）一書中——尤其

³² 原文如下：utopia may be nowhere but, historically and conceptually, it cannot be just *anywhere*.

³³ 原文如下：“The fact that neither Marx nor Plato ever wrote a proper ‘speaking picture’ utopia cannot be adequate grounds for banning them forever from the realm of utopia.”

³⁴ 原文如下：“Utopia describes a state of impossible perfection which nevertheless is in some genuine sense not beyond the reach of humanity. It is here if not now.”

是第三章標題〈界定烏托邦文類〉—清楚見到「烏托邦是在人所創造的歷史中，由人所寫就的書本中歸納而出來的文類」³⁵ (Suvín 62)。在區別烏托邦與其他理想社會的差別後，舒文賦予烏托邦一個精確的定義：

烏托邦是一個特定的準人類社區 (quasi-human community) 的文字建構，在那社區中，其社會與政治的機制、行為模式與群己關係之運作原則皆較作者的社區完美，此文字建構乃建基於另一個歷史假說所引致的疏離性 (estrangement) 上³⁶。(Suvín 49；中譯文引自張惠娟 257)

這裡的「準人類社區」意指舒文的烏托邦特徵不一定以人類為主，亦可涵括像《格列佛遊記》中的「慧駟國」(Houyhnhnms)，或是當代科幻小說中出現的異邦人或結合電腦科技的智慧人等，遠較庫瑪將烏托邦侷限為「人的世界」來的寬鬆。且舒文強調烏托邦的文學形式，藉此針砭傳統將烏托邦著眼於思想的缺失「要適切地探索烏托邦的意義，則不應該把烏托邦作品僅視為承載柏拉圖理念的透明體，除了意旨 (signifié) 外，也應探索意符 (signifiant)」³⁷ (Suvín 39)。值得一提的是，舒文將烏托邦文學放置於更廣泛的脈絡，所謂的文學形式並不只是侷限在小說文類，他所關注的焦點是探討層面應及於「整個文本」，而非僅只是抽離出來的思想而已。

研究者將烏托邦定位在文學文類，進一步將從內容、形式與功能等面向檢視烏托邦文類的內涵。在此研究者再次不厭其煩的重申自身立場，研究者既將烏托邦視為一個優托邦與惡托邦的集合名詞，換言之，對於烏托邦傳統也將含括這兩個向度，因此以下的討論將同時著重優托邦與惡托邦的內容、形式與功能的探討。大抵而言，從內容觀之，大部分的烏托邦學者皆會贊成烏（優）托邦即是對一個美好社會的描繪，不同的是每個時代、不同的作者對於何謂美好社會的特性與意義的理解與認知有所差異。從形式觀之，烏托邦文學等於美好社會與理想共和國 (commonwealth) 的同義詞，此外烏托邦文學具有做為現實社會的補償、批評和積極催化社會革新等功能。如前所言反烏托邦既為烏托邦的反作用，若是將上列的美好社會或是共和國取代成缺乏人性、受到高度科技與獨裁宰制的異化惡夢，反烏托邦文學由焉而生。

在庫夫曼 (Moritz Kaufman) 的《烏托邦》(Utopias) 一書中從烏托邦傳統

³⁵ 原文如下：“a literary genre induced from a set of man-made books within a man-made history.”

³⁶ 原文如下：“Utopia is the verbal construction of particular quasi-human community where socio-political institutions, norms, and individual relationships are organized according to a more perfect principle than in the author’s community, this construction being based on estrangement arising out of an alternative historical hypothesis.”

³⁷ 原文如下：“one cannot properly explore the signification of utopia by considering its body(texts) simply as a transparency transmitting a Platonic idea. The *significant* must be understood as well as the *signifié*.”

提供一個明確關於優托邦的內容：

什麼是烏托邦？嚴格的說，烏托邦意味著「烏何有之鄉」，某個遙遠的美福之鄉，在那展現了完美的社會關係，在沒有任何缺失的政府與機制統轄下，人民享受著簡單、快樂的生活，免於現實生命中的混亂、憂煩和永無止盡的擔憂³⁸。（研究者暫譯 1）

無可否認，庫夫曼提供了一個安樂、無憂無慮且令人嚮往的烏托邦情景，然在《烏托邦的過去與現在》（*Utopias Old and New*）中，哈利·羅斯（Harry Ross）嘗試從烏托邦的定義提出了一個嚴肅且困難重重的議題，他指出烏托邦的曖昧本質，確實，一個人的優托邦可能會是另一個人的地獄，且令人驚訝的是，許多看似美好的優托邦卻是極權主義的化身。（Mark R. Hillegas）在《夢魘般的未來》（*Future as Nightmare*）他將惡托邦比喻為令人喘不過氣來的夢魘：

惡托邦被描述為夢魘的狀態，在其中人們被制約在規訓中，自由被剝奪了，個體性崩解了，過去被系統性摧毀，而人們孤立於自然，科學與技術的使用，不是為了豐富人類的生活，而是為了維持國家的監視及對奴隸般市民的控制³⁹。（研究者暫譯 3）

獨裁專制、無所不在的監視與剝奪任何自由的掌控，這相似的景象無不喚起《我們》、《美麗新世界》和《一九八四》的互文關係，或許這就是烏托邦永恆的主題吧！另外惡托邦也展現了時代的焦慮與悲觀情緒，大有人類對理想及完美社會之渴望的幻滅況味，因此反烏托邦小說目的在於企圖將優托邦建構為具有高度危險性的狀態，且無可避免終將引領至獨裁政權，唯有當人類更加理解優托邦的本質時，它就不再是令無數人前仆後繼渴望的理想國度，而是設法避免的惡夢，一如俄國哲人巴狄耶夫（Nicolas Berdiaeff）在《世紀之末》（*The End of Our Time*, 1937）的警告，可為「烏托邦恐懼症」作一註腳：

烏托邦似乎比我們過去所想像的更容易到達了，而實際上，我們也發現自己正面臨著另一個痛苦的問題：去避免它的最後實現？
……烏托邦是會實現的，生活直向著烏托邦邁步前進。或許會開始一個新的紀元，在那世紀中，知識份子和受教育的階級將夢寐以求逃避

³⁸ 原文如下：“What is Utopia? Strictly speaking, it means a ‘nowhere land’, some happy island far away, where perfect social relations prevail, and human beings, living under an immaculate constitution and a faultless government, enjoy a simple and happy existence, free from the turmoil, the harassing cares, and endless worries of actual life.”

³⁹ 原文如下：“Dystopias describe nightmare states where men are conditioned to obedience, freedom is eliminated, and individuality crushed; where the past is systematically destroyed and men are isolated from nature; whe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employed, not to enrich human life, but to maintain the state’s surveillance and control of its slave citizens.”

烏托邦，而回歸到一個非烏托邦社會的社會——

越少的「完美」，就越多的「自由」⁴⁰。

我們對於科技帶來的進步抱持著懷疑的心態，不再是過去一味的信賴與自信，爲了擁抱呼吸更多的自由氣味，我們必須暫緩腳步思索：國家當權與個人之間的關係，如何藉由科技凸顯或愈加尖銳對立？

第二個探討烏托邦文類的判斷準則是「形式」。在此標準下，優托邦和惡托邦卻達到和諧共處的狀況，換言之，兩者的文學形式上皆是對理想性社會或共和國的描寫，而這也是最廣泛對於烏托邦文學型的理解。在《烏托邦思維史》(*The History of Utopian Thought*) 赫特哲勒 (Joyce Hertzler) 將烏托邦視爲想像性的理想社會之廣泛性術語。進一步，以摩爾《烏托邦》作品中的鮮明特色爲雛形，認爲烏托邦是這樣的描述「一個完美、也許無法實現的社會，座落在某處烏有之鄉，消除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缺點、荒蕪與困惑，生活在一個具有完美正義、充滿快樂和滿足的環境中」⁴¹ (2)，顯然，學者在定義烏托邦時，多半關注在其「優托邦」美好、安樂的氛圍。與赫特哲勒相同的是，伯納律在 (Marie Berneri) 《穿越烏托邦之旅》(*Journey through Utopia*) 一書中，肯定烏托邦在形式上的積極意義，將烏托邦理解爲「在想像國度或在想像未來的理想共和國」⁴² (209)，但也高度的懷疑優托邦追求進步與完善的意義，從中辨識了烏托邦似是而非的特徵，較爲可惜的是，伯納律只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詮釋優托邦到惡托邦的轉變，未能溯本清源從烏托邦的文學傳統中直接探究詞語創生時便賦予的矛盾。

談論到烏托邦的文學功能，大部分的學者將烏托邦視爲具有批評 (critique)、催化劑 (catalyst) 和補償 (compensation) 的作用。大抵上，將烏托邦視爲批評現實社會與對未來進展的激勵，此種爲優托邦觀點，忽略了在烏托邦傳統的另一個惡托邦的面向。在討論功能論時，亦可從積極與消極的心態觀之，在此兩種心態產生的烏托邦有很大的差別，在《烏托邦故事》(*The Story of Utopias*) 中，芒福特 (Lewis Mumford) 針對不同的心態分別提出了兩種概念，一爲「解脫性烏托邦」(utopia of escape)，它是人類對完美烏有之鄉的幻想，屬於神或大自然所恩賜的理想世界，人們無須勞動便有充裕、不匱乏的物質資源；一爲「重建性烏托邦」(utopia of reconstruction)，人類憑藉以己之力將現有的世界改造成理想之

⁴⁰ 這句話原出於巴狄耶夫，因受到赫胥黎《美麗新世界》的引語，成反烏托邦主義者競相傳誦的格言，原文如下：“Utopia appear to be much more capable of realisation than they did in the past .And we find ourselves faced by a much more distressing problem : How can we prevent their final realization?.....Utopia can be realised .Life advances towards utopia .And perhaps a new centry is beginning, a centry in which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utopias can be avoided and how we can return to a non-utopian society, less ‘perfect’ and more free. ”，此處翻譯以中譯本爲主。

⁴¹ 原文如下：“A perfect ,and perhaps unrealizable, society, located in some nowhere, purged of shortcomings, the wastes, and the confusion of our own time and living in perfect adjustment, full of happiness and contentment. ”

⁴² 原文如下：“ideal commonwealths in some imaginary country or in an imaginary future.”

境，芒福特認為，兩種皆因不滿現實社會而另生揣想，然對病態社會與文化的批判尤以「重建性烏托邦」最為有力。然在哈利·羅斯（Harry Ross）的《烏托邦的過去與現在》（*Utopia Old and New*）也將「解脫」視為烏托邦的合法功能之一，「他們變成有更多的準備接受真實世界，並且同意也許它不是這麼糟透的腐舊世界」⁴³（101）。在較為積極的烏托邦功能中，批評家大多引述王爾德的話語，根據他的說法，烏托邦的宗旨之一便是以追求社會進步為目標：

世界地圖如果沒有包含一塊烏托邦，它甚至不值一瞥，因為它缺少呈載人性的地方，當人性降臨這個國度時，它就向外展望，看到一個更加美好的國家，向前駛去。進步就是烏托邦的實現。

如果沒有烏托邦投向未來的想法，芒福特認為人類仍舊居住在洞穴中，過著悲慘且裸身不蔽體的生活。從芒福特的話語中透露出文明的進展似乎與烏托邦精神有所連結，某個程度也同樣回應了王爾德的觀點。的確，烏托邦做為提供社會進步的理想目標，即便是無法達到的彼岸。人類也將前仆後繼的啓航。

庫夫曼在《烏托邦》（*Utopias*）中提到烏托邦有兩種功能：第一為烏托邦不僅做為社會匱乏的表現，還被視為社會不協調與社會病理的反應；第二誠然，烏托邦呈載了一個更高遠的理想，將它導向正確的道路與方向後的實踐定將有助於社會進展（263-4）。如此觀之，正如利維塔（Ruth Levitas）所言，包裹在烏托邦的堅韌核心便是「『渴望』一對更美好的生活與生存方式的渴望」⁴⁴（7），就像是童話故事的結尾「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烏托邦也回應了童話的古老旋律。

至於惡托邦的論述較為明確的陳述在伯納律（Marie Berneri）的論述中。對她而言，惡托邦的含意就是反-烏托邦，或者更正確的是優托邦的變奏，「惡托邦以毀滅性的景象，對那些試圖以秩序統治世界且堅信不易的愚蠢之人，提出最嚴重的警告與反省」⁴⁵（xi）。如果說優托邦代表諸如完美、進步、快樂、美德等價值觀，則惡托邦的出現象徵著這些為人類長久以來夢寐以求的典範價值顯然遭到質疑、解構的命運。誠然，惡托邦是對優托邦的一種反噬與撻伐，它極力避免優托邦的實現，並將它看做危險的潘朵拉盒子，當被掀起盒蓋時，所有的優托邦將會變質，並產生一連串的惡托邦效應。在《未來的情景》（*The Plot of the Future*）中，德瑞根·克萊克（Dragan Klaić）將惡托邦理解為「對現今的反諷，更甚者，是對所謂進步坍塌的預測性反諷，普遍而言，也是對烏托邦雄心壯志的

⁴³ 原文如下：“as they become more ready to accept the real world and to agree that perhaps this is not such a bad old world after all.”

⁴⁴ 原文如下：“the kernel of utopia is that of desire—desire for a better way of being and living.”

⁴⁵ 原文如下：“A function of dystopia is to constitute a warning of the doom that awaits those who are foolish enough to put their trust in an ordered and regimented world.”

反諷」(69)。更進一步，張惠娟在其〈反烏托邦文學的諧擬特質〉一文中，將「諧擬」視為惡托邦文學的獨特性，獨尊惡托邦文學與被諧擬的烏/優托邦文學兩者間產生的雙聲（two voices）或雙碼（two codes）的激盪特質，以此擴大產生互文性的迴旋探討「反烏托邦質疑烏托邦的價值體系，試圖在烏托邦的價值體系上另築一套架構。……二種符碼或聲音併存其中，彼此抗衡，最終則為反烏托邦所維護的聲音獲得勝利」(133)。簡而言之，惡托邦既然以烏托邦為其攻訐目標，惡托邦文學中的雙聲戲碼即是以服膺優托邦價值的原始版本與以此相對立的反烏托邦價值體系兩者間的較勁關係，後者以其自我破壞的語調，從而達到對前者認知邏輯的扭曲，同時也鬆動了前者深信不疑的價值體系，當所有的典範重新被洗牌時，新的價值體系也灰燼中冉冉升起。

肆、從優托邦到惡托邦

烏托邦作為一個矛盾的詞語，也標誌了它的混雜性（in between），然惡托邦的出現除了宣示創作者對紛擾時代的焦慮與不安外，優托邦本身是否也能夠透露些微的訊息，讓我們一探烏托邦的真相？優托邦對於幸福的承諾與保證，為何會演變為一齣藏有陰謀的謊言騙局？會不會一如芒福特所言，表面上優托邦以整體社會利益於前提，強調人人平等的上會正義，但這種平等卻以個體性的消解為代價，即優托邦人民被訓練成遵守紀律、對政府絕對效忠、服從的士兵（3-24）？在此優托邦到惡托邦的轉折將是此部分的重點，研究者並不打算將烏托邦的解脫層面納入討論範疇⁴⁶，主要以烏托邦（包括優托邦與惡托邦）對社會的積極重建性為主，這種烏托邦著眼於社會現實，以改善社會謀求最求人類最大福為目標，並從烏托邦文學傳統中歸納出兩項原則：

（一）以不變應萬變

烏托邦最主要的特徵是：拒絕變化的靜態社會。烏托邦之所以將其政治與社會結構維持永恆不變的狀態是有其目的的，策劃者隔絕所有促使潛在變化的社會因素，杜絕任何導致社會腐敗的劣根性，這樣的結果是人類將無需為明日擔憂，換言之，為了一勞永逸解決人類對未來的擔憂，烏托邦豎起高牆將變化隔絕在外，再者將安穩的今天無限量地複製或伸展，這雖不失於一種解決方案，但可全盤預知且不出錯的生活節奏容易導致機械化而枯燥乏味。另外烏托邦計畫也因為在此無風無浪的生活程序中，能夠照原來的程序與規劃進行，永久保持其理想狀態而不墜，由此可知，烏托邦在本質上便是依循計畫完成的完美（接近完美）之境，烏托邦的不變不是不可以變，而是無需改變。

⁴⁶ 芒福特認為從對於烏托邦的態度可延伸出兩種心態，一為「解脫性的烏托邦」，當人受到挫折時，幻想自己得到補償的純粹心理作用，往往只求一時之快，不切實際，多為脫離現實的夢魘；一為「重建性的烏托邦」，積極面對現實，以改善問題的核心為主，目的是設計理想的社會模式，達到追求幸福生活為人類的終極目標（15-23）。

面對味如嚼蠟的烏托邦，德國社會學家達蘭道夫（Dahrendorf）曾說過：

烏托邦跟墳場的不同之處，是烏托邦中偶而還有一些事情發生。……可是……在烏托邦的社會中所發生的一切過程都遵循著反反覆覆的模式，是在整體的設計之內發生，同時也是整體設計的一部份，……雖然這種社會的某些部分依照預定、可計算的方式進行，烏托邦的整體卻永遠留在不動的狀態中。（轉引自喬治·凱特布（George Kateb）12）

達蘭道夫提到烏托邦生活中類似死亡氣息的寂靜、平穩、規律，同樣也在 H.G. 威爾斯的《現代烏托邦》受到言論的撻伐與抨擊，威爾斯深刻的認知到靜態社會的潛在危機，因此他提出了一個進步的烏托邦觀念，標誌著烏托邦思想的新紀元，在第一章開頭部分是這樣說的：

在達爾文加速了世界思想之前，人類鑄造了不少烏托邦和無何有之鄉，現代夢想者所想像的烏托邦，跟往日那些構想必然的有一個基本的不同之處。往日烏托邦和無何有之鄉所描述的都是完美的、靜態的國家，是一個一勞永逸的快樂與均衡的國度，永遠斷絕了事物中所寓含的不安與紊亂。在這些國度中，我們所看到的是健康而單純的人民，在美德與快樂的氣氛中享受著地球的果實，而由同樣美德、快樂的下一代來繼承，如此代代延傳，一直到天地厭倦為止……但現代烏托邦卻絕不能是靜態的、不變的，絕不能夠成一個長久不變的狀態，而必須是一個有希望的狀態，要導向陸續上昇的連續狀態。（轉引自喬治·凱特布 15）

威爾斯提出的烏托邦概念是允許變化與擁有個人自由的，但亦有學者指出其為「現代烏托邦」釐訂的政策與法律，與其欲揚棄的前人烏托邦規劃大同小異（Eliza Bath Hansot 1947）。從威爾斯的例子中，不難理解近代烏托邦作家在面對理念與實踐間的矛盾與拉扯，何以烏托邦與變化是相悖論的？烏托邦的僵化建立對無法預估的未來之潛在的恐懼，懼怕一絲一毫的變化將導致社會完美結構的崩解，姑且不論改變的結果是否如一如預期，改變並非全然出於人類的邪惡，改變有時是為求善，但烏托邦為了維持當初的設計原貌可謂是算盡機關，烏托邦的拒絕改變不僅形成了社會的封閉，而這種人為的控制也造成了烏托邦的變質，烏托邦的生活簡化到非常單純的程度，從中剝奪人類體驗，缺乏比較和選擇的機會，以剷除讓人民產生慾望的事物，而亦步亦趨的計畫社會不僅忽略了個體間的差異性，也容易導致極權社會的產生，誠如華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所言，如果要任何一個社會變成「有計畫的社會」，它的人民就必須完全服從政府的計畫，如果它要達成官方的目的（official purpose），一定不准私人目的（private purpose）和它抵觸（轉引自何冠驥 265）。同樣論調也出現在 J. L. 泰蒙（J. L. Talmon）的言談中：

烏托邦主義假定個人有自我表現的自由，但同時又假定社會有絕對的一致性。這兩種情況要想共存，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所有的個人共同一致的同意。然而所有的個人是不可能共同一致的（轉引自喬治·凱特布 17）。

因此烏托邦的穩定性建立在人民認知價值與機關組織達到一種眾人與共的同意，同意可以是強迫的，也可以是自發的，也可以藉由條件制約或扭曲的方式達到自發性，普遍的同意意味著社會結構的一致性，也意味著杜絕任何衝突發生的社會。

（二）秩序化歷史產物

承上，烏托邦爲了維持社會安穩而精心規劃實踐的步驟，無疑也反映出烏托邦是由文明操作的產物，文明相對於自然，文明的高度發展也意味著自然的棄絕與壓抑，例如烏托邦中的人民爲了換取社會的安寧與整體的幸福，不得不放棄追求自由與個體快樂的天性，這樣的情況類似自我受到一個更高的超我道德，馴服一味追求的快樂原則的本我，因此烏托邦追求的秩序是以理性爲依歸，克制人類與生俱有的慾望，理性與感性的衝突反應出我們這個時代至關重要的議題：群體社會秩序與個體自由的相互協調，此種矛盾亦可視爲人類天性與文明規範之間的拉鋸戰，尤其是以處理人性弱點向來爲烏托邦設計者最爲棘手的部分，但自由與文明秩序的平衡拿捏卻是見仁見智的問題了。事實上，正是因爲人性有不少缺點，才需要烏托邦計畫改善社會，然一般而論，烏托邦設計者似乎不相信人類的自律意志，所以退而求其次藉助鐵腕政策防止人們犯錯，更極端的方法是利用優生學，企圖以生物學的方法改變人性本質。

理論上，即便烏托邦作品描摹出作者心目中對理想社會的景象，但也並非每一位讀者皆能認同此種構想，例如貝拉米的《回顧》便受到兩極化的讀者評價，而作者對社會複雜的掌握度不夠或受限寫作技巧，也促使作品失之粗糙而使讀者產生對制度規劃的懷疑。因此烏托邦文學本體上最大侷限在於時代思維的限制：烏托邦的形構既出於文學家的想像，即便文學家有其令後人敬佩的前瞻性，這幅對世界規劃的美麗藍圖終究無法脫離其所處時代加諸其上的意識形態。這就是芙蘭西絲與芭芭拉（Francis Golffing & Barbara Golffing）所說的意義：

每一代的人都鑄造他自己對未來的想像，而這種想像基本上又出自歷史。……「對照世界」（counterworld）—非世界（no-world）、無何有之鄉（no-place），也就是「烏托邦」—也非靜止不動」（51）

兩位學者認爲烏托邦作爲歷史進程的產物，作家生存的歷史處境、時代氛圍與其所居處的階級位置等因素，決定了他對「另世界」的想像，也影響了他選擇以何

種壓力艙做為烏托邦的載體，承此推論，烏托邦的設計藍圖是有其時代侷限的，正如我們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看見的奴隸制度和嚴謹的階級區分。就某種意義而言，烏托邦作家眼中的世界絕非理想世界的最佳註解，這個虛構的、烏托邦式的對照世界不僅彌補了他對所生活世界所感到的缺憾，甚者或明或顯的隱含著作者對自身處居社會的批判，由於不滿社會現實，才会有建設一個更完美社會的動機。因此重建性的烏托邦也並非毫無現實根基的空中閣樓，而是存在歷史中的，且最艱困的是，必須要在不違背歷史中對歷史本質進行改變。換言之，烏托邦作者不僅評估現實社會並做出批判與重新規劃，他們站在「現在」的立場發聲，不管下錨在廣袤的異端空間或不久將來的時間歷程中，他們關懷的是現在與未來的關連。

小結

烏托邦不愧是數百代人類追尋理想之邦的想像藍圖總匯，究其根底其核心問題離不開「人為什麼而活？」的大哉問。一為在實際可行的範圍中，人之可能性的廣域到底在哪裡？人這種生物無疑是走在一端繫在獸性、一端繫在神性的鋼索上，到底人性的極限為何？再者在不違背群體和個體福利前題下，什麼才是值得我們追求的理想社會狀態或價值體系？然弔詭的是，烏托邦的矛盾性也存乎其本身的價值判斷上，以研究《醜人兒》三部曲文本為例，它既是優托邦亦是惡托邦兩種性質的重疊，就前者而言，包括藉由整型手術的實踐追求社會平等公義，就連改變人類的大腦設定也是為了阻止人性惡的一面而趨向群體之間的和諧，但仔細思考，這優托邦理想的實踐卻是以抵滅個體差異和剝奪人類的體驗為代價，換言之，烏托邦做為人類理性化思維的具現，為了實現烏托邦理想而採用的極端手段與方式，也使得烏托邦變質遠離初衷，更甚者，為了方便當局者對於秩序的控制與維持，它以斷傷人性為代價，並且不允許人類達到其可能達到的人性高度與深度，如此說來，優托邦是一種美麗的騙局，惡托邦才是真相，那麼如果說優托邦的冰冷秩序是人類所厭膩的生存狀態，試問烏托邦的下一步該怎麼走才會安穩？

第二節 阿波羅與戴奧尼索斯的紛擾

在西方論述框架中，身體的概念是不斷流動、變化的，正如霍桑（Jeremy Hawthorn）所說：「身體在不同的文化與歷史視域中具有不同的內涵」（轉引自彭體春 262）。換言之，身體概念會因為不同時期和語境產生內延與外延意義的變遷與差異，不同的身體模式彼此之間相互競爭、衝突、協商與互補，在此說明了身體的社會性與建構性。有關身體的探討可溯源至希臘時期認識論的哲學思辯，然不論在柏拉圖身心二元論、中古奧古斯丁掀起的禁欲主義和笛卡爾理性與感性二元關係中，相對於心靈、靈魂的抽象存在，身體僅被視為動物性質的肉體，身體做為有限的載體，不僅是滋生慾望與衝動的惡淵，更成為人類追求心靈永恆存在的束縛。在此觀念下，在傳統社會學領域的身體議題亦是缺席的，或者更確切的說是「缺席的在場」（absent presentation）（轉引自李康 35），主要原因在於社會學理論為了追求學術制度化而對生物主義進行批判的發展結果，這始料未及的後果使得身體的談論湮沒在社會學中，形成一段逃亡的、秘密的歷史（Turner 89-93）。由此可見身體的經驗與談論長期以來為西方哲學、社會學所扁斥、壓抑與邊緣化。直到生命意識哲學興起後，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與德勒茲（Gilles Deleuze，1925-1995）等人重新提出對身體的關注，尤其在二十世紀六〇年代後，學界各領域開始意識到身體存在的現實，「身體」儼然成為當代文化語境脈絡中重要的關鍵詞，以下研究者以鳥瞰的方式簡述西方身體論述的發展背景，看似與論文正文無所相關，實則有其必要性，原因在於：主要論述的點綴就像是研究者手中的地圖，得以明白自身的座落點，並按圖索驥從中選擇適合文本分析的方法取徑，不至於因獵豔欣喜隱遁其中渾然不知魏晉，亦節省不少獨自摸索慘遭迷失的窘況。

壹、卑賤的肉身

西方身心二元的對立可溯源至希臘時期，過去身體一直是形式（太陽神阿波羅）與慾望（酒神戴奧尼索斯）之間的激戰焦點。在柏拉圖的《斐多》、《理想國》中，柏拉圖對身體皆是抱著嗤之以鼻的態度。他藉由蘇格拉底之口宣揚他的理念「我們要接近知識只有一個辦法，我們除非不得以儘量不和肉體交往，不沾染肉體的情慾，保持自身的純潔」（？）。在柏拉圖的認知中，伴隨著身體而來的食色慾望、疾病、恐懼、利益等，不僅無助於靈魂對真理、知識、理性、至高的善的理型世界的追求，反而是干擾靈魂的障礙。換言之，在柏拉圖的哲學思考中，身體基本上是處在相對於靈魂所宰制的真理與道德之卑賤位置（汪民安 4）。中世紀身體仍舊逃離不開宗教倫理的磨難，奧古斯丁認為人類必須克服身體的慾望，尤其是性慾部分，才能為「上帝之城」所接受，為上帝所拯救。為了將喧鬧不已的身體慾念加以撲滅、壓制，奧古斯丁拉啓了靜默與蒼白之禁欲主義的序幕，在教會與修道院的高聳圍城中，僧侶、修士與修女透過苦行、冥想、祈禱、獨身、齋戒、貧困等克制身體的手段，讓身體陷入長期的寂靜狀態，如此得以讓

靈魂傾聽聖靈的啓示，最終得到上帝的救贖。不管是在神學家或是哲學家的眼中，身體卻是以一種悖論的戲劇方式出現：稍縱即逝且終將腐朽的身體成爲靈魂追求永恆真理所必須超越的對象，就此觀點身體必須存在，否則將如馮珠娣（Judith Farquhar）所說的「沒有身體，超越就沒意義」（對話錄 107），在此身體以一種貶斥的方式被談論著，以一種醜陋、污穢不潔的方式對身體概念進行反覆的再製，由此觀之，認爲身體是反社會的慾望之處所不是一件生理事實，而是一件具有政治內涵的文化建構（Turner 97）。

在啓蒙時期理性之焰的照耀下，人類的個體意識從對上帝卑微的盲從中解放出來，在笛卡爾的思維中，意識心靈和推算能力被視爲皆是追求知識與真理必不可的工具，藉此人類得以探求自然的奧秘。「主體的實質標記是思考，而不是盲目的身體，知識是自我意識進行反覆的理性推算而獲得的」（汪民安 6）。笛卡爾斷然將身體與意識截然劃分：

我斷定，我是一個實體，其整個的本質或本性僅僅是思考，而是為了存在，它不需要空間，也不需要任何物質的材料。故此，這個自我、這個靈魂——是他們使我成其為我——整個的不同于身體，它要比後者更樂於去認識，並且，儘管身體不會這樣做，但是靈魂卻不會停止它現在所是一切。（轉引自薩謬爾·托蒂 169）

不同於希臘哲學和中古宗教，笛卡爾並不嚴厲的譴責身體的動物性，而是一頭栽進偉大廣袤的心靈世界，身體以一種存而不論的方式遭到笛卡爾驅逐出科學客觀理性的版圖之外，身體不再是個問題了。直到二十世紀三個偉大的傳統，包括梅洛龐蒂的身體現象學，涂爾幹、莫斯、布迪厄的人類學傳統的社會實踐身體，和尼采、傅柯的歷史、政治身體觀，終於扭斷身體與意識的對立關係（汪民安 2003：21）。

貳、身體論述

在英語體系中，對於描述身體模式的語彙甚爲缺乏，未若德語世界來的豐富。在德語有兩個重要關於身體描述的語彙，一爲“der Leib”，指的是活生生被激發的感官身體；一爲“der Körper”，指的是客觀的、外在的和被體制化的身體，Leib/Körper 的區別表現出肉體的模稜兩可和人體存在的兩種維度：客觀與主觀、個人與非個人、社會與自然。平心而論，肉體同時存在 Leib/Körper 兩種向度，然對照西方身體研究的發展，卻因爲針對不同的探討主題與立場，遭逢了兩種不同論述發展：從本體論觀之，有基礎主義和反基礎主義的區別，前者將身體理解成活生生的經驗，相較於前者著重的生物存在，後者將身體概念化爲鑲嵌在社會關係、權力流轉的話語。就認識論而言，主要集中在社會建構與反社會建構的爭辯中，論點在於是否將身體視爲獨立於話語實踐的表徵形式（Turner 15-22）。

整體而論，西方論述發展大致將身體的研究分成「身體的經驗性」與「身體的文本性」兩類，然兩者的關係並非建立在對對方的批判立場，而是相互修補的關係，一如特納所言「我應該斷定我們實際上不能在這兩種競爭性取向中做出選擇，因為某種程度上的理論修復是有可能的」（Turner 22）。總括而言，這兩類的身體研究主要強調個體-社會、物質-文化、主觀-客觀的分野，前者是將身體視為一個承載社會、文化符碼的載體，不斷的被銘刻歷史痕跡，身體在此被視為被動性的刻寫機器，具有畫布性質，但其缺點卻是忽略了個體身體經驗的多樣性、偶然性，或是身體群體經驗的關係性；後者過於強調身體做為物質的體驗，沒有考慮到社會、歷史、文化、政治等因素對身體的影響，因此綜合這兩者，目前在人類學與社會學領域中出現了對「有著歷史深度與社會深度活生生的身體概念」的呼求。

面對將身體理解成活生生的經驗，或是將身體視為被話語實踐所建構的象徵體系的兩難，特納（Bryan S. Turner）在其〈身體問題：社會理論的新近發展〉一文中提出了具包容性的看法，即所謂的「方法論的實用主義」：「我們對任何一種或所有二元性的強調都取決於我們的研究類型」（Turner 30），換言之，研究者可根據所需解決的問題性質與解釋層面，挑選適合自身的理論取向與認識論立場。在此研究者並不打算逐一詳細介紹有關「身體」各家理論流派的內涵，首先將簡述西方身體論述研究的背景脈絡，試圖釐清身體研究的取徑，並盡己所能概略性的梳理自身認知的理論思潮，再者根據研究焦點將關注於「身體的文本性」部分，主要涉及的理論書專書以布萊恩·特納（Bryan S. Turner）的《身體與社會》（*The Body and Society*）第二版為主，試圖為本研究建立理論基礎與架構。

一、身體的經驗性

法國哲學家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在其代表作《知覺現象學》（*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提出，我們日常現實生活和對世界的感知取決於以身體為角度的向外觀察與涉入，更進一步說，我們就是藉由活生生的身體——不管是積極的主動介入或是受到慣習的牽引——體現思維與意識，因此身體並非僅只是生物體的機械運作，而是具有心性的（mindful），因此「我們是透過我們的身體存在於世界之中，並且……我們感知世界就在我們身體之中」（Merleau-Ponty 206，轉引自黃盈盈 22），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知覺為先即是經驗為先，因為處在知覺覆蓋下的是一個動態和建設性的空間，透過具體真實的身體，「我」的概念得以具現。

二、身體的文本性

1. 身體概念化為象徵系統

即將身體視為具有社會意義或象徵符號的載體。在社會學領域中，身體從理

念上被視為象徵系統的觀點立場可以說奠基在恩斯特·康特諾維的《國王的兩幅身體》，全書主要是藉由國王的（象徵性）身體，分析國家政治統治權的歷史發展。國王不僅像平凡人一樣具有終將衰老腐朽的肉身軀體，但同時也具備了永久性的王權和統治權的象徵性身體，雖然這個國王終會有駕崩的一天，但下一任合法繼承人不僅確保了王室血統的正統性，也以國王象徵性的身體持續握有統治權，這就是「國王/皇帝萬歲！」的社會意義。在《規訓與懲罰》中，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繼續延伸康特諾維的概念，因為國王身體的整體性象徵對維持政治社會秩序至關重要，對國王身體的攻擊亦可視為對社會秩序本身的破壞，因此早期封建社會對弑君者政治犯便採取報復性的身體嚴懲，甚至此種酷刑懲戒也形成公共景觀，寓含了殺雞儆猴式的示眾警告意味。

然身體的社會性更加充分的展現在人類學家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 1921-2007）的著作中。在《自然的象徵》（*Natural Symbols*）的「兩種身體」，道格拉斯將身體區分成生理性與社會性的身體，且社會性的身體制約了生理性身體如何被感知的方式，換言之，人類並不存在以生理為基礎的自然身體，皆是透過社會形構身體的概念，身體被視為思考社會關係的一種隱喻。而在《純潔與危險》（*Purity and Danger*）中，道格拉斯將身體隱喻為整個社會的象徵再現，透過身體的秩序也反映了社會結構的失序風險與穩定秩序、神聖與褻瀆。

2. 身體實踐為社會結構的隱喻

此種觀點將身體實踐視為理解社會語境中自我體現的本質，此種以微觀互動的人體性質為焦點的社會學理論又以高夫曼（Erving Goffman, 1922-1982）的象徵互動論為首。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中，高夫曼以舞台演戲的概念詮釋社會互動關係，參與人際關係的群體或個體皆是在一個名叫「社會」舞台上的演出演員，而演員的演出並非都是順利的，或是按照既定的劇本程序，有可能遭到失敗、忘詞、尷尬等脫節演出，隱射現實的社會互動現象，身體實踐可能在公共場合違背當事者的意願，發出未受控制和潛在性破壞社會自我的訊息，例如尷尬情緒與臉色變化有關，而演員的目的就是修復臉面功夫，從中透過：在社會互動關係中，身體的姿態可被視為一種可被解讀的語言符碼。

進一步，將身體實踐視為社會文化訓練與實踐產物的觀念在馬賽爾·莫斯（Marcel Mauss, 1872-1950）得到系統化的闡釋。在莫斯看來，身體是一種生理潛能「身體是人類最基本、最自然的工具」（Mauss 104），這種生理潛能是個體受到社會訓練、約束，而集體性的形成一套維持社會秩序的組織實踐，因此莫斯認為身體的物理實踐，如走、坐、站等行為，雖有官能性的基礎，但其實踐的意義必須置入文化和社會的語境脈絡中。再者莫斯提出的「身體技術」（the techniques of the body）概念，便是建立在生理身體實為社會、文化所建構而來的

認知，進而提出「慣習」觀念：「慣習不是指形而上那種神秘的記憶，……不隨著個人的變化而變化，而是隨著社會、教育、禮節、時尚、聲望的不同而不同」（Mauss 73，轉引自黃盈盈 24），後為布迪厄承繼發展為「身體的文本資本」概念。

布迪厄在其身體社會學中，特別關注社會習性如何銘刻在日常生活的身體實踐。布迪厄將人體視為一種場域的空間觀念，而不同社會階級的文化實踐與社會習性，皆透過外部的身體表現出來，因此身體變成一種文化資本，象徵性的再現了文化階級稟賦，換言之，身體成為具現社會階級稟賦的載體。

3. 將身體視為表現權力關係的話語機制

在此強調的是權力對個體身體或集體身體的管制。洛克（Margaret M. Lock）認為身體政治主要是指『對於個體身體或是集體身體的管理、監督與控制，出現在生殖、性領域、或是工作、休閒領域、疾病等其他反常領域』（Lock 8，轉引自黃盈盈 25）。在此尤需關注女性主義的論述，因為極力呼喊「個人即政治」的女性主義對於女性的身體如何遭受父權體制的扭曲、漠視和污名化，紛紛從性別的角度凸顯身體的政治性，將生物、性別、性徵三者關係問題化，他們將身體視為具有爭議性的文本，換言之，身體為社會權力關係話語提供肉體性的基礎，但其盲點在於批判社會權力體制的同時，反而忽略了身體的身真實存在，此三者又因為變性產生的公民權和賽柏格（cyborg）的出現更加複雜，而後者為哈若維（Donna Haraway）在其著名的〈賽柏格宣言〉（“A Manifesto for Cyborgs”）從科幻小說中催生出來的概念，指即的是一種人與機器、肉體與信息混合的身體景觀，賽柏格的出現誠然擴充了身體的內涵。在此研究者並不打算涉入女性主義相關文獻，而是想探源影響後現代女性主義者甚深的傅柯。傅柯具體的從歷史的角度研究權力進展與身體的互動關係，在其《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一書中，傅柯闡述社會/國家對破壞國家/社會秩序的身體之懲戒方式及其含意的轉變，政體從直接對犯人身體施以嚴酷的暴力懲戒與威勢，到藉由監獄體制對身體一段時間的監禁，達到對其之干預與改造，雖然看似以道德為依歸的馴化機制逐漸取代殘忍的報復論，相同的是，身體成為權力實施、改造、監控、打壓的對象，另外傅柯引用邊沁的「全景式監視」的概念說明權力對身體的無所不在的浸淫與產製，權力並非上對下、從外部加諸於身體，而是成為身體的一部份，身體即是權力的產物。通過對歷史文獻的話語式分析與閱讀，傅柯的研究思維與成果解構我們日常生活中習以為常的身體管理方式，並揭示操弄此正常運作機制的黑手，但須注意的是，傅柯的身體觀念呈現出較多的被動性。

另外隨著二十世紀消費文化與時尚產業的蓬勃發達，人們漸漸關注對身體表面的審美性質即其商品化的再現符碼意義，女性美麗/男性強健的身體變成令人慾求的身體景觀，而充滿慾望的身體也意味著西方「身體理性化」價值觀的世俗

性，對身體進行的飲食控制不再是透過所追求的靈性生活，醫學專業術語取代了宗教表述，轉而追求世俗的健康長壽與苗條美麗（Turner 2002）。大行其道的視覺觀看文化，在看與被看的目光的迴環反覆中，主流話語的女性形象得以建構。

參、引述論點

本文涉及的理論專書以布萊恩·特納（Bryan S. Turner）的《身體與社會》（*The Body and Society*）第二版為主，其身體理論的核心在於將身體放置於社會變遷脈絡下進行歷史維度的理解。特納認為一個社會的主要政治與個人問題是通過身體得以表現，即所謂的「肉體社會」的概念，換言之，在這個肉體社會中，我們主要的政治與道德問題都是以人類身體為載體表現出來的，就某種意義而言，「人類有身體，人類即是身體」，這一個悖論形成《身體與社會》的基調和連貫的主題，因為我擁有身體，因此我有伴隨身體而產生的種種生理特點，在此身體被視為我可以施以控制的一個自然環境與客體，相對的，我也必須擁有我的身體，方可以身體為體驗起點，而個體的價值與意義立基在活生生的身體與社會文化互動的社會實踐活動上，因此現代的自我是一個再現的自我，而透過身體實體展現的外在形象亦被視為一種社會的再現體系，故無須對身體的實存感進行社會性的解釋，畢竟做為自然與社會中介的身體，「自然/物理的身體」早已被注入在文化理解與社會歷史中（Turner 1996）。

因此特納認為身體社會學涉及的概念核心應以「歷史的眼光分析社會理性化實踐與內部身體慾望之間的衝突與拉扯的社會權力關係如何具現在空間組織」，主要的特徵如下：一為身體既為自然環境的一部份，又是自我的文化中介，換言之，身體使得人類處於自然秩序和文化結構的結合點，因此「我們可以將身體當作闡釋和再現的外部表層結構和決定的內部環境」（99）。再者根據傅科的觀點，區分出身體的群體性與個別性是很重要的，如同個體身體，社會對群體身體的控制與約束也是沿著時間和空間兩種向度進行，包括控制各時期人口再生產的性慾和約束空間的人口膨脹。再者，即便身體具有自然的生理特徵、結構與發展，然詮釋身體特徵的概念卻是社會化的歷史產物，不論是在父權體制對女性、孩童等邊緣者的壓抑與支配、君權與血親連續性的相關等或在宗教體系中，身體一直處在政治鬥爭的核心。最後，身體對於微觀社會秩序和宏觀社會秩序來說都是重要的關鍵，身體既是日常生活中呈現自我表演的重要載體，也是社會進行排斥儀式的主要對象，因此身體社會學還需探討身體表面居從於文化監控的偏常行為，如羞愧、尷尬、臉紅等，也需釐清身體內部的偏常行為，如疾病和病痛的區別（Turner 99-102）。然特納談論的身體流變以西方源遠流長的歷史發展為脈絡，涉及父權體制、宗教、醫療系統下身體的紀律、管理與再現等，因此在此研究者並不打算一一整理歸納，而是試圖引述特納談論身體所用的視角，並對照文本的實際狀況，進一步轉化為己用。

一、理性和慾望的拉扯

人類擁有身體，屬於自然的一部份，身體帶來的心性，使得身體也具有思考能力，從而具有社會性，這種矛盾使得西方哲思根基建立在體現在太陽神阿波羅身上的理性與體現酒神戴奧尼索斯身上的慾望/非理性之間的鬥爭與拉扯，從理性與慾望的對立中延伸的思想，包括身體與靈魂、肉體與精神、物質與精神等，此種二元觀念也建立了社會學的基模。然綜觀西方文明化的過程，理性的勢力多半凌駕於慾望之上，獲得文明是以犧牲自然本能為代價的，換言之，文明需要不滿。例如在霍布斯的社會契約理論中，他認為人類既歸屬於理性動物，為了維護社會內部的安定，人類必須放棄自身的自然屬性，從而屈從社會規範以達成群體約束，在涂爾幹（Durkheim，或譯為杜克海姆）提出的「雙重人」（homo duplex）概念也是類似的看法，他認為人既是有機體的個體存在，也是做為以理智與道德秩序為依歸的社會存在，而後者的達成是建立在文明對自然激情的壓抑，也建立在社會集體秩序對個體身體的約束與限制。此外認為個體若沒有受到文明理性的馴化，將受到激情推動而變成道德淪喪、自甘墮落的觀念由來已久，其觀念基礎建立在人擁有身體這個生理事實上，然將身體/肉體視為慾望之所在、是激情與非理性的根源、擁有破壞社會秩序潛在力量等這些負面想法，卻是文化建構的歷史產物，由此可知：個體的內部秩序（kosmos）對於社會世界內部的管理形式（kosmos）是必要的，為了維護社會秩序穩定和個人間互動法則，必須要使身體的激情與潛在的混亂狀態從屬於社會與文化各種機制，換言之，代表社會文化理性與形式的阿波羅要壓制/戰勝代表個體身體瘋狂、激情與無政府狀態的戴奧尼索斯，且無論是在希臘哲學、中古世紀的宗教神學或是日趨世俗化的醫學話語中，不論是為了克制身體的慾望以追求靈魂的純淨、上帝的救贖或是展現追求美麗/強健/健康長壽的身體慾望，不論是宗教的齋戒、獨身，資本主義延緩的禁欲主義、醫學的攝生法等，在身體的實踐項目上，身體無時無刻是受到約束、控制與規劃，形成一種日常生活中自我監控的儀式性活動。

從理性的觀點觀之，身體被視為非理性的源頭，是對個人穩定與對社會秩序的威脅，反過來說，對人類身體進行理性化的控制是為了追求社會秩序的穩定，此種價值觀亦奠基文本的核心，摘錄一段對話加以說明之：

塔莉閉上眼睛，她深深地吸一口氣問：「但是，為什麼呢？」

「因為總得有人來控制一切的運作，塔莉。」（凱波博士說）

「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想知道的是，你為什麼要這樣對待美人呢？為什麼要改變他們的大腦呢？」

「天啊！塔莉，這還不夠明顯嗎？」凱波博士失望地搖搖頭反問：「這些日子來，他們都在學校裡教些什麼呀！」

「說鐵鏽人幾乎毀滅這個世界。」塔莉複述道。

「那就是你要的答案。」

「可是我們比他們更好，我們不會胡亂開墾大自然的荒地，沒有採礦，也沒有燃燒汽油，我們沒有戰爭……」

凱波博士點點頭說：「這一切都在我們的掌握之中，塔莉，因為這些手術的關係，如果我們放任不管的話，人類就會變成瘟疫，他們會毫無節制地繁殖，消耗所有的資源，被他們碰過的東西都會被摧毀，如果沒有這些手術的話，人類永遠都會跟鐵鏽人一樣。」

「在煙城不會這樣。」……

「要是幾百幾千萬的煙城人呢？不久之後，就會變成上億人口不是嗎？……對這個世界來說，人類就是一種疾病，就像身體裡癌細胞一樣，不過我們……特勤局……我們就是這個世界的解藥。」（《美人兒》133-4）

若從凱波博士的話語內容中，得以理解城市大人對青少年進行身體宰制的原因與策略，例如透過整型手術對個人進行大腦改變，或是有效的控制人口的繁殖等。若從話語形式觀之，文本敘述仍舊使用「身體」做為人類與世界互動關係描述的隱喻，更甚者，將繁殖過度且消耗資源的人類，視為造成（社會）身體呈現失序狀態的疾病符碼（瘟疫/癌症），這是因為身體做為最有力的社會隱喻，相對的疾病也是突顯社會危機的隱喻方式，疾病意味著無序、失序、無政府狀態。人類群體的總量增加促使道德生活品質的敗壞，對此文本的解釋架構為導致人類惡習的根源來自於大腦（物質身體之首），為了協調身體並將身體整合到穩定社會秩序的必要性，以及利用更好、更完善的權力機制控制它的迫切性，促使國家機制（特勤局）與醫療科技從而介入，身體的慾望得以從屬於理性規範的掌控內。在此，城市的理性化找到了一個新的探索對象與控制目標——人的身體本身，身體被視為城市投資的對象，城市積極的治療身體、管理身體、馴服身體，無非是實踐其理性秩序與世界和諧的宗旨。

二、檢視身體的四個向度

進一步，研究者將引用特納觀看身體的四個向度檢視文本中的身體現象。特納結合傅柯和菲瑟斯通（Featherstone）的觀點，建構一套概念性的身體類型學：菲瑟斯通將身體分成內部空間與外部空間，內部問題是約束問題，關注身體的內在結構、組織和保護，延伸的問題是社會組織如何有效的管理、控制身體的慾望、需要，以達到社會穩定性；外部問題是表徵，涉及到個體在社會空間的身體表現以及對身體的調配、控制等。另外傅柯認為身體不僅是單數的，也是複數的，即所謂的人口問題，若對應內部與外部的區分，便是隨著時間逐漸增加的繁衍，伴隨著都市擁擠的空間問題和生活品質等都市化問題的叢生。總括而言，這四個向度（內/外、身體/人口）分別是通過時間的人口繁衍、具現在空間的人口約束、做為個體身體內部對慾望的限制和做為外在身體在社會空間的再現問題，下者為其表格化：

	人口	身體	
內部	繁衍	約束	時間
對應文本	控制人口繁衍（非文本主要敘述核心）	醫療科技介入	
外部	控制、調節	再現、表徵	空間
對應文本	利用科技技術的全敞視的控制系統	醜人的自卑 美人的享樂 異人的優越	

進而，研究者將這四個向度對應到研究文本，如上段凱波博士與塔莉的段話中隱約提到，因為人口大量繁衍所造成的資源空間掠奪與及其相伴衝突的隱憂，但文本並未著墨城市如何抑制、約束生殖性慾，而是將社會穩定（人類不會像鐵鏽人一樣瘋狂的毀滅世界）著眼於對身體自然天性的約束，在實踐中，身體的約束是透過醫療科技的介入，得以對大腦進行永久性的改變，以便抑制人類的負面情緒，如殘忍、暴力、破壞等。在制度層面上，為了讓城市所有的人民無庸置疑地接受整型手術，城市形塑了一套「美/醜公平論」的意識形態，此意識形態的話語透過整型手術的進行，對身體進行實質的監控。在空間上，通過一覽無遺、無所不包的科技控制的防禦系統，城市得以有效的排除外來異物（尤其是煙城逃逆份子）的入侵，也得以對內部人民（尤其是醜人青少年）進行監視。另外由於對身體內部約束的有效性，也相對的促使城市對社會空間的自我再現設置某種穩定性，在文本世界中，再現的問題由於身體外在的象徵系統更加凸顯，包括美人與醜人之間的對比、美人之間追求酷炫的刺青與狂歡的生活方式等。美麗健康並富有青春活力的身體是青少年普遍認同的價值觀，對肉體形成狂熱式的崇拜也是整型手術所帶來的實踐，美麗的身體標誌將青少年引領至無止盡的派對狂歡、香檳、打扮享樂主義的追求，然從某種角度觀之，美人的身體放縱與內部因手術產生的約束，也形成了另一種身體語言的弔詭與矛盾。

最後研究者因文本敘事內容，探討焦點主要放置於個體身體的內/外向度，且這內部的身體環境與外部的身體表徵形成相輔相成的關係。青少年個體在接受城市安排的整型手術後，在外部，身體表徵顯示為美人，在其內部，個體的大腦也因生物科技受到更動使得其思維模式改變，城市藉由對青少年身體內部的掌控權得以達到其約束與控制的目的，而約束的身體也因大腦思維模式、教育體制等薰陶認同外部身體的改變，並將它視為唯一外在身體的表現模式，從而否定自身原本的面貌，從中可以看出，醜人與美人的判決標準不僅是受到時代、文化價值觀的變動，更重要的是，以身體為中介的美醜特質也變成政治爭奪的中心。

第三節 身體與烏托邦的關連

兩者理論的切合度

如上所述，研究者採取「烏托邦」與「身體」兩種理論作為本文主要的理論框架，兩者理論核心是否有其共通點？以《理想國》一書中蘇格拉底談論其塑造幸福國度的妙喻為例：

我覺得我們現在創造幸福國度，不是以零碎的方式，或旨在造成少數幸福國民，而是整體的。設若我們正在油漆一座雕像，有人走過來對我們說：「你們為什麼不把最美的顏色，髮漆在身體最美的部分呢——比如眼睛應當是紫色，你卻漆成黑色——」對這種人，我們可以很正當的答覆：「先生，你總不會希望我們把眼睛美化得根本不像眼睛吧？**你應該想到的，倒是我們使五官四肢，各符比例，因而使得整體都是美的**」……。在這種情形下，全國便能建立高貴的秩序，而不同的階層，以都能恰如其份的獲致分內的幸福。（黑體字為研究者加註）

姑且不論《理想國》中為後人批判的階級制度，從上引述中可以知道：身體被蘇格拉底視為談論烏托邦政治和社會制度的隱喻基礎，換言之，身體在此被視為一個象徵的交流系統。在西方人文社會學科思想裡，直到 17 世紀之前，將人的身體視為政治制度的隱喻一直是政治行為理論化的一種主要方式，因此身體/政治隱喻廣泛的流布在「政體」、「社會身體」、「國家元首」等用語中（Turner, 262-3）。更甚者，蘇格拉底將社會秩序的恰如其份與層級化對比成比例完美的身體，而後者更是探究文本的核心（接過整型手術後的美人皆為身體比例完美者），換言之，人類身體各部分的比例化、理性化實則為社會秩序的穩定象徵。

除了相關的字面意涵外，西方歷史長久以來將身體視為慾望的根源，且這個屬於戴奧尼索斯氏的慾望和瘋狂會威脅社會秩序，因此對身體內部必須透過加諸其上的外部形式方可達成其秩序化，而身體的秩序化也將有助於社會秩序的管理。然對於秩序化的追求同樣也是烏托邦的特徵（見上文），因此身體作為既是優托邦的實現，也是惡托邦產生的場域，同樣的，管理身體、馴服身體既是優托邦的實現，也是惡托邦產生的方式。因此，身體既是烏托邦實踐的對象又是手段，既是目標又是方法。

第參章 美麗的身體

在第貳章研究者提到以四個檢視身體概念的向度，並將關注點集中在個人身體內部的約束及外部表徵，藉此描繪優托邦趨向惡托邦的轉變軌跡。本章論述重點將針對個人身體的內部控制進行討論，並探究操縱身體論述背後的運作模式。若從文本設置的優托邦脈絡觀之，個體內部身體之所以需要受到控制的前提在於：如果要維護個體及群體間和平相處的互動法則，人類因身體存在所導致的潛在混亂狀態必須從屬於各式各樣的機構控制。在文本中，城市利用整型手術及其相關的配套措施，藉此約束個體身體的內部混亂與潛在的邪惡暴力等人性缺點，以達到烏托邦式的秩序安寧，由此可知整型手術是達到理想社會的政治實踐。若將其置於烏托邦的架構觀之，如何讓城市住民相信整型手術是良善的「普遍同意」（consensus）便是烏托邦社會成功與否的關鍵，達到普遍同意的一致性為構成烏托邦社會穩定的原因之一，而這種一致性是好還是不好？泰蒙（J. L. Talmon）曾嚴厲批評烏托邦的一致性：

烏托邦主義者假定個人有自我表現的自由，但同時又假定社會有絕對的一致性。這兩種情形要想共存，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所有的個人共同一致的同意。然而所有的個人是不可能共同一致的。因此，如果你要求一致，最後訴諸獨裁乃是不可避免的。（127）

為了探究烏托邦內在核心的詭譎，在此研究者將此烏托邦式的「普遍同意」視為一種意識形態的表述，並探究其如何藉由想像性的物質表徵遮掩現實真相。就路易斯·阿圖塞的觀點而言，他認為意識形態具有外在的外顯特徵，即意識形態存在於一種物質性的機構、儀式及其主體進行的實踐行動中，也因此阿圖塞提出了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SAs）的概念，且意識形態與個體的關連也建立在：自由選擇某種意識觀念的主體，其物質實踐的外在或內在行動，無非來自於形塑其觀念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與物質慣例。以宗教信仰而言，當主體信仰上帝時，一如阿圖塞引述巴斯卡爾所說的「就如同你相信一般地行動、祈禱、下跪，你就會相信，信心就會自然而然的到來」，此句話的邏輯是跪下，你就會相信自己是因為某信仰而下跪的，換言之，主體之所以前往教堂並從事其伴生的彌撒、跪拜、禱告、懺悔、苦修等儀式活動，端賴於主體對基督教界定之信仰慣例的服膺，而作為機構存在的教會，不僅代表著基督信仰的外化（特納也提到在中古世界教會被視為基督身體的具像），也代表著生成此意識形態機制的本體，簡言之，在表述意義上，外在的儀式的行為與物質性的機構可視為本身意識形態的基礎（阿圖塞 161-168，齊澤克 16）。

在文本中，「普遍同意」的達成並非來自顯而易見的強迫或獨裁的脅迫（除

了少數特例外)，而是主要透過有形的意識形態機制和集體儀式等物質性實踐慢慢馴化，諸如青少年十六歲的成長儀式、學校教育和整型手術實踐行為，在在可視為城市為了達到「普遍同意」所架支的意識形態之物質存在，此物質表述也汨汨地羅織了正向積極的社會公義、安定的生存環境等優托邦式的價值觀。以下將以文本中一段對話為例，從中延伸出本章節的討論議題：

「好啦！雪宜，大衛是真的人，不過我們身為醜人也是事實，妳光是自己期盼著或是一直告訴自己妳是美人，也無法改變這個事實啊！所以他們才會發明整型手術嘛！」

「可是那是一個騙局呀！塔莉，因為你一輩子只見過美麗的臉孔，妳的父母、妳的老師，十六歲以上的人全都是那個樣子，妳一出生就認為，每個人永遠都會是那個樣子，所以妳的腦袋已經被設定了，任何其他的樣子都是醜陋的。」

「這不是被設定，這是自然的反應，而且更重要的是，這樣也很公平，很久以前，美貌沒什麼規則——有些人比較美麗，大部分人一生都很醜，現在大家都是醜人……直到他們變成美人為止，沒有人是輸家。」（《醜人兒》89）

從上述文本中摘錄的對話與爭辯，引發出研究者一些思考：對美醜的觀點到底是生物自然反應？亦或是一種被文化慣習形塑的認知架構？如果後者，又是如何透過意識形態國家機制或是強制性的國家機器形塑呢？整型手術的發明是對自然造物的公平性彌補嗎？還是看似公平的規定與客觀的科技，實則遮掩了更大的社會差異關係、限制多元的可能性呢？如文本所示，學校教育、整型手術、十六歲成長儀式做為意識形態的物質實踐機制，以此為基礎所產生的意識形態和其話語機制為何？根據第一章研究架構設定中，身體無非是置於體制（意識形態國家機制或強制性的國家機制）與話語的流轉間，在此研究者將身體美貌論述視為達到優托邦意識形態的主要話語機制。下者為本章節研究者要處理的問題：

- （一）首先，城市的成人團體如何透過意識形態機制國家機器（例如學校機構）之操弄與執行，使得城市的青少年得以內化此認知架構，並視為理所當然？
- （二）將接受整型手術視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儀式行為，從儀式結構性的觀點，解讀城市青少年從醜人變成美人的儀式過程，釐清身體與儀式的關連性，並深入探討儀式作用於身體並操弄身體的話語機制。
- （三）進一步，做為城市必然性與集體行為之整型手術，其立基在何種正當性的論述機制上？又其背後所依據的身體/美貌論述與科技在此醫療行為中扮演何種角色？
- （四）最後總結：透過科技實踐所操弄的身體論述，何以促使看似天堂樂園的整型手術從而變質，作者背後訴諸的青少年價值為何？

第一節 學校教的事/是

以前在學校時，他們曾經解釋過『美』對人的影響力，不管妳知不知道進化論都沒關係，反正它對每個人都很有用。

有一種特定的美麗，每個人都認得出來那種美麗是什麼。大眼睛和孩子般豐潤的嘴唇；柔嫩、潔淨無暇的肌膚；勻稱的臉龐；還有一千種其他的小細節。在他們心靈身處，人們總是想找出這些美麗的記號，不管生長背景如何，一萬年的進化以使它成為人類大腦中的一部份。

他的部分卻說：我很健康，我不會讓你生病，而且不管你對那個每人有什麼觀感，部分的你會覺得：如果我們一起生小孩，他們也會很健康，我想要這個美人……（《醜人兒》19～20）

根據文本，城市的小孩在十二歲後便脫離父母的羽翼，以醜人的身份前往醜人鎮，在接受整型手術之前，接受長達四年的學校教育，並以學校宿舍為此階段的居留地。在這三不管地帶的醜人鎮，充斥著醜人之間的紛爭衝突，也夾帶著不安分的醜人到夜晚前往鐵鏽廢墟或跨界至新美人鎮的夜遊活動，或是日常生活中刻意搞怪的惡作劇（文本中俗稱的「醜人小把戲」）。若從時間的歷程觀之，四年的學校教育安排在青少年接受整行手術之前，若從學校教授的課程觀之，文本提到的相關課程大致圍繞在生物學（包括基因學、進化論等相關知識）、歷史和科學，內容不外乎是建構醜人對美麗的標準認知—符合基因學的比例對稱、過去鐵鏽人的無知與野蠻、整型手術所帶來的解放與社會正義等，從這兩個面向在在顯示，接受學校教育的時間與課程內容的計畫性安排，向青少年反覆灌輸一定量的、經過包裝的各種「知識」，其最終目的無非是為了讓他們毫無質疑地接受整型手術，而女主角塔莉在未接觸雪宜和煙城之前的反應也暗示學校教育的成功，例如在第一眼看見雪宜對她的外觀容貌與整體體型進行評價「……一頭黑色長髮綁成馬尾，兩眼分得太開了，嘴唇還算豐滿，可是比一般的新美人還瘦」（31），或者是為了見上變成美人的好朋友帕理斯一面，塔莉潛入新美人鎮對自身身為醜人的種種厭惡和反應「可是他看見她臉時的表情……也許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會將美人和醜人分開的原因吧？當你每天置身在一群美人身邊，突然看到一張醜陋的臉孔一定很恐怖，……眯眯眼和滿頭亂髮……」（29）。塔莉在學校教育的薰陶下，在美醜比較認知概念中，藉由醜化自身的同時完全認同美的價值。

顯而易見，透過學校教育機制，一種價值觀、一種認知系統、一種思想信念等正在形塑，此種人為概念的複雜構成可視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復合。「意識形態」（ideology）是由法國哲學家德拉西（Dsetutt de Tracy）於 1796 年所提出，意指「意見的科學」（the science of ideas），作為啓蒙思想的重要概念，德拉西的「意識形態」有其思想的歷史背景，對於觀念進行科學性的精確描繪與研究，並從中得到理性知識。在十九世紀意識形態成為馬克思學派重要的概念之一，尤其經過

馬克思，意識形態更成為西方文論中複雜且豐富的概念。早期馬克思的思想著重對意識形態真實的認識論探索，到後期轉而變成關注意識形態的社會功能，（孟登迎 767-9）。馬克思大致奠定了意識形態的理論之路，然其內涵並非僅止於此，仍舊廣泛地被不同的馬克思主義家定義、擴充著，至今更因為傳播媒體與資本主義的興盛成為文化研究重要的一環。本節研究者的論述觀點建立在路易斯·阿圖塞對於「意識形態」的詮釋，並以其名作〈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Apparatuses”）做為論述基調進行文本內容分析。阿圖塞對意識形態的詮釋提出一個有趣的觀點，即「意識形態是個體與真實存在條件的想像性關係的一種表徵」⁴⁷（阿圖塞 294），即意識形態透過一種置換或是扭曲，表徵我們與真實存在條件的想像關係，而這關係的想像性本質便是扭曲真實存在條件的基礎。在此阿圖塞將意識形態視為與現實相對的想像關係與幻象，然這個想像的虛構性，雖與現實不符，但也不能簡單地被理解為一種虛假的現象，仍舊暗指現實，可視為「作為一種生活關係的呈現」。意識形態就像是籠罩在我們周圍的空氣一般，滲透在整個社會結構中，甚至可視為社會有機組成的一部份，只是我們深陷其中無法自覺，對我們而言，它是一個真實的存在（研究者將它視為真的命題），因此，意識形態是一個複雜的社會現象，也無形中反應著個體如何理解和觀看世界的方式，換言之，世界的樣貌是透過意識形態的再現產物。

更進一步，為了將侷限於政治實踐領域的「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加以理論化，阿圖塞在馬克思提出的國家權力與國家機器的基礎上，提出了所謂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概念，加速意識形態理論化的進展。這種將意識形態具現為物質形式的觀點，也是阿圖塞對意識形態觀念之貢獻所在，即：意識形態的觀念或表徵等構成是具有物質存在的基礎，換言之，某種意識形態將以物質方式存在於一種或數種機制及其伴生的實踐中。那麼何謂「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呢？它與「強制性的國家機器」有何根本性的差別？首先，阿圖塞將意識形態的物質性思考置於社會整體結構中，思索兩者間的內在關係，並集中於國家機器的探討上，為意識形態找尋物質性的依存基礎。彼得巴利（Peter Barry）在《理論之始》

（*Beginning Theory*）提到「在我們一般俗稱的國家權力和國家控制之間，阿圖塞提供了一個有用區別。國家權力由阿圖塞所指稱的強制性結構所維持，但不僅如此，更微妙地，國家權力也受到看似永遠保障國內人民的意見所維持，即阿圖塞所稱的意識形態結構或意識形態機制」⁴⁸（Barry 164）。阿圖塞視國家政權（state power）與國家機器（state apparatus,也是 Barry 提到的 state control）是相對性的差別，前者透過對後者的掌控得以實踐，後者是前者的物質載體，即所謂的實體

⁴⁷ 原文如下：“Ideology is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imaginary relationship of individuals to their real conditions of existence”

⁴⁸ 原文如下：“Althusser makes a useful distinction between what we might call state power and state control. State power is maintained by what Althusser terms *repressive structures*, But the power of that state is also maintained more subtly, by seeming to secure the internal consent of its citizens, using what Althusser calls *ideological structures* or *ideological apparatuses*.”

(reality)。阿圖塞認為透過兩種國家機制的操作得以讓人民遵守國家制定的規範，兩者最根本的區別在於「它們是如何起作用的」：第一種是壓迫性的國家機構 (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es, 簡稱 RSA)，主要是透過暴力或強制的形式運作，例如對人民身體上的規訓，包括行政機構、警察、法庭、監獄、司法審判等，且強制性的國家機器隸屬於公共範疇，彼此間構成一個強大的組織，服膺於國家權力的統治下；第二種是意識形態的國家機構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簡稱 ISA)，主要是透過意識形態或是輿論的方式，讓人民的行為無形中服膺團體的目標與利益，例如政黨、學校、家庭、宗教、新聞媒介、藝術等。相較於強制性的國家機構，意識形態國家機構大多屬於私人範疇，且為數眾多，然阿圖塞指出，為數眾多的國家意識形態機構以矛盾的形式呈現對主導意識形態的屈從，即為數眾多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制形成場域，彼此形塑的話語機制在其中互相拉扯、協商、吞噬等，且重要的是，不管意識形態國家機制的彼此間的角力關係，其與國家權力形成相互依賴的關係（看似和諧實則暗潮洶湧），畢竟「任何統治階級都不能長期地掌握國家權力，而不同時對國家意識形態機制或在其中施行霸權」（阿圖塞 148）。

通篇論之，阿圖塞之所以大費周章的梳理意識形態的概念，主要是為了解答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型態中，如何讓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的生產關係，得以大量的再生產，這種生產關係不僅是生產資料的再生產，更重要的是勞動力的再生產問題，即勞動力對既有之秩序準則之順從態度的再生產。以如此觀點反觀文本，我們也可以得到這樣的概念：要讓烏托邦秩序得以安穩如故的生產條件，便是把握如何讓以趨近完美且無須改變的社會運作模式，得以繼續保持或再製此種面貌，為了讓烏托邦住民減少異議/異意，以達到此設定秩序結構的同一性認同，社會結構從而產生異化作用，且通過教育知識等意識形態機制，或是其他機制或慣例，目的是為了馴化子民或是讓服從性的子民得以再生產……。青少年在學校學習的不只是知識本身，而是架構知識體系背後的思維模式，也就是看待事情的觀點與角度，這種認知系統的灌輸不僅是對既有秩序準則的順從再生產，同時也確認了該意識形態的實踐生產。用更淺顯的方式表達之，即青少年對主導意識形態順從的態度再生產，以及為成人團體得以正確地使用主導意識形態的能力再生產，以便他們能夠透過話語機制輕而易舉的操弄青少年，以達到優托邦最終目的與成效。本節的探討重點為：如何讓文本中的青少年接受整型手術，並將成為美人的意識形態視為理所當然、並信以為真？針對這個提問可從兩個角度切入，一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一為壓制性的國家機制，後者將合併為下一章節討論，下者研究者將從學校教育之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面向切入，藉此種國家機制的運作模式檢視成人對青少年的壓制，並輔以情節摘要為例。

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學校教育

她們下方的街道上，充滿焚燬的汽車，它們全都被壓擠在陰森的牆壁間。不管是什麼毀了這座城市，這些人都曾試圖要逃命。塔莉想起上一次學校舉辦遠足來這個廢墟的時候，得知這些人的車子不會飛，他們只能靠滾動的塑膠輪胎移動，古代的鐵鏽人像一群被困在燃燒迷宮裡的老鼠一般，全都陷在這些街道動彈不得。（《醜人兒》69）

大體而言，塔莉對於某種美麗信念的堅信不移來自於學校教育的灌輸與刻意營造的文化氛圍。如文本所述，特定的美感有基因學的背書，但讓塔莉與其他青少年相信均衡美為唯一且合適的身體標準卻是意識形態的操弄，反應出意識形態的操作機制再一次透過學校教育為醜人塑造一個美麗的謊言，而它的策略方式之一便是掌握了歷史的詮釋權。在塔莉的世界來臨前，是鐵鏽人稱霸的時代，他們利用金屬鐵器搭建建築物，生活中非常依賴石油，但因不知名的原因有人製造了一種細菌，它無法傳染人類卻傳染石油，細菌的孢子靠空氣散播至每一個石油製品或原油上，它不僅改變了石油的化學成分，也促使石油的狀態不穩定，一碰到氧氣便會燃燒爆炸，這也釀成了鐵鏽人世界的毀滅。為了避免重蹈鐵鏽人的覆轍，塔莉時代的成人團體在鐵鏽時代的慘痛歷史經驗與反省中，小心翼翼的重新建立一個得以安全無虞的掌控所有人性負面因子的優托邦社會狀態。而繼鐵鏽人到來的新世界與普遍實施的整型手術等措施，帶來了預料中的世界和樂，從中也反應出文本暗示的線性歷史觀念：未來是長足進步的，過去是愚蠢與可笑的，以學校教授的歷史課程為例：做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之一的學校不斷地透過歷史課本和城市外圍為了展示而刻意保留的鐵鏽廢墟，在經過篩選的歷史語言論述和殘存的遺跡實體中，並透過學校老師的忠誠宣傳中，不僅印證了鐵鏽人的瘋狂和愚蠢：「以前那個時代有過多的人口，每個人都超級愚蠢，而且醜陋。」（《醜人兒》55）、「你幾乎很難以想像，有人可以用這種方式為了清理土地而燒毀樹林，為了暖氣和電力而燃燒石油，用自己的武器炸光或燒光自己環境。」（《醜人兒》70），這種種的鄙視態度更加印證城市欲透過學校機制所形塑的意識形態表徵。

誠然，鐵鏽時代是值得參考的最佳借鏡，新時代有能力避免從前的歷史錯誤，但這官方的歷史詮釋卻也延伸出屬於這個時代的新問題，從上述文本摘要中可知，塔莉對鐵鏽時代的瘋狂顯現出無法理解的觀感，從中研究者發現：意識形態架構與空間建立一種共謀關係，且這些言說植入（mobilized）某些固定的意義而排除其他意義的可能性與多元性，換言之，意識形態透過空間要素羅織它所需要的話語網絡，再者透過帶有警示意味的視覺震撼（它暗示著「你看我說的沒錯吧！」的意涵）驗證其（意識形態）所言不虛。實則在意識形態的網絡中，做為要素之一的鐵鏽廢墟所構成的意義並非本身所具有的，換言之，這個要素具有自由浮動性的能指，其意義的流轉乃是受制於支配此要素的表達方式，即所謂的意識形態，而其宣示的霸權特質也促使著某種意義固著其上，但此種意義並非不可剝離，當此鐵鏽廢墟被置身於不同的意識形態框架時，將會束縛於另一種意義體

系中，轉而為另一種意識形態服務。然不管是哪一種意識形態，歷史編撰本身就是一種概念的暴力形式，因為作為一種本質上任意流動符碼的歷史話語，受限於意識形態的架構，轉而被形構成某一種樣態，且這種樣態由一種看似統一、和諧的虛假強加於事件、人物和發生地點等要素上(Turner 240)，頗有普羅克拉斯蒂鐵床⁴⁹的暗示。

對應著鐵鏽時期與新時代的差異，接替鐵鏽文明的新時代堪稱是展現優托邦的治國氣魄：人口總量的控制不僅杜絕了因地球資源不足而引起的爭奪戰爭，對大腦控制也有效的制止了個體間為了獲取更高成就而產生的競爭，只是這種控制所換來的安穩竟是一貫性、整體性和一元性，似乎扼殺了讓其他差異存在的多元與多重空間，從而也簡化了歷史書寫中的點點駁雜和繁複摺縐，這種暴力的思維方式也如實的隱涉在文本中「單一栽培」的植物繁衍象徵—「它們變成這片土地上最多的雜草，……把其他所有的植物都排擠掉了，阻礙了樹木和青草的生長……」(184)。有關鐵鏽人的描述是這麼的鄙夷，也因此鐵鏽人的前車之鑑使塔莉深信整型手術、變成美人是必要且公平的「現在大家看起來都差不多，這是唯一能讓所有人平等的方式」(《醜人兒》51)。但這種公平卻是建立在自我醜化的前提下，甚至將人類臉孔的與眾不同和差異視為醜陋，也遮掩了基因遺傳科學的真實—例孩子會遺傳父母的特徵。且整個城市也過濾、清除不利於整型手術的資訊，例如在整型手術並未普遍的鐵鏽人時代，他們是如何看待未接整型手術的臉孔呢？這種種被遮蔽的觀點必須等到塔莉離開城市深入煙城時才能得到推翻與重新反省的機會。

此外鐵鏽廢墟在此凸顯的空間思維，亦可在城市本身展現的都市思維找到對比性的印證。事實上，城市的設計規劃與呈現方式也突顯了由官方主導的新時代思維。在鐵鏽時期的鋼筋鐵條建築與城市內部支撐大型建築和橋樑的氣墊柱之建築材質對比中；在必須燃燒石油才能運作的代步汽車與利用佈滿城市四周的鐵絲網而感應的飛車或滑板的交通工具對比中；在鐵鏽廢墟邊緣的野生且古老的大樹和城市內專門吸收二氧化碳和裝飾市區的樹木對比中等，在在顯示不同空間所展現的生態觀點與空間認知：以鐵鏽時期為例，鐵鏽人無止盡的掠奪地球資源，相較於城市卻發展出高度科技文明，以取代對自然的依賴與取用，更極端的是，城市將人類以鐵絲網隔絕於自然之外，且位在城市邊界線的鐵絲網還具備維護城市的治安功能（一旦城市人或不明人士越界會發出警訊），大有以人為改造/人工

⁴⁹ procrustean(adj.)有削足適履，牽強附會的意思，其字源源自於希臘神話：在雅典國家奠基者 Theseus 的傳說中，從墨加拉到雅典途中有個非常殘暴的強盜，叫 Procrustes 意思是“拉長者”、“暴虐者”。Procrustes 開設黑店，攔截過路行人。他特意設置了 2 張鐵床，一長一短，強迫旅店躺在鐵床上，身矮者睡長床，強拉其軀體使與床齊；身高者睡短床，他用利斧把旅客伸出來的腿腳截短。由於他這種特殊的殘暴方式，人稱之為“鐵床匪”。後來，希臘著名英雄提修斯 (Theseus) 在前往雅典尋父途中，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強令身體魁梧的 Procrustes 躺在短床上，一刀砍掉“鐵床匪”伸出床外的下半肢，除了這一禍害。研究者在此引用的用意事比喻意識形態對某一流動話語形構的強制性。

科技取代自然/原始純樸之勢。另外受制移動技術而產生的空間認知上，塔莉和雪宜等青少年風靡於滑板車的飛行快感，和鐵繡時期的緊閉汽車和高速公路相對照，從某種程度上，兩者皆營造出純粹移動性的空間功能，而速度也帶來了移動中的身體，快速移動的身體狀態強化了身體與空間的不連結感，從而使身體失去對現實與認知的感受力，尤以城市為例，雖然滑板車為青少年帶來了飛行的快感，但是依賴磁力漂浮運作的滑板車必須依賴相關適合滑板車飛行的配套措施或環境，因此在與雪宜私下夜遊鐵繡廢墟的經驗中，塔莉才從滑板車真正的重量發覺城市運作模式的虛假不實，從而理解沒有所謂的真相，只是不斷地藉由事件延伸與在製的訊息與話語。



第二節 我是十六歲

再過兩個禮拜，暑假就要結束了，塔莉居住的宿舍去年隨著大家一個接一個滿十六歲後離去，這裡的人數就持續地減少；現在新的一批即將要來接替他們的位置，塔莉看著最後幾個醜人跟著大家進門，個個都笨拙又緊張，慌亂得不知所措。裡面有十二個看起來絕對才剛到醜人的年紀，從一個可愛的小不點變成一個過大的、無知的醜人。（《醜人兒》83-84）

城市青少年在十二歲至十六歲的階段，因其生物特徵、身體外在表徵被貼上「醜人」的標籤，要脫離醜人成為美人的唯一方式，便是在十六歲時統一接受「整型手術」。因此對青少年而言，整型手術不僅是一項作用於身體的科技醫療行為，在物理意義上，透過舊有身體的改造與死亡已達到新生身體的健康與完美，更具有社會普遍性的「儀式化」意義。尤其是對個體而言，儀式具有生命轉折的性質，屬於重要的人生階段之一，年滿十六歲是得以參與儀式的生理、文化許可證。在這場整型手術儀式化的過程中，身體作為儀式主要接觸的中介對象，另外從儀式的觀點觀之，儀式的作用與象徵意義，也使得自然身體通過某些作用於身體上的實踐動作而相對的產生文化意義，藉由儀式，自然的身體轉化成為社會所接受、認同的個體。在文本中，接受整型手術與否成為儀式通過與否的過門，從而使得青少年身體區分成兩種類型，一為保有自己面目的生理身體，並擁有因身體而產生的外在缺陷，即俗稱的「醜人」；一為接受醫療手術後的生理身體，此時身體不僅意味著標準化和完美，同時後者也為城市社會所認同接受的「美人」身體樣態。在此因整型手術具有重複發生與適用於某一社群群體的特徵，研究者將援引人類學家簡奈普（Arnold Van Gennep, 1873-1957）的「閼界階段」（liminal phase）觀點，將醜人、接受整型手術到（新）美人的過程予以結構化解析，再者，將探究在此儀式階段中所形塑的意識型態，主要著重在居處在閼界階段（醜人鎮）的探討。

「閼界階段」（the liminal phase）的觀點發表在人類學家簡奈普（Arnold Van Gennep）於1960年代出版的《成年禮》（*The Rites of the Passage*）一書中。簡奈普是第一位關注個體生命轉折儀式，並將此過渡（transition）階段予以理論化的人類學家，其理論的田野基礎奠基在大量現代社會和原始非洲部族的儀式。對簡奈普而言，在社會中的任何個體，其生命不外乎充滿各種出生、童年、青年成年、訂婚、結婚、受孕、父職、受宗教世界啟蒙、喪禮等儀式和典禮，在其中也穿插著各種職業，因此生命不過是一連串的遷移：從一個工作到另一個工作；從一個居所到另一個居所；從一個年齡到另一個年齡（Geneep 3）。換言之，儀式過程是一種特別鑲嵌在社會、文化脈絡、為集體認同的行動或行為，伴隨著個體居住

地、狀態、位置和年齡等改變為結果。所謂的闕界階段主要是探究伴隨個體生命轉折點的典禮儀式，在研究中，簡奈普對照了伴隨個體轉變的階段性儀式，並檢視儀式的次序與脈絡，在儀式進展的輪廓上，簡奈普歸納出三個主要附屬的結構：「分離、過渡、和重新融入」(separation, transition and reincorporation)，更甚者，這些指及群體或個體之社會生活改變的儀式也須放置在前闕界/闕界/後闕界的階段中加以審視，個體通過這些象徵性的階段便能重新融入團體或社會，然須注意的是，簡奈普也聲明對每個人或每個儀式結構上，這三個類屬並不會發展成相同的內容。

「闕界階段」(the liminal phase) 這個術語是由簡奈普發明，這個術語也首度勾勒出儀式的本質與特徵，對簡奈普而言，人的一生是由一連串舞台所組成，有相似的開始與結束，無論是出生、啓蒙、結婚和死亡等儀式樣態皆可視為個體的儀式階段，其結構也可大致歸類為「分離、過渡和重新融入」：他必須終止現在社會身份/地位，然後等待，以穿過轉折階段，進入和最終的再融合(28)。就儀式階段第一個類項「分離儀式」而言，此部分又可稱為前闕界時期，即前闕界也是準備進入下一個轉折階段的儀式，此儀式主要的功能是關注儀式參與者與其先前被確認的社會地位或狀態做一個剝離的動作，指及的是參與儀式的初學者或見習者從原先的社會狀態或環境的區別與分離，或是透過淨身(洗滌)、削髮、改變穿著，甚至死亡的儀式以達到象徵性的分離動作，在這些分離儀式中，儀式參與者可能會被假扮成願意加入某一社群的異鄉人，他的身上穿著即稀少甚至沒穿衣服，或者彩繪著部落的圖騰的條紋。在這些分離儀式中，見習者顯露出他們是一無所有的、沒有地位、財富、社會階級、經濟獨立的能力等。換言之，他們沒有表徵自我、區別其他同伴的特徵。簡奈特以澳洲圖騰部落的啓蒙儀式為例，他提到一般在啓蒙儀式中大致會包含兩種基模，第一為與先前居處環境做一區隔或離開孩童與女性的世界，參與者以一種形而上的方式死亡，然後重新甦醒，被教導如何生存，重生的參與者將不同於其童年時期的他(74-5)。簡奈普提到作為青少年/啓蒙儀式的分離，可被視為是切除對童年及青少年臍帶式的羈絆(67)。在這前闕界的階段中，著眼於參與者與其先前所固定的社會地位與狀態形成一種象徵性的疏離，換言之，個體與其所處的社會脈絡形成一種斷裂，因此參與者被限制其與過去的聯繫，且他們將被送往一個領域，在這個空間中，他們將失去所有過去表徵其身份的符碼與認同系統，此時便是進入所謂的闕界階段。

在分離階段之後的是轉折階段，因為介乎前闕界與後闕界之間，因此又被定義為「闕界階段」。闕界階段的特殊性在於其交織於兩個世界的狀態，又因其為中立區域，因此有「區域性階段」(territorial passage)之稱：

不論從一個(世界)到達另一個(世界)，他將發現自身在生理上和宗教的神秘上處於一種特殊的狀態，並持續一段時間：他擺盪在兩個

進一步，簡奈特解釋闕界階段的必要性，對個體而言，闕界階段意味著穿過兩個世界：

在一定數量的例子中顯示：所謂的階段儀式被詮釋為介於某種事物的對分狀態、或是介於兩個分支間的儀式，藉由此儀式，一個人將離開他原先居處的世界，進入另一個新世界。⁵¹

在這個步驟中清楚的描述個體的社會位置與關係，在這個當下，儀式參與者不再歸屬於先前的村落、城鎮、宗教和社群等，他將在下一個時刻，因為即將到來的新世界而被賦予新的認同身份。「區域性階段」的範式提供簡奈普一個討論轉折儀式的概念框架，對他而言，這個具有中立區域特質的闕界階段，其再現的表達形式不僅就像是古典世界里程碑、雕像和牆，就像是門上一部份裝置的門檻。簡奈普總結，過渡儀式就像是門檻的象徵，這部分的儀式可以直接的被理解為進入、等待和啓程。

緊接其後的是重新融入儀式，這個儀式又被稱為「後闕界階段」，通過此儀式後，參與儀式者將成為新社會的一員或是准許返回其原先的社群，須注意的是，即便是返回原先社群，此時對通過儀式者而言，原先社群意義已有所轉變。融入儀式的作用在於做為一種策略，使參與者充滿能量使其能從容應付新的社會地位。此外，這種象徵性的融入儀式也包含了參與者得以回歸和重生的概念。以婆羅門的儀式為例，在這個印度教儀式中，簡奈普檢視出蘊含其中的二次重生概念。根據這個儀式，一個人不僅生為婆羅門人，他必須學習如何扮演像一位稱職的婆羅門，也就是說，在婆羅門從出生居處的神聖世界中，有三個明顯的區分：首先為個體與老師建立關係的前闕期，接著為作為實習者的闕界期，最後為成為正式僧侶的後闕界期。總體而論，後闕界儀式包括集合、融合、新認同的再生等模式，通過儀式者得以在新世界中獲取認可。

在研究文本中，城市的小孩到十二歲後便從「醜園鎮」脫離中年美人父母的羽翼，搬進醜人鎮的學校宿舍中，在接受學校教育的同時，也開始四年漫長的等待時間，為了進入美人鎮成為新美人，外在的物理改變是必要的，若引用簡奈普的闕界概念可如此觀之：十二歲脫離童年生活到學校住宿是前闕界時期，四年在醜人鎮的醜人生活是每個蛻變成美人必經的闕界期，具有與過去身份劃清界限和在一個中立區域等待的特徵，而重要的整型手術可視為青少年個體重新加入新社

⁵⁰ 原文如下：“Whoever passes from one to the other finds himself physically and magico-religiously in a special situation for a certain length of time : he wavers between two worlds.”(18)

⁵¹ 原文如下：“ The rites of passing between the parts of an object that has been halved, or between two branches, or under something, is one which must, in a certain number of cases ,be interpreted as a direct rite of passage by means of which a person leaves one world behind him and enters a new one.”(19)

群的融入儀式，此儀式就以往儀式不同處在於不具公開展演性、公眾開放性，除了儀式參與者和相關人員外，儀式的行經過程具有高度的遮蔽性質，主要是在醫療設備完善的密閉空間舉行，一般人所見的是通過融入儀式後的新美人，而新美人的外在認定成為得以進入美人鎮的條件。在此需再度澄清簡奈普的概念，個體生命的儀式階段有其特殊目的，雖透過不同的並置與結合產生相異的形式，大致上仍可依循簡奈普的概念略做分類，然儀式一致性的結構，卻因不同的社會脈絡中展現不同的辯證過程，文本世界亦是如此。在城市的青少年個體變成美人的前閾界/閾界與後閾界的儀式過程中，就屬四年醜人身份的閾界時期最為特殊，研究者將以此階段為探討焦點，著重身體與儀式的關連和其作用於身體的話語機制。

依照簡奈特的觀點，處在閾界階段的儀式參與者失去過去表徵其身份的符碼與認同系統，但又因為並未通過融入儀式未有歸屬的新社群，因此無法獲得新的認同身份，此時居處在閾界者便處在尷尬的身份認同情境，一如此階段的城市青少年被集體冠上「醜人」的稱謂一般。在此先釐清身體所涉及的自然與文化的悖論，身體既是有機系統，無庸置疑是屬於自然的一部份，但這種自然亦是透過生物學或生理學知識對人類行為經驗加以組織化、系統化的分類體系，此時的自然已經賦有文化的特徵，一如阿裡葉所說，儘管身體因自然成長而經歷成熟的過程，然「青年」、「嬰兒」、「小孩」或「榮休公民」等概念卻是西方社會組織歷史變化的文化產物（Ariès 1962）。換言之，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身體的自然性無疑會被文明化，並由此產生身體的分類系統，如此觀之，「醜人」或「美人」的稱謂皆是特定社會（城市）針對某種年齡層（十二歲至十六歲的青少年/接受整型手術後的青少年）之身體外在表徵所做的分類系統與符碼，城市為青少年所舉辦儀式中，其行徑與過程不僅以個體的身體外在表徵作為區分，更重要的是儀式直接作用於身體上，針對個別身體進行改造，在此身體是儀式主要關注對象。

醜人是相對於美人的分類標準，對應美人鎮的新美人，居住在醜人鎮的醜人的確擺盪在兩個世界中，即在這閾界空間中交雜著不同的認知標準——為厭惡自身天生的容貌，並鎮日期待整型後成為美人的真正自己；一為堅持保有自身的容貌，並認為拒絕整型的最終意義是青少年突破社會規範的叛逆精神，這兩者認知系統彼此是相互衝突拉扯的，在其中，成人理性秩序與社會控制的力量和青少年身體叛逆的愉悅交互運作著，兩者語言的相互衝突——科技的、人為的、正確的、高尚的、華麗的、拯救的、公平的，這是隱藏在威權政治和學校意識形態機器勢力下語言，以及叛逆的、自然的、解放的、禁忌的、對秩序存疑的外界語言——造成了閾界空間的異界色彩，且後者認知系統的介入，形成一種角力，不斷的嘗試如何突破、顛破正典，並在其中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抗衡力量，無形的鬆動了前者話語機制的霸權地位，同時也在醜人鎮的話語場域中，形成了在正統視野之外的第二個世界以及第二種思維觀點。如此觀之，在對照即將被賦予正式身分或社

會階級的美人系統認知下，醜人身份與相關認知或許是卑微不堪的，若從積極保有自身面目的行為與認知觀之，不再是牽涉美醜判斷的價值觀，而是具備鬆動另一種語言系統的功能，將青少年的身體從強勢的真理與規則秩序中解放出來，它標誌著對所有身份劃分、社會類屬、所有的特權、規範與禁忌的存疑。

就「成為美人」部分細部論之，在認定「醜」是四年過後即將拋卻的前題下，在學校教育、造型軟體遊戲的潛在課程等種種機制的操作下，擁有自身面目的醜人不斷地幻想自身未來變成美人的樣貌，此時醜人的認知框架建立在因外在身體差異而導致的正常（美）/反常（醜）的二元框架中，於此醜人對自身面目產生排斥與不認同，醜人對自身面孔的厭惡甚而導致情緒失控的局面，可從塔莉在得知特勤局暫緩整型手術後得到驗證，此部分於第四章詳述之。另外，將身體構成醜人、美人二元區分並非僅只是整型手術實踐後的結果如此簡單，更須深入探討背後操弄整型手術的「美/醜論」，美醜的分類是城市為了讓青少年的身體接受醫學實踐而採取的一種思維態度，與其將美醜視為一種知識體系，不如說將此種二分法視為一種分類體系，更甚者，它是由語言符碼所建構的話語機制，而美醜的概念更是透過身體的具現加以特徵化。塔莉居住的城鎮不僅透過學校教育傳遞醜人有關美的概念，並且利用異己性的排除方式，相對的醜化「醜人」原本的面目與長相，讓他們產生厭惡自己的感覺。在文本中，醜的概念不僅延伸成名詞如「醜人」，產生集體性的指涉（signified）作用，指的是十二歲到十六歲前未經整型手術的青少年男女，而「醜人」也繼續分化產生個別性的指涉，例如眯眯眼、瘦皮猴、胖子，是相對於標準美人而產生名詞，透過局部的特徵一小眼睛、過瘦或過胖的身體，凸顯或放大醜人的特質。另外「醜」也延伸成醜人個體醜化自我的動態過程，主要是在一種相對比較的關係中產生的區隔與差異對比，以雪宜和塔莉的對話為例：

「我是認真的，塔莉。」當她們進到水裡之後，雪宜又再重複了一次：「妳的鼻子一點都不醜。而且我也很喜歡妳的眼睛。」

「我的眼睛？現在妳真的瘋了，我的兩個眼睛太靠近了。」

「誰說的？」

「生物學課本說的。」

雪宜抓了一把水潑向她說：「妳不會真的相信那些鬼話吧？那只是其中一個觀點，難道每個人都要被設定去同意這個觀點嗎？」……

「好啦！雪宜，不過我們身為醜人也是事實，妳光是自己期盼著或是一直告訴妳是美人，也不無法改變這個事實啊！所以他們才會發明整型手術嘛！」（《醜人兒》88～89，黑體字為研究者加註）

透過此分類系統不僅將既有的現象分類為一種特定的範疇，甚而與個體或群體建立一種外部且強制性的關係，且美醜知識透過城市其他意識形態機構向身體延伸，迫使塔莉等城市人將其視為確定的模式，並以此服膺其行為規範。

第三節 一輩子的驚人美貌

塔利點點頭，每個城市都努力要各自獨立，可是美人委員會卻是全球性的組織，他們必須確保所有的美人都差不多美麗，假如有的城市比其他城市的人更美的話，就會毀了原本整型的意義。

就跟大部分的醜人一樣，塔莉也曾夢想將來有一天可以進入這個委員會，參與決定下一代應有什麼樣的外貌，當然在學校的時候，他們常常把這件事情說得很無趣，他們看著不同的臉孔時，要做出所有的統計圖和平均值，還要測量人的瞳孔。（《醜人兒》263）

如第一章所言，對美麗的解讀與標準設定是歷史演進的產物，在此必須區分清楚的是美麗的概念及其內容，前者可視為認知的框架，換言之，對美感的抽象認知是人類出生進入象徵界後，透過二元相對的差異語言系統所建立的表述/表徵符碼；後者則是不同社會文化環境依循此表徵符碼所建構的內涵，例如一百年前的歐洲人認為蒼白的膚色是美麗的，因為它象徵財富，代表你/妳無需到戶外工作，然而現在的歐洲人卻將麥棕色的膚色視為健康美麗的表徵，因為代表你/妳有多餘的財富與休閒時間到海灘做日光浴，由此可見，不同的空間、時間等背景對美的認知也產生差異，然美麗內容的多樣性與轉變，除了暗示著當代人們的文化價值觀外，同時也牽涉到誰擁有權力決定美麗的內容。在文本中決定美醜的判斷標準並非有權勢、富有的少數資產階級，也並非是藉由消費流行文化的不斷複製，而是透過由各城市間專業整型醫生團體組成的一個全球性組織「整型標準委員會」所共同決定，組織成立的目的是為了建立全球化、公平性的身體論述「所有的城市必須分享整型美容的資料，……他們必須確保所有的美人都差不多美麗，假如有的城市比其他城市的人更美的話，就會毀了原本整型的意義」（《醜人兒》263）。更重要的是對過去錯誤、野蠻歷史的修正「那個時候的人還會為了不同的膚色自相殘殺呢！」（《醜人兒》50）。由此可見，整型技術的資訊整合與互通有無促使集體性的整型達到最大的效應，科技的應用在此被視為表現一種進步與解放的力量，更甚者，是對人類因外在身體差異而導致的殘暴行為的制止，對社會秩序的安穩需求也為整型手術的積極性與正當性背書。因此整形手術便成為一種達到優托邦的重要醫療行為，其正當性的信念、執行過程所訴諸的方式和其形構的價值體系，促使其形成支配人類身體的重要醫療行為。

美的標準擇定基本上是根據生物科學的基因遺傳知識，不管是實際的整型手術—「他們看著不同的臉孔時，要做出所有的統計圖和平均值，還要測量人的瞳孔」（《醜人兒》263），或是醜人們平日為了殺時間戲耍的造型軟體遊戲—「醜人的臉在比例上都不是很對稱，兩邊的臉看起來不完全一樣，所以造型軟體首先做的就是把它其中半邊的臉再複製出另一半」（《醜人兒》48），皆反應出城市將對稱視為人體美的主要原則，然後再進一步透過科技的助力，消除所有青少年男女十六歲之前在皮膚或身體上所造成的瑕疵、疤痕、肥胖和眼睛與牙齒等不健全的問題。

題。城市的整型醫生將人類身體的對稱美感具現在接受整型手術後的美人身上，對稱在文本世界中被視為人類造物的極致與完美的正典，翻閱西洋藝術史，「對稱」同樣被古典希臘藝術視為最高的審美原則。例如在西元四世紀前，波里克利特斯（Polyclitus）完成了一尊身體體現所有與局部之間正確比例規則的雕像，即雕像身體的所有部份依照幾何上的比例彼此關照，因此在藝術史上享有正典之稱。西方藝術史談論對稱概念的成果豐碩，例如在維特魯維斯的《建築學》提到如是的對稱看法「對稱是作品中本身諸部份之間的適當的協調，以及諸部份與整體之間尺寸對應」（轉引自艾柯 75），在《希坡克拉底斯與柏拉圖》一書中，作者蓋侖引述克里西波斯的一段話「美不在於個別元素，而部份之間的和諧比例，在於一隻手指和其他手指的比例，所有手指和整隻手的比例，手與腕的比例，腕與前臂的比例，前臂與整隻股臂的比例，所有部份與其他部分的比例……」（轉引自艾柯 75）。從上述三個例子中可以見得：身體均衡勻稱的視覺感官認知來自於身體各部位之間的比例合諧，西洋藝術史上對比例之美的談論，也連帶的促使算數與幾何原理學說處於居高不下的主導地位。反觀中文世界透過對應自然之景的譬喻文字或白描手法再現女性之美時，西方的美學傳統卻是透過測量、尺寸、比例等量化女性的身體，以客觀的數值抽象地探討女性與美的關連性。以此脈絡觀之，文本中整型手術將美貌的基準建立在量化的身體概念也不難理解，換言之，計算與統計的平均數值等林林總總的量化技術，最終是為精確地達到均衡、對稱的身體樣式。

實則，數字化的量化技術只是整型手術的一小部份，身體做為醫療體系內部的干涉客體，還包括其他相關醫療技術的應用，在文本中對於整型手術的描述較為片面⁵²，手術執行過程的細節不僅對閱讀對象而言，甚至對城市大多數的住民而言（尤其是青少年）來說是也是被遮蔽的。面對美醜引發的紛爭與不平等待遇，對於居處在閹界階段的青少年男女，城市當局採取全面性實施後天科技干預的整型手術，在此科技權威在大多數的城市人心中等同於真理，然弔詭的是，城市欲借科技消除身體差異所帶來的不公平，反倒在城鎮的空間設置上，透過科技的防衛性機制再現身體的差異，而人類身體與空間產生的關係，也明顯的影響了人們彼此的互動方式，因此在區隔美醜的空間思維中，不僅彰顯個體因外在差異而凸顯的疏離感，醜人更因此對自身原來面目產生污名化與鄙棄的負面情緒，從而加深美醜的對比性。此外，整型手術不僅由外對身體展現出科技改造、再創生與自然生物種造化相抗衡或超越它的強大力量，對內科技更是展現了對青少年個體在其思維或外在行動的控制力量，何以言之？看似中性、客觀的科學技術在與城市（一種社會關係網絡的構成）複雜的互動過程中，以整型手術為首的科技形構成一種生活方式（form of life），此生活方式可視為再現社會公平與和諧等價值觀

⁵² 大部分的描述集中在《醜人兒》中，例如塔莉在接受手術的前夕，以醫療接受者的位置，對於以整型手術過程的描述見中文譯本 104 頁；另外是昔日身為城市整型手術醫生阿茲與馬蒂對於整型手術背後陰謀論的假設與批判。

念的表徵，更是透過無數個體的身體實踐，不斷地再製、固著此生活方式，甚而是其背後的權力運作模式，因此整型手術並非僅只是單純的科技醫療行為，需將其置於複雜叢生的社會脈絡中，以此探討時背後形諸的概念。從醜人變成新美人、中年美人到老年美人，接受過整型手術後的美人才是為城市所承認接受的真實主體，此種思維更讓典型的都市人無從思考另類生活方式的可能，例如一開始時塔莉無法理解雪宜為何堅持保有自己本來面目的訴求；或是將除了「變成美人、接受城市保護」之外的其他想法視為避之不及的毒蛇猛獸，例如塔莉父母對雪宜拒絕接收手術並逃離城市等種種行為的批評與不解。鑲嵌在城市脈絡中的科技與政治權力密切結合，也促使科技轉變成具有政治性，透過科技的運作，權力於焉產生，甚而與連帶而生的生活方式不分彼此的相互纏繞。

在連敦·溫納(Langdon Winner)的〈技術物有政治性嗎？〉(Do Artifacts Have Politics?)開宗明義提到「我們應高度關注物質文化，尤其是具有多樣性政治性質的技術事物，如何使某種特定形式的權力運作與威權體制得以成立」(Winner, 125)。溫納的論述基礎建立在技術政治理論(a theory of technological politics)。不像自以為是的技術決定論—主張技術具有強大的內在動力，得以主導社會的發展；或是忽略技術層面的社會決定論—認為科技本身無關乎一切，非善非惡，端看其社會政治的環境與經濟體系的運作如何形塑其背後的发展面貌，而是認為「某些技術本身即是政治現象」。進而溫納分別從兩個面相闡釋技術的政治性特質，並舉出相關案例作為例證：

(一)技術設施或技術系統的發明、設計或配置上的某些特性，將促使某種社會秩序的成形，其最終目的為鞏固少數特權階級或強化既得利益者的權力模式，並非僅只是單純的考量技術專業的使用因素（例提高工作效率等），其所建構的社會秩序的框架將規範人們的生活行為與方式。以活躍於1920至1970年代的公共建築師摩西斯(Robert Moese)為紐約規劃的長島低架橋的設置為例，低架橋的高度設計考量必非依據環境因素或其他實際考量，而是為了避免搭乘公共巴士的有色人種和低收入戶者，進入公園大道或瓊霓絲海灘進行休閒活動，反映出摩西斯身為白人中產階級的優越感和種族、階級的歧視與偏見。從中我們可以發現低架橋的配置是為了鞏固搭乘、駕駛汽車的中產階級對紐約長島地區的使用優勢與優先權(Winner 128-138)。

(二)第二個觀點較為強硬，溫納認為採用某種技術系統必然帶來某種特別政治意涵下的社會關係或制度性權威，即選擇這些技術也就等於選擇某種特定形式的生活樣態，暗示某些科技類型具有不可駕馭性。平心而論，一種技術並非是絕對必要的，然當社會公眾論述決定採取某種技術系統時，就必須創造或調整當前的社會生活型態，使得技術系統的運作環境成為可能，以便配合技術的運作模式。Winner舉出原子彈的極端例子，認為其內在社會系統必須是威權的「其致命的

特性就需要一個中央集權式且階級森嚴的指揮系統，它能排除任何不受控制的影響」，此觀點在錢德勒《看得見的手》（*The Visible Hand*）一書中也得到呼應，錢德勒認為在 19 至 20 世紀日常生活之生產、運輸、通訊等複雜大型的系統勢必帶動中央集權、階層化管理的人群組織與關係結構，管理者在執行系統運作過程中，也將延伸管理、監督、調和、決策等中上層等行政部門與人力與之配合。恩格斯於 1872 年發表的〈論威權〉（“On Authority”）也是持相同的看法，恩格斯以當時代棉花紡織廠、鐵路和海航等三種社會系統，論證現代科技工業的立基在威權主義上，在此分秒必爭的時間量化成生產單位的生產量與資本家所得利益，爲了發揮物質系統的經濟潛力，爲了讓工作流程順暢協調，不僅是第一線的生產者，就連消費者也必須遵守系統的運作紀律（Winner 139-145）。

如此這般，當研究者以此認知概念檢視整型手術與城市特有的社會環境之互動時，顯而易見，整型手術與特定的特權模式或政治陰謀相連結，甚至相對應地建立了城市的美人文化，到底此種生活樣態是受制於整型手術的內在科技本質所投射出的社會反應？亦或是成人爲了達到控制青少年身體目的而不擇手段強加於科技上的模式？亦或是兩者相互作用的結果？且對整型手術而言，其延伸的社會秩序與規範是必然的因果關係嗎？研究者將從文本段落的對話中找出例證，並加以論述。當不得不扮演滲透者身份的塔莉成功地潛入煙城，並獲得大衛的信任與愛慕後，大衛便決定將塔莉引介給他的父母阿茲與瑪蒂認識，大衛的父母皆是城市的流亡者，另一個重要的身份是曾經擔任過（塔莉居住的）城市的整型手術醫生，在談論中阿茲提到過去從事相關麻醉研究時，兩人偶然發現了整型手術背後的真相：

「我發現手術時使用的麻醉劑會產生一些併發症，腦部會有一些微小的器官損害，即使用最好的機器也很難看的出來。」（阿茲）……塔莉決定冒險問一個愚蠢的問題：「什麼是『器官損害』？」

「基本上，就是一堆細胞出現異常。」阿茲解釋：「像一個傷口，或是癌細胞，就是某種不該出現在那裡的東西。」……

瑪蒂不理會她的兒子：「當阿茲把這個結果拿給我看時，我開始做了一些調查。……從全世界每人身上掃描得到的原始資料，這些腦部傷害到處都有。……最重要的是，幾乎全世界的每一個人都有這種腦部傷害，如果這些腦部傷害會危害健康的話，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口都會出現一些症狀。」

「可是這些不是很正常嗎？」塔莉問道。

「不，只有手術後的一美人，我是說，只有他們才會有這種問題。」阿茲說道：「沒有一個醜人有這個問題，這些絕對是手術引起的傷害。」……

「妳知道鐵鏽人是如何生活的，對吧？戰爭、犯罪和這類的事情？」

「大當然知道，他們太瘋狂，差點把世界給毀了。」（塔莉）……

大衛嚴肅地苦笑一下：「也許事情並沒有這麼複雜，也許戰爭和其

他的事情都結束了，因為再也沒有糾紛，沒有爭論，沒有人要求改變，只有一群整天嘻嘻的美人，除此之外，只剩下少數幾個負責處理事務的人而已。」（《醜人兒》 263-268）

在社會病理的疾病隱喻中，未受約束的欲求將產生未受約束的社會，因此在文本中，（青少年的）身體成為社會控制的策略所在。姑且不論麻醉藥劑引發的症狀與風險，最後的結論是，這項醫療行徑該避免的醫療缺失或失誤，卻演變成整型手術執行的核心目的。在外觀上，身體因此項醫療行為在其表面強化其吸引力，包括令人渴望的健康、年輕、美麗等理想化形象，肉體表面不僅經由整型手術被高度頌揚與崇拜，從而帶來了視覺感官震撼的景觀，更甚者，身體外貌的管束經由均衡美的標準，達到具有科學性和理性化的地位，從而使身體秩序達到一種和諧的安排，不僅如此，整型手術通過對大腦的破壞，以尋求實現對內在身體—激情的根源—的控制，「大家變得容易管理」。然弔詭的是，整型手術引起的醫療認知—腦部器官損害/腦部器官正常、美/醜、疾病/健康、正常/反常—卻十分矛盾，從阿茲對腦部傷害的解釋中，把細菌（微生物）視為造成大腦損害的疾病起因，更技術性的來說，整型手術導致某種類型不明的功能缺陷，這樣的解釋框架使得城市的醫療知識與專業背景，建立在無涉及價值判斷的客觀科學體系中。就此邏輯，對恢復有機體內部秩序、以健康為導向的醫療目標而言，大腦的傷害是為了達到控制身體目的而刻意加諸其上的醫療手段，若就正確/完整無誤的整型手術步驟觀之，這種刻意性與必然性因本身所欲達到的目的論，轉而變成手術的內在本質，從而突顯了整型手術對身體的合法性制約，也構成對「健康身體」和「疾病」概念的重新定位。換言之，疾病並非如同一如想像中的屬於中性術語，並非反應有機體生物狀態的事實，而是一種符號系統，透過各種社會實踐進行複雜的詮釋與解讀，即透過非理性或非道德的習慣（如戰爭、犯罪等）決定疾病內涵的描述。此時，完美的身體或正常的的身體建立在內部身體構造的損害/缺陷和不健康的基礎上，不僅驗證了個體的身體管理與社會的身體管理的密切關係，也暗示著身體生物意義上的正常所依據的觀念是社會秩序的正常與容易管理。

誠然，此種醫療結果為優托邦的實現帶來方便之門，官方管理階層與城市住民間下對上的馴服形成一種共謀關係，此種醫療特質雖不必然帶來優托邦美好與至善的理想，但它對接受整型手術的對象刻意營造出類似溫馴綿羊特質和對命令的絕對服從與接受，卻是獨裁政治的溫床，從而揭露了優托邦的本質。且在文本中，獨裁政策包裹著優托邦的糖衣引導城市的科技策略，且這三者—整型醫療、獨裁政治、優托邦理想—形成穩固的鐵三角關係，一旦青少年接受整型手術，也將被召喚至這層政治結構中，而科技與優托邦理念所依據的身體原則，可以明顯的感受到成人的宰制威權在烏托邦的實踐場域中，從而政治化青少年的身體，身體是優托邦理想最強制執行的地方，城市的規範精確地體現在身體上，而強制性也使得優托邦的種種美好變質，這種虛偽以為誰好為搪塞藉口。

第四節 特別的我們？

對理性的社會秩序而言，任何戴奧尼索斯式的脫序行為都是潛在的威脅，也總是招致道德上、法律上、政治上等教條與規訓的壓制，某一團體的脫序徵兆時常嚇壞把持秩序的團體階層，因為脫序會提醒著人們，社會控制是多麼的脆弱與不堪一擊。對安分守己的群眾而言，社會秩序的鬆動無疑的引起了不必要的恐慌，然對挑戰社會規範的叛逆份子而言，社會控制的實質是多麼的醜陋與令人憎惡，即使是片刻，脫序也向人們展現了追尋自由的勇氣。在文本中，對社會秩序的干擾以青少年個體的身體為隱喻，所以青少年，尤其是醜人，奠基在暴力、紛爭收場的身體享樂與縱慾，被視為對社會秩序的威脅。青少年個體身體的愉悅構成了對整體身體政治的威脅，當享樂過渡時，也就是說，超越了社會規範所擬定的合理與自然標準時，這種威脅極其引發的後作力就特別驚人。

從本章的前三節中，研究者主要的探究點是城市如何透過數種外部機制的聯合運作，強化對青少年身體的內部制約，包括：學校教育、十六歲的文化儀式和整型手術，其目的在於：揭露優托邦式的意識形態是一種系統性的扭曲文本，透過一些秘而不宣的控制策略，馴化青少年促使其相信羅織在意識形態中的話語機制是唯真的真理，並視之為理所當然，藉此讓青少年內在化、主觀化，進而控制他們的身體，促使某些權力團體達到其理想中的優托邦理念。以整型手術為例，其可謂是通過醫療手段而採取的管理身體的主要方式，這也是文明強加於自然的一種淨化作為，身體是慾望的來源，對個體施行整型手術明者，意味著克制身體所帶來的社會騷動與秩序破壞。文本中青少年/成人對於整型手術的接受度也出現兩種自願/非自願的極端現象，且此兩者態度呈現的比例懸殊，此種差異可透過接受手術前/後、自願/不自願、內部/外度等幾個向度表徵，而所謂的自願與不自願的態度差異，主要是針對意識形態接收的深淺度而言，自願者或受學校機制而信服這套理論（佔大多數，以青少年為主），或擁有逃脫城市控制命運的機會，但然選擇主動接受手術（1人，塔莉）；非自願者為受強制性國家機器的脅迫，從而被迫接受手術（數人，包括阿茲和被特勤局逮捕的煙城伙伴），兩者皆反應出整型手術機制的直接強迫性與間接馴化性：

	接受手術前	接受手術後	
		自願	非自願
內部組織	大腦正常	改變大腦設定	改變大腦設定
外部表徵	保有自己的臉面、叛逆搞怪	鎮日玩樂的美人	鎮日玩樂的美人 死亡

然不論是以什麼態度接受整型手術，在整型手術欲求的城市優托邦政策背後，是讓令人詬病的對「人類生物性的拒斥」，姑且不論烏托邦設計者何以將人類天性

原罪歸咎於生物天性的邏輯盲點，畢竟在這看似煞有其事的解釋中，似乎將人性導向本惡的爭辯中，人類因為無法自覺理性化自身的處境，因此需要透過更大的機制統一管理，這樣的因果推論卻大大的忽略了不同歷史社會環境對個體心性的影響。文本訴諸的「違反人性」主題也同樣反映在一般常見的反烏托邦文學中。在想像的烏托邦社會中，人類自然天性中最深層的欲求與渴望，都遭到烏托邦社設計者改造或壓抑，堅決的向人類天性說「不」並不必然是不好的，尤其是針對暴力、極端的自私等負面的人性傾向，是有充分的理由拒絕這種人類生物性的傾向，然弔詭的是，當文明社會對人類自然天性壓抑過度時，那麼結果將轉變成令人不寒而慄的惡托邦情景：社會打著護航文明的標誌，實際上卻冷酷無情的撲殺我們的自然天性，強迫人類「違反生物性」。從城市（終勤局）對管制人類所堅持的政治正確之固執立場觀之，整型手術可視為將城市住民置於與其人性生物需求矛盾立場的具現策略，從外觀上觀之，青少年的整型顏面是受到全球性的美人委員會所決策，主要服膺對稱式的人類美感，代價是在外觀上消除了基因遺傳的特徵，連帶的醜人青少年在失去與父母家族對應的臉孔後，也理所當然的在意識形態的浸淫下，將不符核對稱標準的臉部特徵視為醜的具現，掩飾了有機生物體世代遺傳特徵的事實，這也是為什麼當塔莉在看見大衛和他父親阿茲同樣都擁有大鼻子時大吃一驚的原因——

她驚愕地看著他，呼吸停住了，一時之間說不出半句話來，大衛和他的父親看起來……好像啊！

「抱歉，你們……你們看起來簡直一模一樣！」

「很多人都這麼說。」他的父親說道：「你們這些城市來的小孩，總是認為這件事情很驚人，不過你知道基因遺傳對不對？」

「當然，我對基因遺傳的事情非常清楚，我知道有一對醜人姊妹看起來幾乎一模一樣，可是父母和小孩也這樣？那感覺真的很奇怪。」

大衛的母親露出一抹嚴肅的神情，……：「我們從父母身上遺傳的相貌，正是讓大家與眾不同的特色，大鼻子、薄嘴唇、高聳的額頭——整型手術把這些都改掉了。」

「這些人偏愛趨向大眾化的平庸。」大衛的父親說道。（《醜人兒》 257-8）

由此可見，即便生物遺傳知識是學校教育的主流課程，塔莉的態度反應出城市青少年對於遺傳知識並非全盤掌握，遺傳基因的意義建立在世代間為了適應環境的演化，並透過未來的世代傳遞生命延續的可能性，換言之，基因遺傳是一種時間性的思維，而整形手術卻在生物基礎上刪除了基因世代遺傳的現象，而更為重要的是，整型手術不僅從身體外觀上，掌握青少年個體的外在相貌，藉此消除基因遺傳的生物規則，更甚者，整型手術對內更改大腦設定進而控制青少年的思維模式，這兩者的身體控管不僅暗示著成人對青少年個體自由意志的規範，更意味著個體的特殊性也因此消容在大眾化的平庸中，因此變成美人不僅是不會思考、整

天只知尋歡作樂的芭比娃娃，美人體現了普遍為大家接受的人類共通臉部樣本，這種普遍性與青少年文化追求個人酷炫風格的精神相違背（作者認知），這樣的矛盾使得塔莉等一幫青少年即便是接受手術美人後，也亟欲在優托邦的控制中尋找表現自己風格特色的行為，例如變成美人的塔莉與雪宜在身上的刺青圖案、薩納用墨水將頭髮染成委員會禁止的黑色，以及塔莉和薩特策劃一連串的犯罪社團活動等，目的在於有別於其他美人社群創造自身的差異，而這差異的意涵在於辨識個人的主體性。



第肆章 觀看身體

承續第三章，第四章持續關注青少年的身體樣貌，主要的著重點是針對青少年身體的外在表徵進行談論，在第三章內文部分，研究者從頭說起城市（由成人主宰的國家機制）如何藉由操弄烏托邦式的「普遍意識」論述，改造青少年的身體內部機制，進而完成其烏托邦式的理想世界念。在第四章，研究者將進一步從青少年角色位置，談論個體受到「普遍意識」召喚後的主體行動，如何體現在身體實踐中，並從視覺觀看活動中探討其所呈現的身體樣態，且這些身體樣態如何透過科技建構身體的差異與不平等。誠如第三章所示，青少年的身體本身並不具任何社會意義，而是透過醫療、學校、儀式等機制，個人身體轉化為集體性的身體政治，受之操縱、利用和控制，同時社會控制機制的發展樣貌也伴隨著控制身體意義與行為論述活動而有所變異。機制做為國家意識型態的載體，使得其所產製而出的話語論述或意識型態文本，透過指涉的身體得以被賦予形體，而鑲嵌在機制與話語中的身體，透過進入文本並之同化的過程，被轉換成對應這些文本的符指，此種現象尤以在日常生活中最為明顯。

在文本中，生物基因學知識、整型軟體遊戲、整型手術、遙望並想像新美人鎮的夜生活，或者夥同醜人夜探新美人鎮等，都是日常生活中促使青少年身體文本化和話語形體化的方式。城市標榜著經科技干預後美麗健康的身體才是為大眾接受的青少年身體，因此從整型過與未整型的身體關係中，延伸出許多同義的關係詞組，包括：美麗與醜陋的身體關係，健康與不健康的的身體關係，乾淨與噁心的身體關係，強健與脆弱的身體關係等，皆反映出正常與偏差的社會規範關係，這種規範關係同時也企圖自然化身體內的規範，因此美麗的意義是政治性的，而非生物性的或合乎美學的，健康的意義是社會性而非生物性的，何以言之？美麗、健康的身體代表著秩序的符碼，不管是政治的、社會的、生物學的、歷史的和道德的，相對的，醜陋的身體象徵著沒有紀律，它將威脅、破壞秩序，因此整型過後的身體合乎魅力、無暇的原則，不會對社會控制或紀律的維持造成衝擊，這種種都是允許烏/優托邦社會權力運作的論述，然這些論述規範也因其自然地像空氣般滲透進日常生活，不僅提高其可信度，同時亦能有效的執行意識型態操縱工作，面對這樣顯而易見的論述，我們無可避免的喊出：「那是顯而易見的！那是正確的！那是真實的！」（阿圖塞 170）。

一個論述的可信度首先在於使得信仰者照著它的話去做。它創造實踐者。使民眾信仰就是使民眾行動，但透過一種奇特的循環性，使民眾行動——書寫或是操練身體——就是使民眾信仰。因為規則已經與身體一起應用，以及應用在身體之上，「體現」在身體的動作之中，它能自我證明，使民眾相信它說的是「真實的」語言。它說：「這套說法

是因為真實才為你所用」，藉此使用自己看來可信。民眾相信他們假設為真。但一個論述之所以有「真實」可言，是因為信仰使得論述有一個力行規則的身體。規則需要先行累積肉體資本，才能使自己被相信以及被實踐。（瑟鐸 149；轉引自約翰·菲斯克 108）

在瑟鐸（De Certeau）的概念中，身體的文本化與話語論述的形體化是相互呼應的，更甚者，前者是後者的基礎，就研究者的理解，身體的文本化即是指民眾將某一論述視為真實，並信仰它，這樣的認知同時使信仰者在其身體活動上展演其對此信仰的篤信與真誠，此種結果帶來了所謂的論述形體化，即瑟鐸所說的「把你的身體給我，我就給你意義，我將使你成為一個名稱及我的論述中的一個字」（瑟鐸 149；引述自約翰·菲斯克 109）。身體藉由對規則的實踐被銘刻上意義，同時也因為進入規則文本中而被賦予意義（文本化）。進一步申論，在我們「身」處的社會規範和日常生活的實踐中，大量的且錯綜複雜的規則論述彼此糾結叢生著，不僅制約我們的行為，也劃分出所謂的社會類屬，構築了我們在世界上的定位與分類系統，而透過分類系統中的對立與差異符碼，也形塑了身體的面貌。

特納曾經提到這樣的概念「具有特定特徵和特點之社會位置的身體，對於人們的日常生活認識和認同是即為關鍵的，對於人的質詢就是典型地對於特定身體的質詢」（104）。誠然，身體做為人類主體行動與他人互動之物質基礎，如何以各種方法在社會中被「自然地」塑造？研究者將以視覺為切入點，探討青少年如何質詢彼此的身體樣態，且此質詢又透露出什麼認知與識別？將以女主角塔莉為例，整型手術儀式通過塔莉的身體具現（embodilize）不同階段的身體奇觀，從醜人、美人到異人，在其不同階段的身體差異透過與他人/自我的互動過程中，研究者將關注優托邦意識如何藉由科技形塑的身體政治，在個別的身體外在表徵上銘刻其話語機制，且這話語機制如何透過個體的視覺活動和伴隨的身體實踐重新強化或者產生鬆動？主要焦點將至於視覺活動產生的觀感，下者為本章節研究者要處理的問題，並依次陳述在各小節中：

- （一）長久以來，醜人塔莉一直是羨慕美人、以變成美人為目標，首先研究者從意識型態質詢/召喚主體的建構過程中，探討塔莉如何形塑此認知概念？又當塔莉面對特勤局的威脅時，當她看到投射在鏡中的醜陋自己，何以會當場情緒崩潰，答應特勤局的條件？
- （二）對照美人，醜人的塔莉如何看待身為醜人的自己或其他醜人？又整型手術後變成美人的塔莉，又是如何看待昔日煙城的醜人伙伴？當變成特務員的塔莉，在注視美人薩納或是碰觸其身體時，當下產生的感覺與反應為何？研究者將從塔莉不同外貌的情境中，試圖歸納文本所反映的的身體認知。
- （三）當變成美人的塔莉面對過去醜人塔莉所書寫的信件時，其對應的身體與自我概念產生的剝離又具何種意義？

第一節 我（應該）是美人

窗外看得見新美人鎮，許多派對燈塔的燈光都已經亮起來了，在遊樂園裡，那些燃燒火炬向蛇一般的游移在忽隱忽現的小路上，那些遊樂園裡升起了幾個熱氣球，……熱氣球上乘客對著其他的熱氣球和路過的飛船噴放安全煙火，笑聲和音樂像岩石般越過水面，正好朝這個方向飛旋而來，岩石的銳角強烈地刺激著塔莉的神經。（《醜人兒》7）

對城市的醜人們而言，變成美人是城市對青少年的認證符號（類似身份證的功能）。由於城市規定青少年必須滿十六歲才能接受手術，同輩彼此相識的醜人夥伴也因為彼此些微的年齡差距而先後變成美人，變成美人後的青少年卻與過去的醜人夥伴主動斷絕聯絡，使得一些大膽的醜人藉由夜探美人城的冒險活動，或是一次又一次有意無意間向窗外注視著對岸美人城中，藉此平緩友好同伴離去後產生的孤單、遺棄感與「漫長」等待的煎熬。對這類醜人行為的理解，除了從情緒安撫因素理解外，若將其置於優托邦意識形態與身體控制的脈絡觀之，不僅對文本書寫產生另一種解讀風景，亦可銜接本論文第三章與第四章的轉折，進而理解優托邦意識如何與控制身體達到全面的妥協，或者是被控制的身體如何逡巡烏托邦意識下，伺機尋找翻轉的可能機會。別於第三章從握有實權的成人位置，探討優托邦意識如何透過外在機制的佈局形構其話語機制，本節轉而從青少年的位置（主要以塔莉及其友伴之間的互動為例）談論，所要處理的問題是探討青少年年個體如何將「變成美人」視為普遍同意的召喚質詢，另外研究者發現，此種「變成美人」普遍同意論述也反映出拉岡式的鏡像概念，在拉岡鏡像階段中，理想完美卻誤識的影像暗示著自我概念建構的幻象，此種虛妄從中呼應了意識形態與個體的關係。

在第四章前文中，研究者引述瑟鐸的概念做為鋪陳，若同時對照阿圖塞的論述，可見兩人之異曲同工之妙，按照阿圖塞的邏輯，身體的文本化和規則的形體化也包含了意識型態與主體認同之間的複雜問題，而在意識型態的物質基礎中，同樣的，個體身體也成為轉換個體為主體的主要物質存在關鍵。在〈意識型態與意識型態國家機器〉文論的後半部，阿圖塞著重梳理意識形態與主體的建構關係，在意識型態有其物質存在的基礎前提下，阿圖塞確認兩個主要的命題：一為如果不是藉助並且在某種意識型態中，就不存在實踐；二者為如果不是藉助主體，並且為具體的主體，就不存在意識型態。換言之，「只有通過主體的實踐才能使意識形態的歸指成為可能」。意識形態的實踐不僅透過國家機器、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作用，遵行的特定儀式、甚至是日常生活中無意識的主體行動或慣例，當然這些象徵性的意識型態機器的外在性不僅是外在的，同時也是將意識型態內在化。在此須區別「個體」（individual）和「主體」（subject）兩個不同的概念與範疇，因為意識形態是無所不在的，所以沒有純然的個體觀念，個體只要一

進入社會化的語言系統便具有主體性了，阿圖塞提出了個體成為主體的三種方式：（一）個體在初生之際甚至出生前，便進入主體狀態，以家庭意識型態為例，初生的嬰孩在存在狀態之際便在此構形中早已被意義化了；（二）我們永遠-已經隸屬於意識型態中，在此意識型態中，我們將此意識型態視為唯一真理或是顯而易見；（三）意識型態將個體做為主體/屬民召喚或質詢。

到底阿圖塞的意指為何？意識形態與主體之間的聯繫性何在？研究者進一步從阿圖塞在其文論後詮釋基督教的意識形態例證試論之，他提到了一個有趣的觀念，藉此討論基督宗教性的構成「我將要使用一個修辭格，並讓它說話，也就是，虛構一個話語，它不僅收集了基督教的新舊約全書、神學理論、佈道，還包括儀式、禮儀和典禮」（174）。由印刷文字和動作所構成巨大的文本，透過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外在性，將其形構成一種具現的表徵，個體得以藉由被質詢過程，把從而在文本上所聞、所見、所聽、所讀、所寫的東西（對應英文的 something 較貼和文意），當做在清楚不過的東西接受，進而將意識形態內在化為意義或真理的體驗。就是此種得以形構主體意識、顯而易見的、不言而喻的真理網絡，也就是在這意義生成的符號空間或是話語策略網絡中，「這些不言自明的事實從不為自己說話，卻是被驅使著說話」（齊澤克 15），意識形態反將自身隱藏其後而操弄之。且在這真理網絡中，也進行著無數次複雜的詢問/辨識鏡像式的主體/屬民建構活動，首先阿圖塞預設了「一個唯一的、核心的他者主體（Other Subject）的存在」（175），具有意識形態的「能指」功能，對應在基督教便是上帝，作為操作質詢過程的主體存在對象，奉上帝之名，為上帝所質詢的無數個體（例摩西、彼得等）將透過後者的辨識（「是的！我是！」）劃歸成為上帝的屬民，絕對主體與屬民的關係也建立在主體/被對話者、質詢者/被質詢者的對應上。且從上帝派遣耶穌的例子，阿圖塞提到一個有趣的觀念：主體與屬民兩者間建立在再現體系展示上的互動關係，也促使絕對主體藉由投射在屬民身上（耶穌是活生生的人），轉而將屬民/個體變成主體（subjects），由此可知：一個完整的主體建構活動必須透過個體接受質詢後，對意識形態中投射的絕對主體形象進行辨識、認同、誤認、排拒等接受過程，之後主體屈從其所觀看⁵³的絕對形象，朝所認同的對象靠攏，將其視為現在和未來的形象，並依照認同的對象形塑的方式形塑自身的行動。

阿圖塞從意識形態的角度談論個體在其中的主體實踐，屬民主體對意識形態主體的回應—後者具有理想的完整性，隨著一次次詢問所造成的強化，使得個體（非—主體）產生誤識，導向將個體自身異化成幻想形式的主體，建構在虛假矯形的主體基礎上，而此種主體的性質也呼應了「意識形態是個體與真實存在條件的想像性關係的一種表徵」的命題，從而得出一個論證：在意識形態構築中的主

⁵³ 在此引用拉岡的概念區別「觀看」和「凝視」的差異，就拉岡說法，觀看是指賦予觀者主體位置的想像性建構機制，西方藝術的單點透視頗能說明此種觀看思維，觀者立足在主體位置，客觀世界即為主體展開；反之凝視則是隸屬客觀世界的折返性目光，即所謂的事物也在看著我。

體不過是一個幻象，而將人的主體性視為幻象的認知同樣揭示在拉岡的鏡像理論中。拉岡的鏡像是針對照鏡人主動的觀看角度，透過投射鏡中的影像，論述主體得以建構形成「我」概念。拉岡認為，「我」的概念是藉由對理想完美、異化之「我」的客觀化誤識「視別」。此種結論是如何歸納而出？在現實中無法觀看自身整體的「我」形象，透過分隔虛實世界門檻的鏡子，得以投射出完整的鏡中映像，拉岡指出，此種理想完美的鏡像為嬰兒所迷戀，可視為人類產生自戀式認同的原型，且在嬰兒誕生之初的意識，「理想－我」的鏡像同時也具現象徵性母體，與世界並未產生分裂，直到存在體感受到因他者不再場而產生的匱乏感，才宣示著自我意識的萌芽。他者對完滿世界造成的差異，使得存在體正式與世界產生分裂/離，此時鏡像轉而恰如其份的提供存在體確認自我形象的顯像功能，自我的完整性必須建立在相對於身體實體外的投射客體，這種對照性使得「我」產生了將理想完整的形象等同現實我的認知，掩飾了異化的結果，這也預示了；處在一個異化的視覺再現中，鏡像中的理想我對應現實中碎片化的我是單向的，後者永遠無法還原達到兩者的貼合，只能以漸進式的方式回歸。

研究者之所以引用這兩者理論，用意在於兩者的關連並非對照，而是兩者理論可合併觀之，即個體受意識形態質詢成為主體，意識形態在其架構的真理網絡中所訴諸的符號（及阿圖塞概念中的絕對的他者主體），成為眾多主體所認同的「理想我」，透過主體日常生活虔誠的實踐，主體企圖達到此種完美理想的形象。但須釐清的是，為了轉換阿圖塞的他者主體，研究者於上提出的「理想我」為拉岡原意的擴充，此處的「理想我」具有兩個不同的層次概念，也包含了持續變化的轉換性質，換言之，在此脈絡中「理想我」屬於一個動態持續變化的概念，這兩個層次的區別可比喻成形式/內容或者所指/能指的關係，阿圖塞提出的「他者主體」屬於前者，具有無限的包容性，或者說「空」的性質，就像是宇宙界的黑洞，可以無止盡的吸納被質詢主體對其無限延伸的詮釋可能，而拉岡的「理想我」便是被質詢主體對「他者主體」認知理解的內涵，可謂是主體將「他者主體」敷之以血肉之軀。以上談論，研究者於下輔以文本情節相互對照。

壓制性的國家機構－特勤局

在進入文本討論之前，研究者在此對應上章節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學校教育）提出相對應的壓制性的國家機器（特勤局）作為對照，並探究後者在文本情境下，其做為意識型態物質化的基礎脈絡所扮演的特質。即便區別出壓制性的國家機制（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es）和意識型態國家機制（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阿圖塞特別聲明國家機制運作模式甚為複雜，不管是暴力形式或是意識形態的潛移默化都是彼此相互影響，甚至呈現交疊作用的方式：

我將會說，每一種國家機器，無論是強制性的還是意識型態的，都既通過暴力又通過意識型態起作用，……。但是有一個重要的區別，這就是

（強制性的）國家機制大規模、普遍地通過強制（包括物質上的強制）起作用，而間接地通過意識形態起作用的事實（不存在純強制性的機器之類的東西）。⁵⁴（147）

透過文字敘述，威斯特菲德不僅從特勤局內外的空間建置、從事特勤事務人員的外貌、聲音等，甚至將他們比喻為肉食性的野獸，彰顯特勤局機制的侵略與威脅，同時也表露出特勤局單位加諸於塔莉身上無形的恐懼與壓迫，由此可使讀者藉由文字想像性再現國家機器實質的強制性。文本中，塔莉與特勤局的互動模式，主要是與中年美女凱波博士的接觸，有趣的是，文本中特勤局對塔莉的壓迫也同樣呈現兩種作用方式：一種是脅迫性的暴力行為，凱波博士的強勢與未達目的的不擇手段的冷酷，不僅臨時中斷塔莉的手術、強迫塔莉背叛朋友成為特勤局的臥底間諜等；另一種是意識形態的操演，對城市長大的塔莉而言，經過學校教育對於對稱美與歷史經驗領悟的洗禮與認知，使得她嚮往成為美人，並將其視為渡過十六歲長大的唯一標誌，美人的面目可以變成真正的自己，就因為這個「變成美人」的信念，當特勤局首腦凱波博士利用成為美人作為談判條件的籌碼，並脅迫塔莉以間諜的身份潛入探查煙城的據點時，即使重視友情承諾的塔莉也不得不接受，究其原因為「將成為美人視為理所當然」的意識形態作祟，而特勤局對塔莉的脅迫與塔莉最終的屈服是建立在意識形態對暴力行動的許可上，這也間接的反應了青少年面對國家機制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制的無力反抗。

進一步為研究者針對阿圖塞與拉岡理論的初步理解所做的探討，連接第三章的概念，優托邦的意識形態以「必須變成美人」為關鍵點，此種意識形態以「美人」為其真理網絡的核心集體概念，從日常生活中釋出大量的符碼，不斷地質詢城市青少年個體，使之成為美人（認定的主體），這些符碼包括：學校教育課程（生物學、基因學）、鐵鏽廢墟、十六歲的成年習俗，還包括：從小玩到大的軟體遊戲、醜人宿舍窗外隔岸的新美人鎮⁵⁵、成長環境中四周環繞的中年美人等，就連變成美人同伴所代表的意象和話語也上演著意識形態的質詢戲碼，何以言之？帕理斯（塔莉的青梅竹馬）變成美人後，孤獨難耐的塔莉決定夜闖美人鎮，在此引述兩人的對話觀之：「我想見到妳變成美人」「當然」「那就答應我（別再闖禍了）」（《醜人兒》22）。此時這段對話可以理解為：意識形態透過帕理斯（亦可將其視為美人形象的再現）質詢塔莉，並且在其蔓生的象徵網絡中還漫佈著塔莉從小浸淫的美人文化氛圍，使得塔莉初見帕理斯的驚豔聯繫上了意識形態脈

⁵⁴ 原文如下：I shall rather say that **every State Apparatus, whether Repressive or Ideological, 'functions' both by violence and by ideology.**.....This is the fact that the (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 functions massively and predominantly by repression (including physical repression), while functioning secondarily by ideology.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purely repressive apparatus.)

⁵⁵ 自從塔莉住進醜人城的學校宿舍後，窗口外對岸便是嚮往的新美人鎮，新美人鎮的派對燈塔對她而言是那麼明顯和期待，隨著青梅竹馬成為美人後，孤單的塔莉每一次向外凝視，便加深她要成為美人的想法，即使從雪宜那邊得知「人可以選擇保有自己的面目」的念頭時，塔莉仍舊不改初衷。

絡，彷彿在對她說「加入我們吧！成為我們的一夥吧！」，此時，帕理斯做為美人的具現，就在塔莉的眼前被近距離的觀看著，為的就是讓她夠被捕獲，也就是說，為了讓觀看者亦即塔莉落入它的圈套，且重要的是未等塔莉開口時，意識形態透過帕理斯的關愛話語（「我想看到你變成美人。」）質詢塔莉（個體），而塔莉的回應（「當然。」）也表示她對意識形態質詢的識別，這樣「未待主體聲明發言時，主體就已被說起、被對話了」的情形，同時也驗證了阿圖塞所說的每個體「永遠-已經是個主體，因此不斷地實踐意識形態識別」（170）。再者，塔莉毫無保留的擁抱「（必須）成為美人」的意識形態，而意識形態預設的主體（眾多美人形象集合概念）也投射出塔莉對自身成為美人「理想我」的鏡像，這可從塔莉與造型遊戲軟體的互動中觀之，軟體遊戲中所設定的塔莉，有一雙杏仁形的褐色眼睛、豐盈的嘴唇、黑色的直髮、直直的瀏海，充滿克利歐佩特拉風格，這是塔莉對為來自我的憧憬「她以後就會是我的臉，很快就會變成真正的我」（《醜人兒》32），但這樣的思維邏輯也反映出思考的盲點，而這盲點也凸顯意識形態的危險處：在主體主觀地認定下，什麼又是主體沒有看見/聽見的？塔莉等無數的城市青少年在一個話語性符號預先構築的空間背景下，實踐意識形態所預設的行徑，而未被意識形態言說的部分反而構成了城市的禁忌，暗示除此之外沒有一切質疑的空間。

主體透過意識形態的投射建構「理想我」之鏡像，深深的鑲嵌在主體意識中，若是長久以來信以為真的形象、信念破滅時，會引起什麼樣的後果？而理想我的形象破滅與衝擊也是日後塔莉與凱波博士的交鋒時，導致塔莉走上背叛友情的主要原因，何以演變如此？這又是如何發生的呢？下者為塔莉和凱波博士間的對話：

凱波博士不理會她的啜泣，直接打斷塔莉的話：「如果你現在不同意的話，我會去找別人，那妳就要永遠當醜人了。」……

「我沒有辦法，我現在實在太累了。」

凱波博士朝牆上的螢幕指一下，一個畫面出現了，就像一面鏡子一樣，不過是特寫畫面，它顯現出塔莉此刻的模樣：浮腫的雙眼，雜亂不整的衣物，她的臉上盡是疲憊和泛紅的刮痕，頭髮也凌亂不堪，當她看到自己的面容時，不由得驚懼萬分。

「這就是妳現在的樣子，塔莉，永遠都會這樣。」

「把它關掉……」

「快點做決定，」

「好啦！我答應做就是了，快把它關掉！」

螢幕立刻變成一片黑暗。（《醜人兒》7）

雖然身為醜人是不爭的事實，但對塔莉而言，成為整型手術後的美人才是真的命

題，因此身為醜人面目的自己是她亟欲疏離的自我鏡像。如前所言，隨著意識形態召喚機制不斷的對塔莉釋放出將在十六歲成為美人的訊息，塔莉也下意識的主動回應了這個召喚，包括在醜人宿舍窗外攝入視線範圍內的美人鎮，即便那是醜人的禁地，塔莉仍舊可以遙遙相望，以它為起點，對之進行無限幻想與膜拜，而暗喻具有美人身份、價值觀與生活方式的美人鎮圖像，也成為意識形態具象化的真實投射，但弔詭的是，對未滿十六歲未能接受手術的醜人塔莉而言，這個身為美人的自己也是一個疏離的自我鏡像，而這雙重的疏離構成了塔莉複雜的自我概念。此時欲解開這個糾結的線團，勢必要繞回阿圖塞對意識形態的基本命題，即「意識形態是個體與真實存在條件的想像性關係的一種表徵」，研究者再次借用拉岡的概念詮釋之，在其《心理分析的四個基本概念》（*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一書中，曾提及一個有趣的〈燃燒孩子〉夢境，拉岡對此夢境的解釋可讓我們更清楚認知意識形態與現實的關係：

一位父親連續地日日夜守候在他孩子的病床邊。孩子死後，他走進隔壁的房間躺下，但卻讓門開著，以便能夠從他的臥室看見他孩子的屍體陳放的房間，屍體周圍有些很高的蠟燭。一個老人一直忙著看護它坐在屍體旁邊誦唸禱告詞。幾個小時的睡眠之後，父親做了個夢，他的孩子站他的床邊，抓著他的手輕聲責問他：「父親，難道你看不見我在燃燒嗎？」他醒了過來，注意到從隔壁房間傳來的一片亮光，他匆忙走進去，發現老看守人倒在一旁睡著了，他孩子屍體一只胳膊上的裹屍布被倒在上面的蠟燭點燃了。（？）

在拉岡的解釋中，現實與夢想是相對立的，這位父親（主體）在沈睡中進入了夢境，也進入了拉岡所說的慾望的真實，但夢境中，孩子控訴是令父親恐懼的真實，逃避機制使得父親從夢中醒來進入了象徵的現實。反觀意識形態，它並非為了逃離令人無法忍受的現實而構築的幻想，而是它為主體構築了一個真實的社會關係，即提供社會現實本身，以做為對某些創傷性內在核心的遮掩，注意兩者因果關係所造成的差異。塔莉對成為美人堅信不移的態度，實則是主體透過想像關係與現實建立了一種確認/誤解的互動基模，當這長久以來的認知突然因外力的介入而被硬生生的剝離時，令塔莉難以忍受的不堪也浮出檯面，這就是被鏡子放大的特寫鏡頭「顯現出塔莉此刻的模樣：浮腫的雙眼，雜亂不整的衣物，她的臉上盡是疲憊和泛紅的刮痕，頭髮也凌亂不堪」，此時自我與現實的想像關係被迫結束了，現實被抽換成真實，疏離的誤認透過鏡子如「實」呈現，被矯正的現實頓時墮入幻滅，因此塔莉呈現崩潰狀態與反應（「把它關掉……」）是可想而知的，然為了回到以往被認同的疏離對象，塔莉不得不選擇背叛朋友，這一切完全是為了成為美人。

第二節 眼中的他/她

她擠過一個又一個的房間，試著專心找人，不被那些美麗的大眼睛分神，或是被那種格格不入的感覺征服，**塔莉在這裡多待一秒鐘，就越覺得自己實在醜的要死，每個見到她的人都在嘲笑她也讓塔莉很不好過**，不過總比他們發現她（醜人的）真面目來得好。（《醜人兒》16）

他是個醜人，真正的醜人。……

在這幾秒鐘之內，塔莉完美的視力已經看到所有**缺陷**；他的頭髮任意亂翹，還有他粗糙的臉孔也極不勻稱。**她看到他佈滿缺陷的臉孔後，全身起雞皮疙瘩**。加上那叢稀疏的青少年鬍鬚，沒有整型過的牙齒，他額頭上的疹子像病人般恐怖。**她很想抽身離開，儘量跟他不吉利、不乾淨，而且不健康的身體保持距離**。（《美人兒》37-8）

塔莉試著想像親吻薩納如孩童般的唇瓣，輕撫他顫抖的雙手，這些念頭讓她感到噁心。……

「為什麼他看起來如此的不一樣？就像他跟我們不一樣。」

「塔莉，妳才是與眾不同，妳現在是特勤員，而他只不過是個平凡的美人。」

「他不是一個……」塔莉無法將起頭的話語說完，她身上鄙視薩納軟弱的那一部份太強烈了，而她也無法否認薩納的確讓她感到不舒服，那種不舒服就像是不應該被允許存活的東西。（《異人兒》89-94）

延續上一節的話題，青少年主體普遍對美的認同與接受，也潛移默化的反映在視覺觀看範式上，美與醜的比較劃分使得前者握有優勢，美的橫行無阻，使得美掌握了觀看的主權，這種認同美人的觀看方式普遍的主導了城市住民觀看思維與其伴生的權力運作，有趣的是此種現象呈現是透過文本的架空書寫，換言之，透過文字暗示讀者有關烏托邦認可的視覺觀看位置，這也形成文本對讀者進行另一種意識形態的召喚，也從而暗示了另一個訊息：語言反射和形塑文本世界的權威。文學作品中包括兒童、青少年文學，較常出現的敘述觀點多為第三和第一人稱觀點，兩者差異在於第三人稱屬於全知觀點，作者提供客觀的敘述角度，避免涉入主觀的價值判斷，並將價值判斷的權力留給讀者與觀看者；相較於第一人稱敘事觀點，書寫者以「我」為敘述角度，主觀價值判斷遠較第三人稱涉入程度較深，讀者與觀看者會在不知不覺中傾向認同第一人稱的敘事感受，認同「我」的觀點與發聲位置，形成所謂的讀者與文本角色間的認同。然從精神分析的角度觀之，第三人稱的敘事觀點也不是這麼全然客觀，敘事者仍舊不免會涉入自身的主觀感情，形成「說溜嘴」（slip of tongues）的現象，突顯了語言的不確定性與

無法控制 (Jacqueline Rose 35-41)。以此觀點論之,《醜人兒》三部曲雖以第三人稱的敘述觀點建構,然在這看似客觀、中立敘述觀點,在作者威斯特菲德字裡行間的描述與情節鋪陳中,卻是以第一女主角塔莉的視角、行動或是經歷為敘事主軸,構築文本世界,換言之,「我」的敘視觀點掩藏在塔莉「她」的背後,在無須縝密思考與對等比較下(例如可對照《嗑藥》的多重敘述觀點書寫),讀者被選擇以塔莉的位置閱讀,並隨著塔莉不同階段的身體樣態(醜人、美人到異人),經歷了從全然接受美的判斷標準到質疑與最後的推翻(或者說一種回歸)過程,當然塔莉不同時期呈現的態度翻轉也具現了以身體為實踐場域的烏托邦式辯證,進而形構青少年烏托邦小說的價值觀,這中間複雜的脈絡也關連著青少年小說的本體論和在隱藏在此操作模式下的當代兒童/青少年觀,這部分須要更大的論述架構方能承載其中的開展,非本文所能處理的問題。

大體而論,本章節主要集中在富有權力的觀看活動。在科學研究中顯現,人類胚胎的感覺器官發育中,以眼睛發展最慢,但在感官與環境互動所構築的認知中,卻是以眼睛佔居首要位置⁵⁶。視覺不僅是人類予生具有的生物本能,在東西文化進程的演變中,視覺也積極參與文化建構。以西方詞彙為例, theory (理論)的希臘詞原型為“theoria”,意思是「專注地看、看到」;而英文的“I see.”,不僅包含字面上「我看到」的意涵,甚至是更深意味著「我明白了」;法語中的“savoir”(知道)也包含著“voir”(看)的詞根(陳榕 349-351)。若進一步從印歐語系的詞彙學觀之,帶著瞭解的觀看與“history”(歷史)亦有相關,其字首 his 的意涵為 vid,藉此對比 wit 和 idea (Barzun & Graff 46),由此可知,個體藉由視覺觀看事情的發生和關注事實(本質)本身,建立其認知體系,由上可知,視覺感官上的肉身意義與真理探索和認知真相互相指涉,然這種視覺客觀、疏離的樣態也體現了人與其觀看世界的對立。

在文本敘述中,透過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等機制運作,在優托邦崇高理念下,城市形構了整型手術合理化的普遍意識,同時也建立了以美為準則的觀看之道,在身體外觀的評斷上,再現霸權式的視覺範式,同時也返照出身體差異在價值體系中的階級劃分和物種屬性。在本節開始的三段引文中,各自代表著不同身體樣貌的塔莉,可以見得醜人相對於美人;美人相對於異人,且此三者間的層次高低依序為醜人—美人—異人,前兩者主要的判准標準建立在身體的外觀差異;後兩者雖同屬於美人的範疇,但兩者主要差異在於腦部認知結構的進化程度,簡而言之,美人就是典型的空有一身美貌卻沒有大腦的「花瓶」,而數量維持小眾的異人(皆是特勤局人員)不僅擁有正常的思維意識,科技助力也造就了異人身體功能的進化,雙重優勢與優越為異人帶來了權力。以塔莉的觀看視角為例,被觀看的對象在塔莉的視域中被物化,同時此種物化情境也產生了鮮明的美/醜(羨慕/厭惡)觀感,而城市對美之觀感突出也暗示了塔莉(青少年主體之一)被制約的

⁵⁶ 此處言論當只普通人而言,不包含視覺障礙者或是類似徐四金《香水》筆下的香水調配師。

觀看思維。研究者在此所要討論的焦點為成人對青少年的身體制約如何主導其觀看的思維模式？即反映在塔莉對他人的觀看中，其不同的觀看位置又形塑出何種身體意象？與美的關連性何在？

在此研究者引用沙特以其童年為藍本的自傳《詞與物》，說明隱藏在視覺機制背後的權力流轉，尤其是發生在具有對象性（例如我與他/妳）的注視與觀看活動中——

我的真實、我的性格、我的名字，它們無不操在成年人的手裡。我學會了用他們的眼睛來看自己。……他們雖然不在場，但他們卻留下注視，與光線混合在一起的注視。我正是通過這種注視才在那裡奔跑、跳躍的。這種注視保持著我的模範外孫的本質，並繼續向我提供我的玩偶，賦予我一個世界。（65）

《詞與物》是成年後的沙特以一種他者的疏離姿態對自我童年的回顧書寫。早年喪父、母親不受外祖父重視與寄人（外祖父）籬下的不安，造成沙特童年的早熟，也促使沙特敏感的感受到來自親戚目光背後的壓力，沙特自省式的提到依附成人的孩童是多麼的無助，所謂模範外孫的自嘲，意味著他的所作所為是出自於取悅成人，是為服膺成人的標準。然真的完全如沙特所言嗎？在此虛偽與真實不再是被苛責的對象，如何去度量沙特幼時的意願？到底自願與被迫佔多少比例？即便是長大後的沙特，想必也無從揣測當時的情緒吧？或許是兩者拉扯後的妥協吧！然這也從中透露出他人注視的壓力和及其對自我形構的影響，換言之，存在本身這個事實並不意味著自由的成為你自己，本質的構成包含著外力的干涉，選擇有時出自於無從選擇。另外在引文中，沙特提到了注視/目光的特質，隨著他人的不在場，觀看並不會消失，而是繼續延續著，形成一種弔詭的「不在場的在場」，同時也說明了「我被他人注視的恆常可能性」。

大體而言，觀者與被觀者的位置確定取決於觀看時的權力流轉，這種對立關係也形成了「主體—客體」的分立，當他人的形體出現在我的視域範圍時，對方做為對象物，此時世界為我所有，以觀者為中心，然這樣和諧的情景並不是永久的，因為所謂的「對象—他」也同時擁有觀看的權力，及其所見的視域範圍，同樣可使「我」成為其觀看的客體化對象，由此可見，當雙方視線彼此交鋒時，在這當下，是誰掌握了觀看的權力？因觀看體現的壓力也延伸出沙特在其自傳中並未談論的話題：他人觀者如何形塑其目光背後的視覺範式？與其鑲嵌的社會脈絡有何互動影響？當觀者被權力賦予「看」的特權，透過觀看確立觀者自身的主體位置，相對的，淪於「看」之對象的被觀者，無形中體會了觀看者眼光所帶來的權力壓力與批判（進行價值評論），而這種帶有監視意味的觀看體系，促使被觀者通過內化觀者價值判斷進行自我物化的過程，而所謂的「不在場的在場」，可

視為被觀者內化觀看者的視覺模式，內化的視覺模式早已取代了他人的觀看審視被觀看者。

再回到文本引文，美的召喚機制反應在青少年塔莉的視覺活動，使其產生「矮化自身的悲賤」和「非我族類的拒斥」的感受，兩者圍繞在美醜或優劣的對比上。同樣都是塔莉的視域範圍，卻產生不一樣的觀感，但不變的是美挑起了紛爭，以下將分別陳述之。當塔莉還是醜人時，在她的視域中，美人做為一個對象是相對於主體之外的「他者」，對應沙特的說法，主體可透過自身注視的力量將觀看對象客體化，然從文本的敘事中，在這場觀看的角力中，反倒是塔莉處於弱勢，且透過內化對象他者目光的行徑，塔莉弔詭地完成了自我客體化的過程，換言之，美的意識透過美的形象對塔莉進行審判，醜的感覺在比較基模下使得潛入新美人鎮的她產生疏離感，此時以美為核心，醜是被嘲笑鄙視的客觀對象。然令人好奇的是，醜人如何內化美的範式？這將是研究者下一步想要探討的問題。從第三章研究者學校教育、成年儀式、掌握歷史詮釋權等方面歸納合理化整型手術的但書，在美醜的分類框架下，相較於整型後的美麗對稱容顏，每個人的天生顏面（在此不論後天遭受重大顏面傷殘者或是先天顏面缺陷）被劃歸為醜的項目下，連帶地也引起了他人或自我的厭惡、排斥感，醜也使得身體標籤化，此種標籤性質亦可視為一種烙印（stigma），這種烙印唯有依賴科技（整型手術）方可去除。

烙印最早的意義見於希臘，指及得是「加標記或火印」；在宗教上烙印可被視為透過肉身彰顯上帝的恩賜，具有神聖性；在國家政治意義下，烙印具有道德意義，烙印指得是破壞國家社會秩序，而被刻入或烙進身體的印記，而這明顯的記號也標示出受刑人的道德污點；在醫療體系中，烙印可被詮釋為因疾病外顯的跡象病徵，烙印亦可指身體上的缺陷、瑕疵或醜陋標記，而在同一個團體裡，被打上烙印的人也因為此記號與團體中的其他人有所區隔，投射出與此團體維護的標準或價值觀相左，區隔的此類型人的同時，也意味著對團體秩序的淨化。近代的對烙印概念逐漸從肉體上印記轉變成精神性的探討，例如因烙印引起的羞恥情緒。如高夫曼認為烙印會內在化成為「腐敗的證章」，產生一種下等、被貶斥、脫離常軌、可恥的與眾不同的感覺（1963：3）。

有趣的是，醜人的烙印並非源自後天的肉體標記，而是象徵體系強制執行的結果，即美醜是一種符號概念，具有文化意涵的價值體系，此種烙印符號對應到整型後的美人，而整型手術的前後分野驅使美醜判準斷然地客觀化，沒有任何的模糊性，所有的人皆是非醜即美，就像是是非題型，有接受過整型手術的人打○，他/她就是美人；沒有/尚未接受整型手術者，很抱歉，他們被打上×的記號，而醜人對加諸身上的烙印的接受或內化，或來自於社會（他人）對此狀態的反應，例如從美人的話語中聽到自己被稱為醜人「妳看！是醜人耶」；或是自己接受這

個烙印證明開始「因為我們很醜」（塔莉對雪宜解釋為何昔日要好的伙伴在變成美人後反而與醜人劃清界限），且兩者是相互交錯進行的，社會外界的反應強化了個人對烙印的接受，而個人對烙印的認知也透過外界社會反應得到印證，當此烙印內化時，醜人也同時將社會觀感—羞恥與厭惡感，納入內在化的體系中，如果支撐烙印體系的意識形態未有突破性的顛覆時，被打上醜人印記的青少年將會在「醜人」烙印尚未被其他人指稱出來時，明顯的感受烙印的存在，同時預期因烙印所帶來的羞愧，從而使內化機制更加根深柢固。

如上所述，醜的印記延伸出正常/反常的區隔標準，反觀塔莉轉變成美人後，外形的變化也帶來了不同位置的觀看模式，且在完美視力（極致美的表徵）的觀注下，醜在昔日煙城同伴的粗糙臉孔、牙齒和稀疏的青少年鬚鬚被局部性放大與強化，在此醜不僅被視為一種缺陷，從塔莉最直接的生理反應可以具體的感受到對醜的拒斥觀感「全身起雞皮疙瘩」，而雙目所觸及的不潔身體，是這麼的令人作嘔，塔莉當下的念頭是「抽身離開」，恐懼使得她極力避免與這個「不吉利、不乾淨，而且不健康的身體」接觸，以免讓髒污沾染於身，未被整型過的醜陋身體在塔莉的視覺感受中掀起巨大的反應。相較於成為特勤員的異人塔莉，面對昔日親密的美人伙伴薩納時，對美人美麗皮相下的空洞膚淺，她仍舊表現出噁心的感受。人類學家認為，沒有任何事物在本質上是令人噁心的，唯有當某種事物違反了特定象徵系統中的分類規則時，它才便變得噁心（Mary Douglas 138-139）。若是依循克莉絲蒂娃式地追問便是：為何是此一分類系統而不是另一個？且這種分類系統「呼應了哪些社會需求、文化價值，又這些價值體系如何影響社會主體的架構與互動？」（Kristeva 1980:21）。換言之，若從主體置身的社會象徵體系思考，主體在操演象徵體系所產生的認同、排除、隔離、賤斥、驅除等行徑，無非圍繞在符號的「淨化與污穢不潔」的範疇中。然以烏托邦為核心架構的城市文明，何以發展出此種以醜為驅除異己的排他性？難道這個排他性單單只是為了避免烏托邦境內的單一價值崩毀而設置的防衛機制嗎？按照文本的邏輯，整型手術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消弭因人類所帶來的浩劫，因此醜可視為對非理性和瘋狂的排拒，除卻這個思考點之外，還有其他更深層的動機嗎？亦或是做為一種具現之他者對象的醜人，透過將他者加以對象化，以引發恐怖及排斥感，藉此投射個人或集體文化之黑暗深層的心靈機制？（劉紀蕙 9），若是此，美醜二元價值體系又扮演何種角色呢？這樣的觀點對烏托邦/惡托邦文學或是此種文學傳統與現實世界的互動有何理解？……眼前研究者只能意識到這樣的思考層次，由塔莉對醜人的反應所延伸出的問題似乎過於龐雜，在此提出這樣的概念想法。

第三節 我已非我

親愛的塔莉：

妳是我。

或者我猜另一個說法是，我是妳，——塔莉·楊布拉德，我們是同一個人。可是如果妳現在正在讀這封信，那麼我們同時也是兩個不同的人。至少這是我們新煙城人猜測，這個時候可能發生的情形。妳被改造了，所以我現在才要寫信給妳。……

如果妳完全不記得寫過這封信的話，那我們的麻煩就大了，尤其是我。因為被自己忘記，那表示寫這封信的我，不知為何已經被人除掉——唉喲！也許這表示我已經死了，有點像是這樣。（《美人兒》37-8）

在此研究者必須從其被放置的位置及其與之前章節的關連性，說明此節書寫在本論文的架構定位與意義：本節隸屬於「第四章 觀看身體」內文的一部份，就其性質而言，屬於研究文本分析的演繹，若細觀之，其論述脈絡有別於前兩節，卻與研究者擬定的後續相關研究或文本情節內容相呼應，換言之，此章節不論是在文本本身或是本研究論文皆扮演著重要的轉折位置，此待研究者細細道來。首先就文本脈絡觀之，這封寫給自己的信無疑對塔莉的美人生活投下巨變，換言之，塔莉也開始醒覺得關注城市對青少年的限制與規範，不僅包括身體，受損大腦引發的視覺範式，更甚者是知覺對心靈的束縛，也因此轉變，讀者可以明顯的感受到青少年次文化力量的反動性，在看似狂歡、無組織的遊戲中，卻鬆動了看似穩固的社會秩序，破壞的意義在於向成人宣告秩序並非不可顛覆的，潛伏在灰色暗流中的基底將逐漸被侵蝕殆盡。就研究論文方面論之，所謂的〈觀看身體〉中的「身體」可大致延伸出兩種不同的情境，一者為經驗世界中活生生的身體；一者為藉由語言建構的話語性身體概念，此三節的共同點在於透過文本，談論話語性的身體與實境身體產生互動與拉扯的概念，不可否認，其中顯示的身體意向是更為複雜，但這談論仍舊有所不同，前兩節〈我（應該）是美女〉和〈眼中的他/她〉處理的身體現象可歸屬於「身體實踐如何具現相關身體文本」，即在烏托邦體制下，青少年的物質身體如何具體化其所規範的身體話語文本，然此節探討的身體概念則不然，指及的是青少年的身體實踐如何衝破欲形塑物質身體的規範文本網絡。如前引述文本內文所示，塔莉視域中顯現的身體概念出現的混亂，這封信闡釋的深層含意欲透過語言企圖表述或是囊括個體身體在世界上的體現脈絡，但卻發現語言符碼的矛盾。順此邏輯，延伸出本節的討論重點，研究者將探討：這封信揭示的身體話語機制是如何和身體的實踐體驗產生斷裂性，而這種斷裂、脫節何以重新建構青少年的身體意義？而這新的身體意義又是如何呼應塔莉等一幫青少年對優托邦理想的反省？而藉由塔莉揭露烏托邦偽意識的主體意識，也象徵著城市青少年個體的清醒，而這種醒覺不啻是敲醒優托邦的喪鐘，也

正式宣告惡托邦的到來？

研究者於下將從語言學的概念申論此封信內容及其凸顯的身體概念，試圖析論何為「我以非我」（此亦為章節的標題）的核心。從結構主義的觀點論之，研究者將採用瑞士結構主義兼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語言學觀點，試圖觀看信件中的語言形構及其和書寫者本身的內在關連。索緒爾的語言學觀點大致上有兩個重點，別於十九世紀前的語言學者，索緒爾關注在語言結構功能與意義生成的關連性探討，首先他將區別語言和言語，認為語言是由一套結構穩定且為自我生成的符號系統，因此語言系統不受歷史等外在因素影響其內在結構，這個觀念也促使索緒爾採用共時性的方式研究語言現象。再者，索緒爾認為語言基本單位是符號（sign），在分析層次上可區分成兩個部分：能指（或稱為符徵、the signifier）和所指（或稱為符旨、the signified），前者指的是連結某一特定概念的聲音意象或書寫的對等物，後者指的是呈現在我們腦中企圖溝通的概念。雖然在使用上兩個部分是結合為一個不可拆解的整體，但兩者之間並沒有必然的內在關連，其所依賴的反而是該符號與其他符號，在此符號系統中的差異（由符號的位置產生）所構成符號意義本身，這意味著所指和能指間的關係，與其說是本質的，毋寧說是約定俗成的、武斷的（Barry 41-44）。也因為所指與能指間的關連是任意的，唯有透過語言方能建構我們對世界的觀感，同時我們也必須透過語言思維，和他人進行社會互動，然語言建構的知識體系與世界的對應關係在尼采看來卻產生了侷限，因為世界是川流不息的，就像是「抽足入水，已非前水」，世界的流動性是無法完全用語言框架住的，且受限於主謂關係的語法特徵，我們對世界的認識建立在自我為中心的觀點，整體而論，我們只能藉由強加於生成之流世界上的能指建構我們對世界的觀感，我們對真實的認知來自語言符號系統化的拼湊（轉述於 Tuner 338-340），從中也突顯出話語性構成的缺陷，而話語規則的空洞也使得身體的實際體驗早已溢出框架之外，無法為語言捕捉，這也是為什麼塔莉無法用語言貼切的表述她對自身身體變化的觀感了。

符徵與其表述世界之間的巨大裂縫與隔閡，使得文字產生了空洞性，所指與能指的關係就像是牛奶上層浮現的薄膜，看似凝固安全卻遮掩了底層晃動的液態實象，而這種情景也就是塔莉書寫當下發生的窘況——在一個時間之流中，平面性的語言無法描述身體逐漸變化經驗性，以下將為此做進一步說明。因時間先後和接受整型手術與否，從信件內容中得知，即便書寫者與敬啟者是相同的名字，信件仍舊是遵循對話式方式進行書寫，首先研究者依循信件內容區分成兩個概念，且這兩個概念實則可歸納為對於主體的詢問，包括何謂「我是誰？」、「什麼構成我」、亦或是「誰是我」等大哉問。「我是誰？」名字就能說明一切嗎？例如塔莉·揚布拉德，如果是這樣，那個不管是否接受過整型手術，「那就是我們就是同一個人」，擁有相同的名字可透過自己或藉由他人之口指稱自身，似乎讓塔莉得到一種狀似和諧的安穩，若是從身體與自我關連思考時，那麼整型前後的差異促使

塔莉產生何者為自身的混淆，塔莉的名字（能指）在對應塔莉身體（所指）產生了遲疑，因此不難理解信中何以會出現兩個人稱代名詞（妳和我）指涉塔莉（可將其視為一種所指），藉此因應「原本的我」與「改造後的我」的兩種不同狀態，同時也因為無法完整合，使得塔莉處在分裂的狀態，出現今日我以非昔日我的概念，導致塔莉以戲謔的口吻說著自己恐怕會被自己殺死的慨嘆：「如果妳完全不記得也過這封信的話，那我們的麻煩就大了，尤其是我。因為被自己忘記，那表示寫這封信的我，不知為何以經被人除掉——唉喲！也許這表示我已經死了，有點像是這樣」（34）。

再者從信件書寫的脈絡中，我與妳的人稱使用也因為對整型手術的不同立場與態度呈現對立的概念——「我」是不認同整型手術的醜人塔莉，相對於「妳」是因為接受整型手術而被改造的美人塔莉，然在信件中，當時還是醜人的塔莉預測原本的身體將因接受科技的改造從而被銷毀，取而代之的新身體也被當下書寫的妳視為疏離陌生的物質對象，連帶伴生的自我也被對象化為「妳」，藉此凸顯與「我」的差異。且我的使用同時也宣示了塔莉當時書寫位置與立場，然有趣的是「我」的概念思考必須置入信中使用「我們」的集體名稱脈絡中，即「我們煙城人……」，換言之，塔莉書寫時使用的「我」的概念是與「我們煙城人」的概念是相互關連的，即先有反對城市整型手術的組織和理念形塑出「我們煙城人」概念，才有接受煙城觀念的塔莉「我」的存在，若要細部追究，塔莉使用的我的概念內涵也與當初離開城市時的「我」截然不同，而這也是被迫以間諜身份深入煙城的塔莉所始料未及的事情吧！

在塔莉與一同前往搜尋信件的犯罪社領袖薩納得知信件內容後，兩人除了震驚之外，信件的內容也證實了薩納心中的疑慮與猜測，文本遂以兩人為中心，描述他們如何利用節食或吞食消脂錠以保持大腦清晰狀態，或描述他們如何積極的為犯罪社美人成員策劃相關「酷炫」的叛逆活動，包括破冰行動或大型的逃脫行動，藉此激盪美人的混沌意識狀態，以反擊整型手術的後遺症。這種積極的行動皆是這封信件的所帶來的效應，換言之，從象徵層面觀之，這封信所顯示的話語失落，從而讓青少年反思城市加諸其上的身體政策，並重新建構他們對自己身體的概念，這樣的認知同時也暗示著城市嚴守的身體規範即將崩解，何以言之？誠然，城市在優托邦氛圍中倡導整型手術，同時也形塑了某種類型的「美貌神話」，然其背後實有一套複雜的身體思維運作機制：吾人透過視覺捕捉、拼湊、建構片段的身體實象，然當這份認知落實在象徵世界時，卻必須通過系統化的分類系統方可確認，而產生的知識體系也取代了真實身體在變動世界瞬息萬變的現象，進而系統化身體的經驗性，真實身體與象徵語境互動的結果，也使得象徵符碼與實境中的身體相互混淆交疊，讓人誤以為這就是身體的全然面貌，換言之，研究者的基本假設為有一個具有永恆真理性質的身體實境（設若為 T），而象徵界的身體概念（設若為 t）是對此真理的片段認知、誤識、建構與拼湊，而兩者

之間的關係是 t 永遠無法完全到達 T 的境界，只能不斷的趨近。

而身體實象既壓抑在話語羅織的身體網絡中，也產生了誰掌握了詮釋身體的紛爭。爲了強調對身體規範性的控制，身體話語機制遭到有心人士控制，藉此操弄展示自我的身體樣態，而這些有心人士包括由整型手術執行醫生聯合組織的美人委員會、又如特勤局的凱波博士，他們從外部強制施加關於身體的知識，進而建構青少年對身體的思維，然如研究者所言，對身體的思維並非永久不變的，身體話語網絡儘管但並非密而不漏，未被意識到認知的身體實象仍舊有衝破表層防衛機制的可能。回歸本研究，總而言之，烏托邦威權既以青少年身體做爲實施對象，青少年對於整型手術與制度下身體樣態的反省，也將使得青少年以其身體做爲抵制烏托邦威權的物質實踐，也因此物質身體既可文本化從而使得規範透過活生生的身體得以具體實踐，相反的物质身體亦可拒絕規範具體化，只要對加諸其上的身體話語從而抵制，而青少年的身體反動也開啓了新的一章，使得理想的優托邦脫下其魅惑的華麗外衣，顯露出爬滿蝨子的蒼白與瑟縮之真相。



第五章 結語

第一節 烏托邦敘事下的身體概念

如第一章所示，本論文之所以挑選《醜人兒》三部曲做為研究文本，就其學術研究價值的考量點有三：一為其文本議題結合當代文化語境；二者為其書寫模式重申西方烏托邦小說的敘事傳統；三者為其形塑的青少年角色成長歷程服膺青少年小說的啟蒙精神，本論文中，研究者著眼於前兩者的探討，換言之，研究者主要探究是《醜人兒》三部曲做為一部青少年小說，如何透過烏托邦之文學敘事形構其對後現代脈絡的想像，更嚴謹的說法是，作者如何透過其對青少年的身體敘事，提供他對當代文化議題與青少年文學文類的思考，更甚者，烏托邦框架不再只是單純的文學類型，其背後所呈載的價值判斷，儼然成為作者韋斯特費德對這兩者關連的態度，何以言之？以下研究者將從當代的身體意識談起，繼而談論將此文化現象視為創作元素時，挪用至兩者文類產生的變體。

壹、當代文化現象的身體意識

文學，做為一個時代的產物，它緊密的鑲嵌在時代的脈動中，即便是在大多數人眼中難登大雅之堂的兒童文學亦不例外。泰利·伊格頓（Terry Eagleton）曾在《後現代主義的幻象》一書中提出這樣的看法：「如果關於國家、階級、生產方式、經濟、正義等抽象問題已經被證明是此時此刻難以解決的，那麼人們總是會將自己的注意力轉向某些更私人、更接近、更感性、更個別的事物」（22）。在這些事物中，身體無疑是感性、私密的個別事物之一，因此伊格頓標示了「一種新身體學的崛起」。另外隨著資本主義的發達，私密的身體轉而與市場機制結合，彰顯其商業性與大眾性，在消費社會中，身體轉變成一項商品形式，不斷的產製媚俗的慾望，我們可以明顯感受到，大多數的身體焦點都集中在對「美人」的追求與形構，象徵著消費社會對肉體的迷戀，而這種肉體的崇拜並非關注裸露的身體，而是做為性載體的身體，換言之，身體不再凸顯實體自身，而是覆蓋著象徵意涵的身體符碼，或充塞著美麗的邏輯、時尚的邏輯或科技的炫惑等，誘發觀者對性慾想像。

這樣的時代氛圍無疑被無數敏感的作者、學者所捕捉，他們透過不同的方式談論、批判著身體，其數量之多就連伊格頓曾戲謔的寫到這樣的一句話「無疑很快在文學批評中的身體將比滑鐵盧戰場上的還要多」（22）。想當然爾，《醜人兒》三部曲的作者也不過是藉由文學創作的方式思考當代身體議題，並以小說呈載其思考過程的開合，最後將其訴諸於當代青少年讀者，這並非文學創舉。然有趣的是，當代身體現象在涉入青少年文學與烏托邦文學傳統時，一來受制於各自文類體系的邏輯，二來創作者有意交疊此兩者文學類型，使得文本呈現出的身體意識

有了不同面貌，或是因文類產生的可預期結果。

貳、烏托邦思維下的身體概念

在烏托邦文學敘事中，近代多數烏托邦小說內容泰半離不開對科技應用的主題，儼然與科幻小說結合，而當科技堂而皇之的介入社會結構的形構時，誠然加速推動了優托邦理想的實現，然其伴隨的威權制度和絕對的理性，也導致祥和的優托邦令人措手不及的轉變成惡夢般的惡托邦。整體觀之，烏托邦敘事核心仍舊脫離不了對人類理想生存環境或狀態的追尋與探問，在烏托邦世界實現的同時，也在其敘事脈絡中埋下優托邦與惡托邦交揉的辯證伏筆。可以這麼說，眾多的烏托邦文學只是在不同的時代思維下，從不同的方式或角度建構其理想世界，主要的核心在於對所當處世界的改變熱誠，或許想法或偏激或天真地讓後世人無法苟同，然其追求「逝彼樂土」的樂園意識與浪漫情懷仍舊值得嘉許。

然當代身體意識在置入烏托邦文學場域後卻產生了突變，就研究文本觀之，身體意象從而擺脫複雜詭譎的資本主義邏輯，轉而納入烏托邦的政治軌道中，身體也成為烏托邦社會制度的投資對象，懷揣著優托邦的理念，城市掌權者透過各式各樣的國家機制和精心策劃的意識形態話語，打著冠冕堂皇的社會正義旗幟，標榜科技打造的美感身體，打算一勞永逸馴化身體，其最終目的是強制性建立標準的身體規範與樣態。透過科技（整型手術），城市當局對青少年的身體干涉顯現出兩種思維，一種是極度張狂的美化個人身體，另一種是晦澀的馴服個人身體，且這兩種思維是相互交疊的，換言之，整型手術的科技造就了既是美麗而溫馴的身體。此部分將主要針對前者加以論述，美麗的身體外觀引發的不是性感或性慾的勃發，而是導向醫療寓意的象徵，從某個角度而言，這樣的身體圖景避免了對性的對話與探討，因此文本中城市顯露的身體風景，要麼是美麗健康的身體，要麼是醜陋令人作嘔的身體，於是在這樣被建構的身體審查機制下，美與醜相對，健康也與疾病相對，更甚者，健康亦或是醜陋並非是對個體身體內部診治所下的科學判斷，所謂健康的身體是美麗身體外在化的結果，可以說，身體具體的外顯性不僅包括美麗，也寓含健康的意義，一切實質意義銘刻在身體的外在。也因此當身體簡化為外在的形象時，身體從屬於社會，也將馴服社會國家。何以言之？不論美麗或醜陋，皆是透過身體具象化，兩者不僅依據在身體的物質性，也透過身體形塑其表現形式，這種彰顯的表現性也引發觀看，尤其在公共空間中，勢必要受到他者的目光質詢與審查，在文本設定的優托邦社會結構中，城市特別標榜經過整型過後的美麗身體類型而排斥原生身體樣態，那麼為了融入外在象徵世界的體系中，個體勢必要依循社會規定的身體標準，將自身的身體裝扮成恰如其份、為社會接受的正常的外在身體，這也是城市青少年普遍接受整型手術的原因了。換言之，為了讓身體在公共空間領域中佔有一席之地，身體的外在性只能從屬社會制訂的標準，在其規定的範圍中，展演其實踐遊戲。

參、青少年小說架構下的身體概念

大部分的文化歷史學者皆認同以 1744 年約翰·紐伯瑞(John Newbery, 1713-1767) 正式出版的《口袋小書》(*A Little Pretty Pock-Book*) 做為兒童文學正式起源的公認指標，這一本富含教導與娛樂功能的小書，同時也標榜了兒童文學透過資本行銷的手法，儼然成為針對家長與兒童為銷售對象的商品，換言之，這是兒童文學從傳統的家庭私領域堂而皇之地進入商業公領域的契機，且弔詭的是，紐伯瑞的男性書商身份也暗示了男性介入先前由女性生產且控管的文學事業，相似的例子也同樣出現在美國，1922 年美國圖書館協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簡稱 ALA) 在兒童書商梅爾契爾(Frederic Melcher) 的建議下，為了推展兒童/青少年閱讀，以紐伯瑞為號召，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兒童文學獎「紐伯兒童文學獎」，主要授獎對象是以兒童/青少年為閱讀對象的美國文學小說作家，其所帶來的商業效益可謂是無遠弗屆，可以見得梅爾契爾的深謀遠慮，畢竟文學獎項的權威夾帶著強勢專為兒童/青少年準備的閱讀讀本，也為兒童文學作品在商品市場中取得名正言順的地位，甚至在台灣兒童文學的翻譯作品市場中，文學獎項的亮眼成績成為中產階級父母、教師、圖書館的選書憑藉。另外至十八世紀以來，從出版的商業機制到文學獎項的名聲，也出現的有趣現象是：曝光後的兒童文學也使得成人男性作家在兒童文學書寫佔有一席之地，藉由說/寫故事與孩子互動不再是母親的權力/利了，而是彼此相互合作的產出⁵⁷。

兒童文學既與成人文學有所區隔，它不僅標示了以兒童/青少年為主要閱讀對象，當然也不反對為了尋找失落的童年/童真而訴諸兒文作品的成人閱眾，研究兒文領域的相關學者與評論家或許對兒童文學定義爭議不斷，對卻無法否認童年概念的演變是隨著時空、社會文化差異而有所更迭，換言之，童年是一個由社會建構的概念，充滿時代的意識形態，而做為文化載體的兒童文學作品也將無法跳脫時代環境的形塑，或明或顯的顯示了當時代的兒童觀。若以此觀點觀之，歸屬於青少年小說文類的《醜人兒》三部曲，以其青少年身體做為表徵，無形中形塑/強化了當代兒童文學的兒童/兒童文學觀。承繼上者，研究文本顯示為了建立標準的身體規範，不僅在身體外在形塑了美醜的階級規範，藉此規範、鞏固和製造身體差異現象，更甚者，為了萬無一失地控制人類，身體外在差異的具現也直指身體的內部馴化，在此研究者著眼於整型手術對身體的內部控制，藉此身體樣態揭示青少年小說的文類價值觀。

首先，整型手術可以看做是具現青少年身體受到社會約束和削弱個人差異性的醫療/科技性策略，在科技介入的同時，也形塑了身體對科技的依賴，文本鮮明化了整型手術背後的操弄性與政治性，但也從而模糊了整型手術本身的焦

⁵⁷ 一些為男性創作且歷久不衰的兒童文學作品，源自於對孩子的說故事的神來之筆或遊戲之作，例如最著名的《愛麗斯夢遊奇境》是路易斯卡洛爾在船上編織的冒險故事，而風靡全球的繪本角色大象巴巴源自於母親對生病孩子的床邊故事，但這隻小象卻是透過 Jean de Brunhoff 才被賦予可愛的形象和名字。

點，換言之，整型手術機制因對個體造成腦部損害從而被完全否定，但試問若沒有這些成人陰謀複雜化時，青少年文類作者該站在何種立場評價整型手術？或者如何看待接受整型手術的青少年？威斯特菲德選擇不正面迎擊的作法，反而在此既定文類設定中加諸另一個烏托邦/惡托邦的敘事框架，而後者的文學框架應用在此也明白的透露了威斯特菲德的價值觀與立場，換言之，威斯特菲德無疑藉由女主角塔莉的行動或言談宣示了他對整型手術的批判，何以言之？

城市的美人意味了科技介入身體的成果，而對抗美人暴政的醜人，不僅暗示著處在當代的我們該如何思索拿捏身體與科技間的界線，就研究文本觀之，當身體與科技同時被放置在天平上考量時，文本背後訴諸的是將身體劃歸於自然類屬的意識形態，而被視為相對於自然的人工科技，也因為對身體的修補或改造被視為違反自然法規，更重要的是，透過整型手術的運作而達成的理想化身體，轉而樹立了新的階層與排他方式，因此保有生物遺傳的自然、天生面孔意味著擁有自由的主體價值，而此種人文主義的價值追求普遍的出現在西方兒童文學作品中，更甚著，青少年個體自由的追求也因挑戰主流社會的權威價值更加神聖化，儼然成為青少年成長必經的英雄歷程。若就其精神面貌觀之，此種情節鋪陳的青少年小說亦形構了另一種具有啟蒙性質的神話基調，雖然未若希臘羅馬神話充滿悲劇情操，然被選定的青少年角色在反抗外在邪惡威脅與暴力時，早已脫離平凡的日常生活脈絡踏上個人深度的生命旅程，在歷劫歸來之前，他/她必須勇於撼動整個宇宙固著的生存法則，或者是至壓迫的體制中得以蛻變。由此觀之，文本藉由對整型手術不同觀點形構了成人與青少年的衝突對立，因此在烏托邦敘事脈絡中，任由體制、話語搓揉的身體，在轉而置入青少年文類思考時，身體變成挑戰權威的策略手段，同時在青少年全然掌握自己身體主權的過程，也意味著對烏托邦威權社會的質疑與挑戰，塔莉最終拯救了城市，以凱波博士為首的整型手術最終崩毀，這似乎訴說了青少年又一場的勝利，然弔詭的是，文本中的成人權力雖看似瓦解，然卻在青少年閱讀活動中（藉由活生生的身體接觸、轉化文字符碼），形成了另一種話語式權威，儼然以明辨是非的指引者，形塑青少年的價值判斷，從中完成社會化的規訓。

第二節 再論《醜人兒》三部曲

平心而論，本研究成果只能算是一半，在研究疆域上還有半壁江山處在荒煙漫野中等待開發。如前所述，《醜人兒》三部曲作為青少年小說讀本，主要的論述重心是在於城市對青少年的壓制，這裡的城市名詞亦可替換成優托邦的威權暴政，成人壓抑體制等代名詞，論文重心在於闡釋整形手術所帶來的美人的概念、思維與形體如何對青少年身心產生制約，然文本的豐富性並不僅只於此，更甚者，青少年小說作為一種文類，它形構出一種精神思維，即青少年小說中的青少年主體並不僅是人類生長進展必經的生理階段，不可諱言，它有其重要的生物特徵，一如特納所言，作為一個劃分生長階段之一的識別條碼，青少年具有社會、文化的符碼意涵，更值得思考是：介於童年與成人之間的青少年，他/她不僅脫離童年的純真逐漸邁向成人世界的世故與墮落，而青少年「登大人」（台語發音）的生理交混狀態（hybridity）也標誌了青少年的象徵性，青少年載體無疑與叛逆、突破規範、勇於挑戰權威等精神劃上等號。

以此回到文本，面對這種劃歸於成人式的壓迫，青少年如何掙脫束縛、追求自由也成為文本另一個敘述重點，兩者合而觀之便是在探討「如何為」的問題，但這「如何為」伸展出兩種不同方向的觸角，但兩者並非無限延伸或是彼此不相干，而是彼此交織成錯綜複雜的脈絡，由此延伸出兩個主題：在青少年反動方面，可著眼的相關主題包括「過程中的主體」（subject in process），以身體樣貌為核心，青少年產生不同的主體認同問題，以塔莉為例，主體身份認同呈現階段性的不固定，暗示著主體狀態的流動性與不穩定。唯有保持不斷變化的主體，才能在危機狀態中不斷的更新、創造，釋放為父權體制壓抑的符號動力（Julia Kristeva 13），由此構成了青少年的動力；而青少年的行動也促使青少年的身體有一另番風情，就其經驗性的身體而言，青少年以自身物質性的身體作為抵制體制馴服的起點與基礎，啟動身體本身具有積極主動的爆發力與能動性（agency），相較於封閉安穩的生活經驗，塔莉為主的若干青少年透過身體的移動空間經驗，將身體形塑成具有思考力、批判性與反省力，綜合觀之，青少年身體在社會體現的過程，不但是社會實踐的受體，也是參與社會實踐的中介。第二個主題是「權力」（power），在此研究者強調的權力觀念並非上位者對隸屬者的壓迫，而是內在於兩者對立關係的拉扯、互動中的動力狀態，此外兩個主題在文本中呈現相互接疊的狀態，換言之，權力狀態一絲毫的變化將會影響主體的状态，因此在權力複雜過程中，必然著閃爍著主體浮動的認同軌跡，兩者以青少年身體作為相互競爭、消長的場域。

延續第四章的討論，下一步研究者將要探索的面向是：文本如何處理青少年主體反抗城市帶給他們的觀看機制？採取的方式是：以塔莉為例，藉由身體為中介物質，進行空間/地方的移置行動。空間透過身體朝向另一個身體關係性的連

結，當空間被置身其中的人賦予主觀上情感的意義與依附時，空間（space）也變成了地方（place），而地方作為一種觀看、認識和理解世界的方式，以城市為核心，塔莉不斷的以其他地方做為移動的場所，從



【城市→煙城→】城市→原始部落→新煙城→】城市→迪亞哥城→城市→未知】

在不斷線性移動的過程中，最終移動在固定的地點中消解（文本結尾塔莉的行蹤充滿開放式不確定與未知），此身體的空間實踐為塔莉的主體認同帶來何種影響？對城市的觀感有何改變？研究者將以傅柯提出的“Of Other Spaces”中闡述的“heterotopia”（異質空間）概念，以二元對立的結構進行空間性質的比對，包括城市/煙城（新煙城）、城市/部落、城市/迪亞哥城市，藉此凸顯溶印在空間象徵中的歷史脈絡，並對應與城市的關連，再者從塔莉融入空間產生的身份轉移，釐清空間與地方的差異，最後探討空間移置為塔莉帶來的新認知（對真相的瞭解）對塔莉的影響。

第三節 研究省思

平心而論，研究者在書寫論文的過程，最大的困境或者說最大的收穫在於對於文學文本研究方法的反省與摸索，這其中反反覆覆的心境就像是一下跌入滾燙沸騰騰的熱水中，在高溫煎熬的苦悶中，慢慢的心中累積這麼一點心得時，又突然陷入天寒地凍的寒漠中，顫抖的身軀努力的搓熱雙手，廣袤的天地雖可望盡天涯路，卻無法有一個確切的起點得以安身立命，彷彿又重新回到先前茫然無所措的侷促，而這一次次的冷熱交替也著實狠狠地磨蝕了研究者原先的自信滿滿與崇高目標，從原先自以為是的理解到現在的不懂，對於何謂是符膺有深度、具有學術氣息的「文本研究」準則，不同的觀點與聲音不停的在腦袋中辯論，看樣子離撥雲見日的時間似乎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由此研究者特立此節做為紀錄書寫論文過程中產生的疑惑，在思索這樣問題時，研究者將融入過去在兒童文學研究所研讀的課程進行回顧式的整理，藉此理解自身建構學術的脈絡與思維邏輯。

傳統的文學批評研究過於重視作者傳紀、時代背景等外部研究，較為忽略作品本身修辭機制及讀者反應之研究。直至二十世紀文學批評從作品論、文本論到讀者反應，甚至不再侷限文學壁壘，走向跨學科之文化研究，大量的援引哲學、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學論述等，重視深層結構一如潛意識心理、原型、話語結構、意識形態、權力意志等之研究。乍看起來，本論文似乎符合當代文批的潮流與脈動，可是當文學批評研究引入文本，並與文本相互對照應證時，問題便產生了，而這樣的困惑也重現了過去研修「兒童文學批評課」課堂上驅散不開的鬼魅。在 97 年（96 學年度）「兒童文學批評理論」課堂上的爭辯，普遍存在修課生的大問哉就是「寫作論文時，為什麼要引用理論（俗稱的「大家之言」）？到底學術研究領域的作者地位在哪裡？難道研究生就不能以「我」的發聲嗎？難道就因為是無名小卒的淺見而被嗤之以鼻嗎？」當時授課的老師是這樣回應：

一篇論文最重要的是研究者的真知灼見，連結自身累積的背景知識與研究文本，但論文停留在這個階段是不足的，引用「大師」的論述，希冀是深化研究生的論述觀點，注重論述的系統性與邏輯性，引用理論不是檢核該理論，而是要對引用的理論有所詮釋，要引用的是理論的概念，而非只是話語⁵⁸。

換言之，裡論觀點啓迪的不只是研究生的視野想法，更重要的是理論本身就是一個奧妙的宇宙，而研究生選擇與什麼樣的理論相遇，觀乎兩者是否氣味相同，也觀乎研究生此時生命階段關注敏感的議題。誠然，對一個研究生來說，書寫論文的過程就像是培養碩士生素養的「闖界階段」，從問題意識的勃發到建立論述框

⁵⁸ 相關課堂討論詳見 96「兒童文學批評理論」經典研讀課程網站：
<http://www1.nttu.edu.tw/mywu/96chlc/>

架進而論證書寫，這是對人文學科的碩/博士生而言的重要過程，而理論的觀點與思維可以形成研究者批評的態度與立場，可是在實際書寫的過程中，該以何種方式組織、編織文脈才能展現理論視角所帶來的批判性與思考性？換言之，在論文書寫上，如何在理論引用與文本之間取得一個平衡？我們該如何看待這兩者的相互關連呢？或者是說我們該如何看待文學文本的研究方法？

上述種種疑問，研究者無法即刻提出深刻的思索，轉而以自身的論文產出作為研究對象，試圖釐清問題產生的原因，大致可歸納出三個思考方向：

（一）就書寫策略觀之：

相較兒童文學研究所其他碩士生的研究論文，研究者書寫風格略為艱澀乾扁，若從文章段落的外觀觀之，大段落的開闢不僅形成壟長的文氣，也讓閱讀者感到疲憊，因此在書寫論文的過程中，不僅需要考量文章段落間內部思想的關連性，就連形式剪裁得當與否也須列入考量。

另外研究者在每一章節之始從文本摘錄一段主要情境式的描述或對話，「抽象化」文字話語中顯露的思維概念或意識形態，進而援引相關的理論論述予以詮釋，甚至在某些段落中進行理論與理論間的互動與對話，然這樣的書寫模式是否就是合適的「文本細讀」或「文學批評研究」？而這也延伸出另一個更為棘手的問題，因為這樣的書寫模式產生了孤立文本的連鎖定反應，從而將文本置於輔助者的地位，換言之，研究者就無非一定要選擇此本文本了，這樣的結果導致選讀本文本的理由將無法具有說服力，因此研究者必須思考的是：經過理論的辨證，需進一步將此結果放置於文本中進行論證，方可達到論述結構的完整。

（二）就引用理論的性質考量

通篇而言，研究者偏愛援引相關社會學理論，然就社會學理論的發生背景是針對活生生的動態社會景象，也就是說，社會學理論脫胎於複雜的社會脈絡中，主要是針對複雜的社會某一面向試圖進行描述與論說，在社會中所有的因果關係與事件是彼此交雜纏繞的，也因此為了驗證社會，不論是宏觀或是微觀視野，好的理論本身在深度與廣度上展現出最大的延展性，甚至為了適應時代變遷，理論不斷的被修正，呈現出理論的未完成狀態。雖說青少年小說亦是呈載某一時代社會意識的物質性產物，也就是說現實社會情境的複雜性成為創作元素，重新置入作者創造的虛構世界，轉變的時空背景使得原有的創作元素產生了變異，這種變異並非全然不好，創作者透文字符碼再現文本與現實世界的關係時，再現並非如實的模仿，而是像稜鏡般，折射出另一種世界樣態，這並非是一種假象或是謬誤，而是一種趨近真理的方式，然就本研究文本而言，作者將社會現象轉化文字文本的過程中似乎有簡化的趨勢，而這簡化的文學風格也從而形構了本論文的書寫風格（理論與文本之間失衡），進一步說來，援引理論本身內涵的豐富度足以超越文本的文學價值時，是否也暗示出兒童/青少年文本長久以來的邊緣性？當然這

種論斷突顯出研究者本身累積的文學品味，而這個品味與素養必然影響對兒童文學文本文學價值的判準，不可諱言，兒童與青少年概念的發展成熟，為兒童文學領域的研究價值提供了充分的但書，弔詭的是，當兒童文學文本作品與成人文學作品相提並論時，仍舊會顯現兒童文學的「小兒科」性質，這個現象也使得努力爭取正統地位的兒童文學，產生了跨界書寫的文本複雜性。然就論述方面，邊緣、非正統的尷尬也是中外兒文論者長久以來致力破除的迷障，在論述中普遍的呈現出跨學科的引用、轉化理論現象，也暗示了兒文論述亟欲建構自身學術版圖的急切性，然值得關注的是：轉化援引理論的程度是否能夠清楚明確的標示兒文論述本身的主體性。

（三）就兒童/青少年文學文本而言

如上所言，本論文最大的缺失是：理論理性對話的延展性全面壓倒研究文本，這也暗示了研究者另一個致命的盲點：兒童文學領域文本閱讀量的缺乏，換言之，文學文本研究最終是以紮實、大量廣泛閱讀為基礎，在廣泛閱讀文本的基底中，進而細讀文本，達到文學文本的理論化。若從兒童/青少年文本考量，單一文本的單薄也延伸出以眾多文本顯示某些兒童/青少年的共通性現象做為文本研究的另一個可以期待的嘗試，另一個可能為兒童文學不一定要以標榜為兒童/青少年閱讀對象書寫的作品，可反向思考將文學作品中呈現的兒童或青少年形象作為可耕耘、探討的研究範疇。

對於我們該如何看待理論引用與研究文本兩者的關連呢？研究者終究無法梳理出一個確切的答案，然此根本性的疑問也將繼續成為研究者探究學問的描點，期許為兒文論述開啓另一種可能性。

參考書目

相關文本

【中文書目】

- 史考特·威斯特菲德 (Scott Westerfeld)。《醜人兒》(*Uglies*)。舒靈譯。台北：尖端，2007。
- 。《美人兒》(*Pretties*)。舒靈譯。台北：尖端，2008。
- 。《異人兒》(*Specials*)。舒靈譯。台北：尖端，未出版。(譯者已交稿)
- 赫胥黎·阿道斯 (Huxley Aldous)。《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孟祥森譯。台北：桂冠，1994。
- 柏拉圖 (Plato)。《柏拉圖理想國》。侯健譯。台北：聯經，1980。
- 。《斐多》。楊絳譯。台北：時報文化，2002。
- 喬治·歐威爾 (George Orwell)。《一九八四》(*1984*)。台北：小知堂，2001。
- 葉夫根尼·薩米爾欽 (Yevgeny Zamyatin)。《我們》(或譯：反烏托邦與自由：廿世紀偉大預言小說的號角)。趙丕慧譯。台北：網路與書，2008。

【英文書目】

- Westerfeld, Scott. *Uglie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5.
- 。 *Prettie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5.
- 。 *Special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7.

理論專書

【英文書目】

- Barry, Peter. *Beginning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 New York : St. Martin's Press, 1995.
- Berneri, Marie Louise. *Journey Through Utopia*. New York: Schoken Books, 1971.
- Carey, John. "Introduction." *The Faber Book of Utopias*. Ed. John Carey. London : Faber, 1999. xi-xxvi.
- Douglas, Mary. *Natural Symbols: explorations in cosmology*. New York : Routledge, 1996.
- 。 *Purity and Danger :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New York : Routledge, 2002.
- Geneep, Arnold Van. *The Rites of The Passage*. trans. by Monika B. Vizedom and Gabrielle L. Caffee. introd. by Solon T. Kimball. London : Routledge & Paul, 1960.
- Hillegas, Mark R. *The Future as Nightmare: H. G. Wells and the Anti-utopians*.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4.
- Hertzler, Joyce Oramel. *The History of Utopian Thought*. London: Allen & Unwin,

1922.

- Kaufmann, Moritz. *Utopias* (1879). London: Kegan Paul, 1977.
- Klaic, Dragan. *The Plot of the Future : Utopia and Dystopia in Modern Dram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1.
- Kumar, Krishan. *Utopianism*. Buckingham :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1.
- Levitas, Ruth. *The Concept of Utopia*. New York: P. Allan, 1990.
- Rose, Jacqueline. *The Case of Peter Pan or The Impossibility of Children's Fiction*. London: Macmillan, 1984.
- Rose, Harry. *Utopias Old and New*. London: Nicholas & Watson, 1938.
- Suvín, Darko. "Defining the Literary Genre of Utopia: Some Historical Semantics , Some Genology, a Proposal and a Plea." *Metamorphoses of Science Fic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37-62.

【中文書目】

- 王曉路等。《文化批評關鍵詞研究》。北京：北京大學，2007。
- 吳岩。〈論科幻小說的概念〉。吳岩、呂應鐘合編。《科幻文學入門》。福州：福建少年兒童，2006。7-15。
- 何冠驥。〈中國文學中的烏托邦主題〉。《借鏡與類比－中國文學研究的現代化》。台北：東大，1989。83-113。
- 。〈幸福保證的謊言〉。《借鏡與類比－中國文學研究的現代化》。台北：東大，1989。247-273。
- 高宣揚。《流行文化社會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6。
- 張子樟。《少年小說大家讀：啟蒙與成長的探索》。台北：天衛文化，1999。
- 張中秋、黃凱鋒著。《超越美貌神話－女性審美透視》。上海：學林，1999。
- 張治。〈東西文化碰撞中的天人懷想 晚清科幻小說與現代性〉。《現代性與中國科幻文學》。福州：福建少年兒童，2006。3-73。
- 黃盈盈。《身體·性·性感：對中國城市年輕女性的日常生活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8。
- 楊儒賓、何乏筆主編。《身體與社會》。台北：唐山，2004。
- 廖炳惠。《關鍵詞 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台北：麥田，2004。

【翻譯書】

- 厄文·高夫曼 (Erving Goffman)。《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徐江敏、李姚軍譯。台北：桂冠，1992。
- 亞瑟·凱博文 (Arthur Kleinman)。《談病說痛：人類的受苦經驗與痊癒之道》(*The Illness Narratives: Suffering Healing & the Human Condition*)。陳新綠譯。台北：桂冠，1997。
- 布萊恩·特納 (Bryan S. Turner)。《身體與社會》第二版 (*The Body and Society : The Body and Society: Explorations in Social Theory*)。馬海良、趙國新譯。瀋

- 陽：春風文藝，2003。
- 布萊恩·特納、讓·鮑德里亞等。《后身體：文化、權力和生命政治學》。汪民安、陳永國主編。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 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美的歷史》（*History of Beauty*）。彭淮棟譯。台北：聯經，2006。
- 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劉北成、楊遠嬰譯。台北：桂冠，1992。
-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小說的藝術》（*L'Art du Roman*）。尉遲秀譯。台北：桂冠，2004。
- 那歐米·吳爾芙（Naomi Wolf）。《美貌神話》（*The Beauty Myth*）。何修譯。台北：自立晚報，1992。
- 尚·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沙特的詞語：讀書與寫作的回憶》（另一譯名：詞語）。潘培慶譯。台北：左岸文化，2002。
- 約翰·菲斯克（John Fiske）。〈侮蔑的身體與嘉年華的愉悅〉。《瞭解庶民文化》（*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陳正國譯。台北：萬象，1993。
- 茱莉亞·克莉絲蒂娃（Julia Kristeva）。《恐怖的力量》（*Pouvoirs de l'horreur*）。彭仁郁譯。台北：桂冠，2003。
- 康奈爾（R. W. Connell）。《性/別：多元時代的性別角力》（*Gender*）。劉泗翰譯。台北：書林，2004。
- 連敦·溫納（Langdon Winner）。〈技術物有政治性嗎？〉（*Do Artifacts Have Politics?*）。《科技渴望社會》。吳嘉苓、傅大為、雷祥麟主編。台北：群學，2004。頁碼待查。
- 凱西·戴維斯（Kathy Davis）。《重塑女體—美容手術的兩難》。（*Reshaping the female body the dilemma of cosmetic surgery*）。張君玫譯。台北：國立編譯館，1997。
- 雅克·拉康、讓·德里亞等。《視覺文化的奇觀：視覺文化總論》。吳瓊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8。
- 傑克斯·巴森（Jacques Barzun）。《從黎明到衰頹：五百年來的西方文化生活》。鄭明萱譯。台北：貓頭鷹，2007。
- 喬治·凱特布編（George Kateb）。《現代人論烏托邦》。孟祥森譯。台北：聯經，1970。
- 凱薩琳·沃爾德編（Kathryn Woodward ed.）。《身體認同：同一與差異》（*Identity And Difference*）。林文琪譯。台北：韋伯，2004。
- 路易斯·阿圖塞（Louis Althusser）。〈意識型態與國家機器意識型態〉。《圖繪意識型態》（*Mapping Ideology*）。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Zizek，台灣譯名為斯拉維·紀傑克）編輯。南京：南京大學，2006。
- 薩拉·喬根（Sarah Grogan）。《身體意象》（*Body Image: Understanding Body Dissatisfaction in Men, Women and Children.*）。黎士鳴譯。台北：弘智，2001。
- 愛笛絲·赫米爾敦（Edith Hamilton）。《希臘羅馬神話故事》（*Mythology*）。宋碧雲譯。台北：志文，1998。

歐奈特·海明威 (Ernest Hemingway)。《流動的饗宴：海明威巴黎回憶錄》。成寒譯。
台北：九歌，1999。

期刊論文

- 汪民安。〈身體的雙重技術：權力和景觀〉。《花城》：177-184，待查。
- 李永熾。〈近現代的烏托邦世界〉。《烏托邦專輯》。22-31，待查。
- 余維海、王宏光。〈“烏托邦”的批判與批判的“烏托邦”——馬爾庫塞“烏托邦”的構建與批判〉。《雲南行政學院學報》。第5期：38-40，2008。
- 李爽學。〈追尋烏托邦的履痕：西洋上古史裡的烏托邦思想〉。《當代》。61：32-43，1991。
- 李霞。〈西方烏托邦文學發展與變異〉。《淮陰師範學院學報》。第21卷第6期：83-85，1999。
- 周樑楷。〈激進壯美的烏托邦：摩爾與湯姆森的職志〉。《烏托邦專輯》44-55，待查。
- 星河。〈烏托邦與反烏托邦〉。《科幻潮》。第10期：52-53，2008。
- 姚建斌。〈烏托邦文學論綱〉。《文藝理論與批判》，第2期：57-66，2004。
- 。〈烏托邦小說：做為研究存在的藝術〉。《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105-108，2003。
- 張一瑋。〈異質空間與烏托邦——一種都市文化批評的視角〉。《唐山師範學院學報》。第28卷第6期：19-21，2006。
- 麥永雄等。〈烏托邦文學的三個維度：從烏托邦、惡托邦到伊托邦〉。《廣西師範大學學報》。41卷第3期：40-46，2005。
- 張春梅。〈身體辯證法：20至世紀90年代以來的“身體敘事”〉。《文藝研究》：第十二期：36-43，2008。
- 張隆溪。〈烏托邦：觀念與實踐〉。《讀書》。第12期：62-69，1998。
- 張惠娟。〈樂園神話與烏托邦——兼論中國烏托邦文學的認定問題〉。《中外文學》。15卷第3期：78-100，1986。
- 。〈反烏托邦文學的諧擬特質〉。《中外文學》。17卷第8期：131-146，1989。
- 。〈山色空濛雨亦奇——烏托邦研究近貌〉。《中外文學》。25卷第3期：254-262，1996。
- 陳曉蘭、戴煒君。〈西方空想社會主義小說中的城市烏托邦〉。《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4卷第4期：99-103，2007。
- 馮珠娣 (Judith Farquhar)、汪民安。〈日常生活、身體、政治〉。《社會學研究》：1：107-113，2004。
- 潘一禾。〈經典烏托邦小說的特點與烏托邦思想的流變〉。《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37卷第1期：87-94，2007。
- 管開明。〈當代語境中的烏托邦新解〉。《學習月刊》。第14期：30-31，2008。
- 賴素芬。〈失落的天堂與未來的人間地獄——烏托邦與反烏托邦〉。《歷史月刊》。21：

112-129, 1989。

謝江平。〈反面烏托邦與反烏托邦〉。《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7 卷第 5 期：10-13, 2006。

蘇恩文 (Darko Suvin)。〈《科幻》專號導論〉。《中外文學・《科幻》專號》。蕭立君譯。264：8-12, 1994。

——。〈科幻與創新〉。《中外文學・《科幻》專號》。單德興譯。264：27-48, 1994。

顧昕。〈烏托邦與極權主義〉。《烏托邦專輯》。56-65, 待查。

博碩士論文

吳文薰。〈羅莉塔的後設閱讀—少女的身體、慾望與消費文化〉。台東：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2008。

李潤菱。〈卡爾維諾《義大利童話》中變形故事之研究〉。台東：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2007。

余晏如。〈圖畫書中性別研究—以芭貝・柯爾文本為例〉。台東：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2003。

林淑婉。〈論奇幻文學中兒童與烏托邦概念—以《黑暗元素三部曲》為例〉。台東：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2006。

金惠芬。〈童話中的人魚—安徒生與王爾德〉。台東：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2007。

劉美瑤。〈烏托邦的幻滅—談《記憶傳授人》的制約與覺醒〉。台東：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2005。

劉琬琳。〈從少年科幻小說看烏托邦的幻滅〉。台東：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2007。

蘇欣臨。〈賤斥的曖昧性：論《肉年》中肉食與女性身體的關聯與顛覆〉。台中：中興大學外國語文所，2006。

參考網站

Gorgias' Encomium of Helen。檢索日期：2008 年 11 月 8 日，取自：

<http://www.phil.vt.edu/MGifford/phil2115/Helen.htm>

王爾德 (Oscar Wilde)。〈在社會主義下的人類靈魂〉(“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The Literay Encyclopedia。搜尋日期：2008 年 11 月 28 日，取自：

<http://www.litencyc.com/php/sworks.php?rec=true&UID=7785>

吳岩。〈科幻作家的個性〉。幻想的邊疆。檢索日期：2008 年 07 月 14 日，取自：
1 <http://blog.sina.com.cn/wuyan98>

史考特・威斯特菲德私人部落格有關 *Uglies* trilogy 的介紹和訪談。檢索日期：2008 年 06 月 05 日，取自：<http://scottwesterfeld.com/books/uglies.htm>

李希敏。〈醫學美容之整形手術市場〉。檢索日期：2008 年 11 月 21 日，取自：
<http://www.itis.org.tw/index.jsp>

李希敏。〈醫學美容之整形手術市場（二）〉。檢索日期：2008 年 11 月 21 日，取自：<http://www.itis.org.tw/index.jsp>

雅文。〈追溯兒童閱讀的起源—從紐伯瑞兒童文學獎的歷史談起〉。故事・閱讀・思考・體驗・生命（部落名）。檢索日期：2009 年 05 月 24 日，取自：

<http://tw.myblog.yahoo.com/jw!YR9TESuEGRTwekyoYG0aZg--/article?mid=2181>

〈中國男人進入整形時代〉。中國整型美容網。檢索日期：2008.10.13，取自：

<http://www.psbeauty.com.tw/html/ps-news105.html>

〈改臉：韓國女人的生活方式〉。中國整型美容網。檢索日期：2008 年 11 月 22 日，取自：<http://www.psbeauty.com.tw/html/ps-news123.html>

〈美青少年整形大幅上升〉。中國整型美容網。檢索日期：2008 年 11 月 22 日，取自：<http://www.psbeauty.com.tw/html/ps-news117.html>

